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
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16 年)

目录

红色中国时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失败与中国经济的出路.....	2
亦庄打工见闻实录.....	8
工资、利润和阶级斗争 ——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矛盾.....	13
关于华为问题致远航一号同志的信.....	65
关于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一些情况——复万里雪飘.....	67
怎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美国大选？.....	69
关于“宪政”的思考.....	7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74
还是对远航一号网友说点什么.....	77
要痞子运动，还是要“宪政”，这是个问题.....	79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上层建筑.....	83
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马列毛左派怎样做宣传工作？.....	85
读远航一号《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马列毛左派怎样做宣传工作》一文的思考.....	91
平抑房价、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94
特朗普胜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105
究竟谁支持了川普？.....	108
再谈特朗普上台的选民基础 —— 与水边同志商榷.....	110
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及其当选的影响 —— 回应远航一号.....	114
天塌不下来 —— 与水边同志再商榷.....	116
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	119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证明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性和危害性.....	121
再论“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	126
请问“Z2Z2”网友，你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28
曹家的奋斗史 —— 从“10 万日元巨款”到福耀玻璃.....	131

红色中国时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失败与中国经济的出路

2016-3-2

作者：远航一号

编者注：改良主义范文

这篇时评主要从技术层面、政策层面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政治方面的分析在其它场合再谈。

中国经济正在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这是各方面正在形成的共识。从内部来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开始破裂以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规模迅速膨胀。据初步统计，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到了15.4万亿元，与2014年的16.5万亿元相比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与现在不到7%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相比，意味着非金融部门的长期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达到300%以上，大大超过美国2008年危机之前的水平。这是不可持续的。

从外部来说，去年突出的问题，是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去年一年减少了约5100亿美元，与2014年最高峰时的近4万亿美元相比，则减少了约7000亿美元。这种外汇储备的大规模流失，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股市、房地产泡沫破裂，国内外投机资本在预期投资利益下降、规避风险的情况下，纷纷向境外转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资本外逃、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下，国内外投机资本预期人民币将不得不大幅度贬值，为了避免贬值引起的资本损失以及在贬值之前获得投机套利，纷纷撤逃，从而反过来加重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这种局面，如果再持续几个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可能下降到比较危险的水平。比如，如果外汇储备跌到2万亿美元以下，投资者信心就有可能全面动摇，迫使人民币大贬。

以上是当前经济困境的主要现象。从更根本的问题来说，中国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以出口制造业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没有根本改变在核心技术设备（计算机高端芯片、高端机床）以及关键能源（石油）等方面依赖进口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普遍增强，中国原有的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表现在整个经济范围，是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在迅速下降，即将失去相对于美国的优势。表现在制造业部门，是中国制造业单位产值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美国，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开始失去竞争力。

楼继伟和“供给侧改革”

近日，在“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 2016 年年会”上，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再次提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资刚性上涨 … 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仅从现象上来说，楼部长所分析的经济现象是存在的，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楼部长的建议是，深化“供给侧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加快“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劳动合同法不仅要保护劳动者、也要保护企业，等等。

对此，已经有评论者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是过少而是过多”，至今仍有五分之三的农民工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六分之五的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更不必说在工人民主自愿基础上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等较为“规范”的劳资关系调节手段了（见破土网，“楼部长，搞清事实再讲话”，<http://www.groundbreaking.cn/shehui/guojij/6380.html>）

确实，过去几年，各方面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但是，一方面，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工人的工资仍然是严重偏低的，中国仍然属于工资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恶劣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现在工资增长速度较快，不过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实际工资长期停滞、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大幅度下降的一种补偿而已。

从经济学角度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眼界更加开阔、对国家政策和法律认识水平的提高，客观上对“闲暇”的偏好大幅度上涨，工人实际工资水平理应大幅度提高。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由中外私营企业主导。私营企业既然号称产权明晰，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创新动力充沛，理应努力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加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适应工人工资上涨的实际情况。

楼部长也承认，我国大量的企业，之所以不适应劳动合同法等较为规范的劳动关系，就是因为它们是“代工制、外向型企业”，企业也不愿意支付大量成本，来提高工人的职业技能。这说明，虽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国家大力推进私有化、“产权改革”，为中外私营企业创造了各种各样有利的发展条件，但是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企业仍然改变不了在国际上主要从事中低附加价值生产的尴尬局面，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够快，以至于国际竞争力每况愈下。

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应该违背市场规律、人为地压低工资增长速度，让效率低下、已经丧失国际竞争力的私营“僵尸企业”继续存在，而应该采用近年来经常讲的“倒逼”机制，用工资的快速增长来“倒逼”私人资本家提高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上一个台阶。至于那些长期依靠低工资、代工制的低效私人企业，也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允许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被自然淘汰。

从政治上说，“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绝大多数人富起来，实现“中国梦”。为了这个总的目的，工资增长速度在一个时期内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政治上是有利的，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加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反之，如果一看到工资增长快一些，就急急忙忙要人为地压低工资增长速度，甚至要逼迫数以亿计的基层工人长期生活在血汗工厂的残酷剥削之下，以至于他们看不到盼头、体会不到“改革开放”的甜头，这就为千千万万的群体性事件准备了群众基础，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

进步的经济政策？

抛开政治层面的约束暂时不谈，在中国经济目前的具体条件下，能不能通过一些比较进步的经济政策来克服目前的困境、避免危机？为了与广大读者交流思想，也为了将来在政治条件适当的情况下提出一些经济上过渡的思路，下面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现在由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进步团队执政，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是三个层面的。外部来说，当务之急，是保持国际支付平衡、稳定外汇储备。内部来说，是避免债务危机爆发，同时在挤泡沫的过程中，避免大的经济衰退，保持必要的就业增长。长远来说，则是如何使得中国脱离依靠低工资、代工制血汗工厂在中低附加价值环节上低水平竞争的尴尬局面，摆脱对国外关键技术和能源的依赖。

先说眼前的外部问题。从技术上来说，要制止资本外流的局面，无非三个办法，即资本管制、人民币贬值、提高利率。后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利诱资本家，不将资本转移到境外，但是都有严重的副作用。提高利率，可能导致国内投资下降、经济衰退。人民币贬值，可能引起更大的贬值预期，诱发大规模资本外逃，并通过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引起世界范围经济动荡。

要制止资本外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行严厉的资本管制，制止或严格限制一切私人资本输出。但是，这些措施都严重违背中外私人资本家的利益，也意味着当局必须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改革”（特别是已经向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资本所承诺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决裂。

如果是一个进步政府，面对同样的局面，可以采取如下几个步骤。总的来说，是资本管制为主，辅以一次性的、较大幅度的本币贬值以及国内利率的逐步提高。资本管制方面，首先是撤废各项

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措施，封堵漏洞，比如撤废上海自由贸易区、取缔“沪港通”；其次是对私人资本的各项长、短期投资一律实行审批制度；最后，可以逐步减少国有部门的对外投资。

国内经济方面，在债务泡沫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在私人资本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无非是两种前途：或者，债务大到其自身无法承受的程度而自然破裂；或者，主动收缩货币供给，迫使债务泡沫提前破裂。

两害相权取其轻，主动促使泡沫破裂的办法相对好一些。问题是，如何将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的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可以采取“紧货币、宽财政”的方法。紧货币，就是逐步收紧货币供给、提高利率，挤破泡沫，哪怕房市大跌、股市崩溃，也在所不惜。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行业的私人企业大批破产，也会有几千万人至少暂时失业。

这时，为了减少整个经济的震荡、稳定就业局势，就要积极地、大胆地、乃至不计代价地实行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中央财政要敢于每年增加三万亿元、四万亿元的赤字开支（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5%）。只要这些赤字开支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形成有效资产，就不必担心中央财政资不抵债的问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 2009 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当时的温家宝政府曾经实行了“四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客观上起到了稳定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作用。温家宝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在原则上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在具体做法上，由于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不相信公有制、不相信国有企业，将大部分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可以带来未来回报的生产性企业。此外，当时的“四万亿元”，中央财政实际上只出了一小部分，其余都由地方政府和企业自筹，从而为后来的地方债务泡沫埋下了伏笔。

未来进步政府的赤字财政开支，应主要用于生产性企业的公共投资。如果按照每十万元投资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匡算，三、四万亿的总投资就可以每年创造三、四千万个就业岗位，足以抵消紧缩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消极影响，确保整个社会就业水平的稳定和增长。

这些投资，可以与国家长远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比如，可以拿出几千亿元，收购各地农村闲置土地，改造为国营生态农场，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可以用一、两万亿元主要用于电力生产部门的去碳化（大力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交通部门的电气化（可以首先争取实现全部公共交通、市内出租车、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用车的电气化），改善环境，并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再用一部分投资来发展煤制油、煤制气，就可以争取实现石油自给（理论上，10 亿吨煤炭制成液体燃料，相当于 2.5 亿吨原油，基本可以代替中国目前的石油进口）。

除了生产性投资以外，在积极财政政策中，也可以安排一些福利开支。但是，首先，要取缔现有的一些打着“供给侧改革”旗号、危害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比如，应当废止延迟退休的政策（除

了将女职工退休年龄提高到与男职工一样的 60 岁，或许可以逐步实行以外），社会保险方面的缺口应当由财政统一补足。为了社会保险的长远发展，应当取消各地区独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改由中央统筹、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再有，可以借着股市、房市暴跌的机会，由国家从财政支出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收购低价股票、扩大公有制经济基础，再收购一批低价住房，改造为利民公租房。

通过以上几项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在对广大劳动群众较为有利、又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情况下，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

在中长期，进步政府可以进一步实行较为长远的产业政策，主要是选择若干个战略发展方向，如计算机软硬件的关键部门、关键的机床和机器设备、新能源方面的核心技术等，采用“两弹一星”式的攻关方法，动员全国的科技和工业力量，实行重点进口替代，争取在不长的时间里，形成一套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雄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样，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回到十三大的经济改革路线？

近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线、方针是错误的，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恶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是不科学的，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已经为多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否定。

由于迷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面对现实的经济困难，政府在决策和举措方面自缚手脚，虽然有一些稳定经济的步骤，但是由于缺乏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没有自信、不果断、不彻底，而且常常自相矛盾。一方面想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另一方面还要搞金融自由化、并且反复宣称不会背弃对国际资本的承诺。一方面，不得已采取了一些稳增长的财政刺激措施，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采取扩大公有制、增加社会福利等直接有利于人民的措施，而是寄希望于给资本家减税等实际上劫贫济富的办法。

可见，如果不彻底反思、否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线，则中国经济摆脱困境无望，并且经济形势有逐步恶化的危险。

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在赵紫阳主持下、小平同志所认可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报告关于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则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表述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第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承认“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没有把市场的作用绝对化、神秘化，在理论上仍然承认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危险性，承认“计划调节”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十三大报告主张“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认为只有在国家的“调节”下，才能“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与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路线相比，十三大改革路线可以算是比较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如果中国要在未来的几年、十几年，避免大的经济和政治动荡，恢复十三大改革路线或许是一个能够为社会绝大多数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所接受的过渡性办法。

亦庄打工见闻实录

实践 | 亦庄打工见闻

2016-05-15

作者：毕史鉴 外院马会

作者按：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学会的部分会员在北京的亦庄工业区体验了打工的生活，他们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感，我们将会陆续把这些文章推送出来。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与实践经验有限，文章中必然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希望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多多指正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杂烩的“荒诞”的城市，有光鲜亮丽的办公区和灯红酒绿的娱乐区，也有滞后于时代的贫困乡村和赤裸裸压榨血汗的工业区。每个夜晚和白天，在这雾霾笼罩的天空下，都会同时上演“上层”的酒迷金醉的“下层”的水深火热。北京有一个叫做亦庄的地方，这里被规划为经济开发区，聚集了很多工业企业，其中虽有很多电子技术工厂，但是也不乏印刷厂、家具厂等技术水平低下但是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很大的传统工业。就这样，在2016年国际劳动节的夜晚，我们来到了亦庄。

来到亦庄工业区地铁站的第一观感，就是似乎也没有那么的不堪，建筑的外表像是中高档的社区。我们先去了工会，亦庄开发区的工会正要准备晚上的文艺活动。看到参加工会的工友，穿着时髦的服装，带着自己的乐器，似乎让人能够看到一点希望。但是，开发区的工人有20万之多，这么小的一个工会，真的够用吗？或者说，这么一个工会，能够代表的工人又有多少呢？

我们的计划是，在五月一日的晚上，先在这边住下，第二天早起，去赶黑中介招人的早集。从工会到最近的镇子上，路边都是厂房。过了一条叫做凉水河的臭水沟，就到了镇子里。这个镇子散发出一股混乱的气息，毕竟是黑中介一条街，街上灯火通明，有很多廉价（而条件很差的）小旅馆和网吧，还有开着大喇叭的通讯店和甩卖假货的商场。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很小的间距上，分布着很多殡葬店。街上的卫生状况当然不容乐观，街边还有黑中介竖着牌子，在为工厂的夜班招人。

现在亦庄这边的劳务用工形式，主要是劳务派遣，它的特征是，工厂不直接招收工人，由中介招收工人，输送给工厂，同时，厂家将工资支付给中介，中介作了扣除之后，再支付给工人。这样，工人在被工厂剥削后，还要经过中介的盘剥，才能够拿到工资。这样的劳动制度，使工厂的管理费用降低，养活了中介这个寄生虫的阶层。羊毛出在羊身上，唯一被损害的，就是工人——

这就是社会的现实。看到路边有一个牌子，在招夜班临时工，于是我们改变了原定的计划，一部分人上夜班，另一部分人按照原计划，赶早班的工作。

这家中介叫做“高盛英才”，和那家著名的投行是一个名字，但是它的门面只有差不多四平方米，几张板凳，两台电脑，墙上贴着各种用工信息。等了差不多十分钟，来了一辆运货的面包车，没有窗户，也没有座位，在这个将要下雨的闷热晚上，我们被塞入了这辆贴着“城市货运”贴纸的面包车，向厂房进发。在路上，司机说这车最多可以装四十多人。第二天，我就看到了核载七人的面包车装二十多人是什么样子，然而还是无法想象，这种车怎么装四十个人。

途中我们实在是看不到走了哪些路、路边有什么东西。下车后，看到一栋不高的楼，亮着霓虹灯，显示着“国家示范印刷单位”，看不到哪里写着厂名，一个蹲在路边吸烟的人把我们领进了厂房，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们的工头。厂房里面堆积着如山的书籍，种类很多，既有鸡汤文学，也有严肃的学术著作，既有幼儿读物，也有大中小学教材。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所说，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便是庞大的商品堆积。进到厂房的一瞬间，就闻到了浓郁的“书香味”。如果在以前，我一定会像一个小布尔乔亚一样，称赞这种香气为人类知识的清香，可是此时此刻，这种东西绝非善物，它如此浓郁，以至于每一个肺泡都感受到了它的醇厚，好像有很多颗粒在呼吸道里翻腾。机器不知疲倦地怒吼着，嘲笑着墙上那张“必须佩戴护听器”的贴纸——在这“书香”浓郁的车间里，没有任何一个工人佩戴任何防护措施。

我们以两人一组的方式，被分开安置到了不同的生产线上，但做的都是同样的活儿：把印制切割好的成品书从流水线上搬下来，码放到一块集货铁板上，等待叉车把它们运走，送到打包的生产环节上去。一脸不爽的机器长告诉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可是巨大的机器轰鸣让我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而厂房犄角旮旯堆积的厚厚的白色灰尘，好像在偷偷告诉我“书香”的本质是什么。这一条流水线有两个出口，一个出没有封面的半成品，一个出切割好的成品。我们先在半成品出货口干活，出的货是医学的教材《组织学和胚胎学》。因为刚来，好奇和激动还没有退去，还有力气说话和思考。在机器长的指挥下，要把两厘米厚的书以八本一组的速度码放到搁板上，流水线是不会感到疲劳的，它只会以恒定的快速度不断运转下去，人只有跟上机器的节奏，否则更多的产品就会像潮水一般涌来，一下子跟不上，书就会掉到地上，然后就再也跟不上机器了。在流水线上，人不能有任何的理由放慢工作，没有思想的权利，没有感觉的权利，没有心情不好的权利，没有工作状态不佳的权利，只有竭尽全力跟上机器运作速度的义务。“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天天在读马克思主义，读哲学，读政治经济学，我们天天在讲“异化”，讲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讲剥削率，也天天和那些精神赵家人就“资本家和工人，谁养活了谁”展开论战——恕我直言，这些问题，只要到厂房来，呆上一个小时，便能有定论。流水线控制着工人，体现了人的异化；运转不停的机器与强打精神的工人，就证明着计件工资的“人道”；工人阶级的辛劳与老板们的逍遥，就充分回答了“谁在养活着谁”的问题。

那些不接地气、玄之又玄的理论，在实践面前，就像纸一样单薄而苍白。可问题正在于，小布尔乔亚们远离实践，被各种看起来和谐而又符合“数学原理”的资本神话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北，又被灌入了精心熬制的鸡汤，离广大的底层中国越来越远，这些小资们，抬不起仰望星空的头，迈不出脚踏实地的脚，浮在充满小确幸的半空中。而真正的产业工人，长年在这样的生产线上劳作，业余生活也被休息和娱乐挤占，难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难以接触到心系无产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自身的解放诉求，也慢慢被宿命的迷信挤占。这种“自愿签订契约”的雇佣劳动制度，实质就是披着文明面具的奴隶制！

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晚上 10 点到次日 8 点，按照规定，在 12 点，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离十二点越来越近，我们换了一个出货口，这次印的书，是《知识清单之初中物理》，越到饭点，流水线的运行速度就越快。另一边，机器长也没有一点想要吃饭的意思，依然紧缩眉头，我们实在忍不了了，拔腿奔向食堂。这里的食堂有土豆烧牛肉，想想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看看墙上宣传粮食就是血汗的宣传画，真是让人觉得时空错置，不禁苦笑连连。厂房里飘散着粉尘，机器的运转也使得室内的温度比室外高出好多，高温和干燥让人失水特别快。为了补充水分，我们买了大瓶的水，花去了十分之一的工资。在回厂房的路上，我们看到了资本家的奔驰车，已经闲置了很久，落上了厚厚的灰尘，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到了厂房，看到两个其他生产部门的临时工顶替了我们的岗位，机器长让我们爱去哪去哪，又来了一个职位更高一点的人，让我们去找工头。工头告诉我们，临时工吃饭的时间是半个小时，流水线那边找不到人了，于是从计件的部门调过去两个人，让我们再回去也可以，但是要扣掉一个小时的工资。没有办法，车间是一个“平等”的地方，在这里，人的一切特征、劳动者的一切差异都被消除了，只有伺候机器的劳动力这一点，是大家仅存的属性。回到流水线上，我看到当晚的生产安排，是八万六千多本《知识清单》，看起来，这正是为了一个多月后的中考，所以，这批货是加急件。我想到了自己的初三时代，那时候，也是像这样，即使临近中考，也会有新的复习资料源源不断地到书桌上来。难怪资本家会以高出平时 10 元的日工资招人来加夜班。呵呵！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这就是“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另一边，在紧锣密鼓地印刷的，是一本小布尔乔亚的鸡汤文学，叫什么“谁的青春不迷茫”，翻开出版信息，可以看到 201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然而五月一日，已经是第四次印刷了。刚刚查了一下这本书的信息，原来这是一个系列，讲述了一个赚钱与爱情的故事，这本书里有一段名言：“我曾谈过一段恋爱，分手理由是因为我不够有钱。后来我拼命赚钱，却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个人。我曾被同事排挤，因为我不懂规矩。后来我懂了规矩，但再也不会用这个理由去刁难新同事。我一直和父母抗争，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我不那么好。后来我过得越来越好，我才知道他们只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这些年，我一直在试着了解：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更完整的自己。”唉，这些小布尔乔亚，来流水线吧，看看你永远也不会了解的悲惨世界，甚至摆到你面前你也不愿去了解的真实世界吧！看到这种书名，我也就笑笑，谁的青春不迷茫呢？别的人我不知道，今晚在流水线上劳作的十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青春就不迷茫：“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

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把这段话送给小布尔乔亚们——当觉得青春迷茫的时候，想想无限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都和你我有关，不，不用无限，就看看脚下，无处不在的、匍匐着的、为生活所迫的、异化的人们，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紧紧相连啊！谁会知道，哪一次骇人的经济危机到了，你赖以生存的工作就被资本主义的利己冰潮所吞没，你就会被甩入最悲惨的失业者的行列呢？是的，你没见过这冰潮，不过，它已经来了，它2008年就来了，它还没有离开我们，或许当你大学毕业之后，看到成群结队的待业工人与竞争激烈的考研大军，你就会明白：当工人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当然，你会认为，你和那些底层人士不一样，你将成为社会精英，然而，冷酷的现实迟早也会告诉你：坐在办公室里制作ppt的白领与血汗工厂里的大老粗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二者都是被雇佣的工人，只不过一个在发挥脑力，一个在运用体力罢了。

接下来就是最难熬的6个小时了，时间仿佛凝固了，渐渐地，巨大的噪音也不刺耳了，精力依旧充沛，可是却越来越不想思考，越来越不想说话——人已经麻木了。仿佛在车间里不断劳动，就是时间的永恒，一切疼痛也没有特别的感觉了，人变成了机器。书越摞越高，直到高得手臂再也伸不上去。另一边，计件的部门，书也堆得越来越高，人不得不站起来才能继续工作，椅子也成了摆设。这样的麻木状态，让人的一切热情都沉降下来，能看到的只有眼前的一摞书——纵即使是大学教授，让他来这里干一晚上，也会变得目光无神、思想麻木。然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嘲笑劳苦大众是“群氓”，这些“精英”们自以为掌握知识、掌握智慧，是高等的人。在丰富的物质条件中“自由发展”得满脑肥肠的资本家们也叫嚣着：“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不上进。”呵呵！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无产阶级的麻木和分散，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让劳苦大众不能全面发展，而资本主义的“精英”们，又反过来指责群众的愚昧与懒惰，还鼓吹什么“资本家是靠聪明勤劳致富”的童话，真是厚颜无耻，甩得一手好锅！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工人只能被看不见锁链囚禁在流水线上，不论工人有多努力，也不会被赏识，资本主义使用起人力来，绝不会在意人的健康，毕竟人口这么多，“边际成本”低嘛，死了一批就换下一批嘛！繁重的劳动拆解了工人的精神，让工人成为难以思考的零件，学习也成了镜花水月：一晚上的工资买不起一本书，就算是买了，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为了补充失去的精力，读书的时间又有多少呢？社会拿出它的一部分产品，让一些学者过上了优渥的生活，然而他们于世无补，于时无用，于科学知识毫无创见，于人类进步毫无作用，而他们却在诋毁真正的耕耘者，这不正是学界的荒谬之处吗？悲哀的是，这些“学者”们，还要继续霸占话语权，操纵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

工厂车间的窗户很小，说没有也不为过。资本家为了让工人变成不知日夜的活工具，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呵！8点到了，夜班结束了，只有换班的工人进来，才让人察觉出一丝不同。可是，又有什么不同呢？对于工人来说，没有奔头的人生，机械漫长的劳动，永不停止的机器，一切都和前一秒、前一分钟、前一个小时、前一天、前一个月没什么不一样。一夜，这一批订单，共八万六

千多本书，算是基本印完了。我又想到了一个笑话：资本家承担风险，获得收益。说得好像资本家是靠买彩票发财一样！没有订单，你组织个蛋生产，况且承担管理职能的，不也是你雇佣来的职业经理人吗？资本家承担的风险，莫非是成天花天酒地？要不就是数钱数到累死？嗯，好像也没其他风险了呢。工人的一夜，就这样完了，这一夜啊，也许这个厂的所有者在豪华别墅里过了激情的一夜，也许他去三环飙新买的豪车去了…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参与劳动，没有参加财富的创造。如今，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已经全然不需要这个资本家了，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无产阶级在负责，资本家的任务，只有一项，那就是扫一眼新的利润是不是到了自己的账户，仅此而已。就像皇帝的新装，资本家给自己披的“勤劳”的遮羞布，只差一个声音喊出来：“看啊，明明什么都没有。”揭开遮羞布，露出最核心的逻辑：我占有资本，所以我占有剩余价值。然而，那个声音又会说，“看啊，什么都没有。”一切都被无产阶级负责起来，资本家还留着干什么呢？

工作结束，又被装上了中介“高盛英才”的面包车，这次是一辆拉人的车，核载七人，实载二十七人。工作一夜的临时工们，脸上显露出奇怪的温顺，不会反抗，漫不经心，领了工资，各自散去。“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苛捐杂税榨劳苦，富人无务独逍遥！”很不幸，高唱着国际歌的革命者所要推翻的资本主义秩序，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重新扎下根来。本以为这只是阳光照不进的角落，仔细思考后却发现，这才是“高增长率”经济奇迹的实质。昔日公有制企业的工人，是关心国家、自觉劳动、积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主人；今日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者，是麻木、被迫、毫无动力、除了形状和机器无异的工具。不知前后差异，体现了什么，不知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又有几人发财，几人升官，几人化家为国？历史还在延续，这样的剥削，还会每晚进行，直到……

但是啊，我们不该沉沦，干草遍野，便可能野火燎原。是的，要求学生专注于下厂房去团结动员无产阶级，并不怎么现实。但是从麻木中觉醒，却也没有那么困难。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指南，不是僵死的教条，所以，不能像最爱喝人血的小布尔乔亚“推墙派”和“药丸党”一样，未经实践，就为无产阶级的觉悟和联合宣告死刑。我们不去打扫，灰尘是不会自己跑走的。工人精神的荒原，我们不去播种，资本主义造成的工人的麻木与相互隔绝，就难以自行消除。我们工作的第一步，应当是深入工人，用我们擅长、工人需要的东西来服务工人，也就是，传播我们的理论知识。之后，我们可以逐渐开拓工人的视野，在此过程中促成小范围的联合，然后推而广之，形成广泛的大联合。到那个时候，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进一步加剧，随着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外壳愈发无法容纳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剥夺剥夺者”的时机也就越来越成熟，最后，工人阶级就会把吃人肉肉的毒蛇猛兽一网打尽，并将彻底铲除社会不公的土壤。黑夜虽然漫长，且能遮蔽罪恶，但是黎明总会到来，鲜红的太阳总会照遍全球！

工资、利润和阶级斗争 ——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矛盾

2016-6-21

作者：远航一号

引言

本来是想写一篇与木清同志的商榷文章。在破土网上看到木清同志撰写的“中国工人工资上涨的真相——被！迫！还！摘！”，其中的一些观点，在左翼青年中，在这些青年的各式各样的“老师”们中，似乎都是很流行的。这些观点，不仅涉及到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涉及到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

搁置了几天，再动笔时，发现不得不认真地说明很多统计问题；除了统计问题以外，与木清同志的探讨还涉及到当前中国左翼进步学者和积极分子中间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概括起来有：

中国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的？是无产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还是资产阶级力量上升、无产阶级力量下降？哪个阶级在进攻，哪个阶级在防御？

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矛盾是什么，又是如何表现的？是工资太低、消费不足、生产过剩？还是有更加深刻、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基本性质是什么？有同志认为，为了解决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必然要输出资本、对外侵略，为此必然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和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为了争夺市场、争夺资源、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对于这种错误观点，我已经在其他地方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本文所讨论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的观点，也间接地批驳了这种“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立论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的前途是怎样的？在未来的阶级战争中，为什么资产阶级终究不能战胜无产阶级？为什么无产阶级终究可以战胜资产阶级？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

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篇幅不断扩大，成为现在这样大约四万字的小册子，希望能够成为下一步讨论的一个出发点。

木清同志的文章，原本是为争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是否上升。在本文初稿中，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估算的讨论就占去了前面大约一半的篇幅。现在接受读者的意见，将这部分讨论都移到后面的统计附录中。虽然是叫做“统计附录”，其实是全文立论的基础。所以，对于有兴趣或者虽无兴趣但是有决心的读者，仍然建议，在读完本文的“正文”部分以后，继续通读“统计附录”。关于统计问题的讨论，没有多少革命激情，也没有网络文章的调侃戏说，可能有些读者会感到枯燥乏味，有疲劳感。抱歉之余，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古人读书，要“头悬梁，锥刺股”，统计问题虽然枯燥，尚未严重到要“头悬梁，锥刺股”的地步。

革命工作是为了理想，所以是浪漫的，但是也是艰苦的，包括肉体上的和灵魂上的。为了搞清楚一定的问题，要有谦虚谨慎、耐心细致的研究作风，这或许也算是一种“艰苦”。这种“艰苦”，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仍然是缺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的通病——盲从和轻信——在进步的左派青年中也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着。与这种传染病做斗争，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没有特殊的捷径，只有积极地参加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中并且在革命队伍中经常地、反复地、彻底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劳动收入份额和阶级斗争

在本文的统计附录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劳动收入份额的统计问题。这—是因为在主流经济学家和左翼进步学者之间、在左翼进步学者内部，对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现状和趋势都有很大的争论；二是因为，要向很多同志特别是向青年同志说明，在阶级斗争（包括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也有一个革命和科学统一的问题。当我们要努力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把握其基本规律、认识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并且把这些认识运用到我们的实践中时，必须抱着科学的态度，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十分重视战争中的统计问题，对于敌我双方的伤亡俘数字都要严格统计、反复核实，并据此做出正确的战争决策。没有这样的态度，就不能够打胜仗。今天，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善于收集、整理和分析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为此，要有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摆脱网络时代作为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副产品的浮躁风气，不要一味地图方便、走捷径，但是也要努力将有限的时间、精力用在恰当的地方。在分析统计数据时，要讲究唯物辩证法，抓住问题的本质，而不要捕风捉影，揪其一点、不及其余。

由于中国革命传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断裂，也由于中国的阶级斗争、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过去半个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进步社会运动及其思想理论的发展，这就造成了，当中国新一代进步青年重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现成的理论武器，而且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发展。很多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营养来源，往往来自于传统版本的《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及其各种衍生物。

所谓传统版本，主要指的是斯大林时期由苏联官方认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即《社会发展史》，这种版本“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就是认为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社会发展论）和《政治经济学》教材。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教材，在我国解放后基本上被全盘接受过来，成为普遍使用的大中学教材。在中苏两党论战期间，毛主席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理论准备的过程中，曾经对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社会主义部分进行过反思和批判，但是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来得及对斯大林版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资本主义部分进行反思。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教材又成为中国大中学课程中普遍采用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教材（这种斯大林版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特色，还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历史流派，区别于九十年代以后经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歪曲篡改、已经完全丧失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各种大中学公共政治课程）。

到了本世纪初，当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又开始寻找和探索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的时候，这种上世纪遗留下来的斯大林版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各种衍生品又对当代中国大批马克思主义初学者产生了大量未必是积极的影响。这种斯大林版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中期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在大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和世界的阶级斗争形势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就更不能满足今天斗争的需要了。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分析方面，这种马克思主义往往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发展的规律理解成是两级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然面临持续不断的绝对贫困化或者相对贫困化。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方面，这种马克思主义往往简单机械地将一切经济危机都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或者绝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将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简单化地概括为“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样一种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形式不加思考、不加分析、简单机械地照搬到我们当前时代的做法，不仅无助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认识和分析，而且已经严重干扰到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进而可能导致左翼进步力量在面临未来的重大变化和斗争时在精神上、思想上都处于无准备的被动地位。

粗通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现代无产阶级必然会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光辉论断。但是，不得不说，很少有同志认真思考，马克思、

恩格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论断，是依据哪些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做出了这样的论断？有太多的同志，沉醉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一些描述，而对《共产党宣言》中更重要、更本质、更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部分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概括地说，是从两个方面讲的。一是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关于这一点，《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展开论述，《资本论》三卷数百万言也留下了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实际上是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后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发展也是曲折复杂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造成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壮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增长并最终成为劳动者中的大多数，而且必然会逐步地为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使得无产阶级在劳动场所和生活居住场所集中起来（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且又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在交通和通信方面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物质条件。由于有了这些条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总的趋势（当然会有短期和局部的曲折和反复），是造成无产阶级数量的壮大和组织的发展，从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越来越强大。这种无产阶级的逐步强大，最终将改变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由资产阶级占优势变为无产阶级占优势，最终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

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符合世界资本主义后来实际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北美、西欧），基本上完成了无产阶级化。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外围国家（前苏联、东欧、南欧、拉丁美洲大国、日本等），也相当程度上完成了无产阶级化。

为了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重大危机中摆脱出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重大的调整，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西方的无产阶级和非西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很大的让步（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去殖民化等），这些让步为无产阶级在许多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不仅是在西方欧美国家，而且在东欧、拉丁美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地方，都出现了工人运动高潮。这种高潮在政治上一度导致了世界革命形势，在经济上则普遍造成了利润率下降和积累危机。

正是为了应付世界范围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新自由主义才应运而生。所谓“新自由主义”，其本质特点，并不在于反对国家干预、主张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那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意识形态说教。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要向世界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使得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发生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变化，重建世界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所以，在韩

国、东欧、前苏联、拉丁美洲等地方，资产阶级往往都是以所谓“民主化”为契机，在统治形式方面做一些表面的调整，借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动摇和混乱的时机，趁机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许多国家几十年民族工业的建设毁于一旦，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北美、西欧的工人阶级虽然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仍然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劳动群众要优越许多，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他们的实际工资或者下降、或者停滞不前，原有的一些社会福利待遇也大大缩水。

所以，到目前为止，世界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都遇到了这样一种困境，也可以说是“怪圈”。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到了一定阶段，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也确实可以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但是，资产阶级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当着无产阶级的斗争开始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若干基本条件的时候，资产阶级会动员起他们所能掌握的全部力量对无产阶级进行反扑。

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大前提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只能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前提必须是稳定的和高涨的利润率，当工人阶级的斗争导致资本家利润率下降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资本积累进程的中断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这种危机也只有通过资产阶级的进攻和无产阶级的挫败才能得到解决。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全部经济史和全部政治史。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所以有的同志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会导致两极分化，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仍然要一意孤行推行新自由主义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短视和愚蠢吗？如果了解了，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在面对无产阶级力量增长以后而不得不进行的反扑，对于这些疑问就不难回答了。

如果不了解这个问题，那么，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而且也会妨碍乃至严重妨碍我们未来的工作。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乃至是决定性的方面，就是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巨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并且，作为一种历史的讽刺，还为这些劳动力装备了社会主义时期建设起来的完整配套的优秀工业基础设施。这就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原有的大量工业生产可以大批地向中国转移，大大地增加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可以支配的剩余价值，从而为世界范围利润率的高涨以及资本积累有利条件的恢复创造了一个最主要的条件。

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要是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服从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必然要带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从1990年至2014年，中国的非农业劳动者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40%增加到70%；城镇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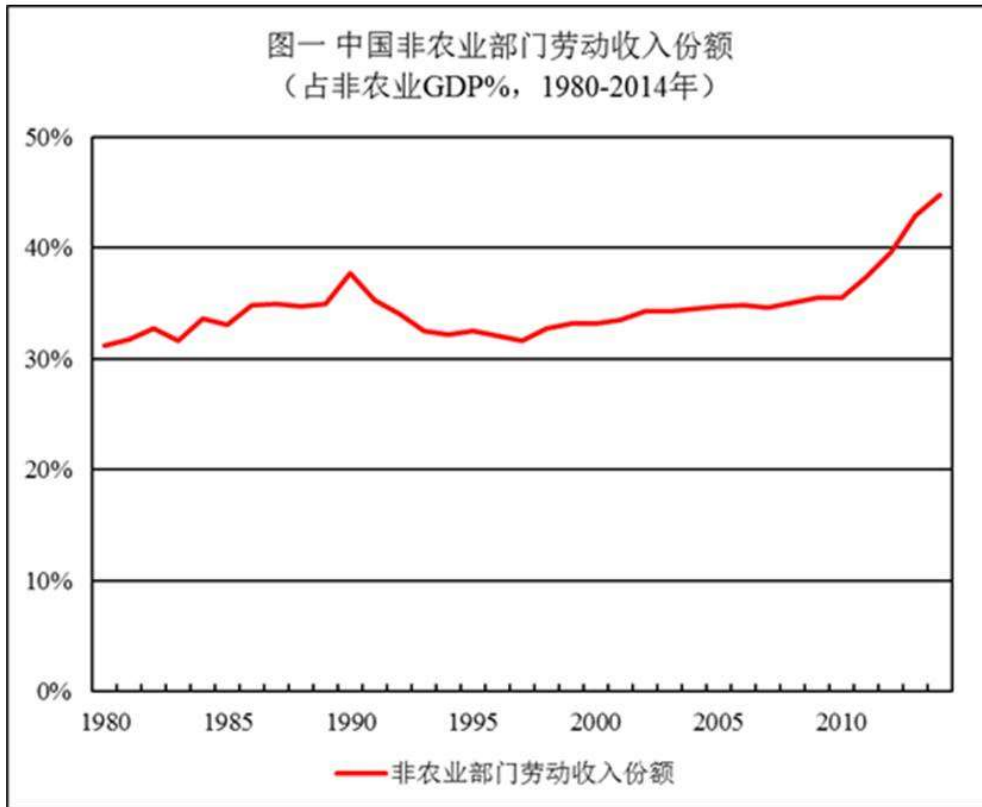
人员的比重从 26% 增加到了 51%；以工资收入为谋生手段的雇佣劳动者（按照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除个体以外的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之和计算）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 38% 增加到了 57%。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社会的劳动力结构已经接近无产阶级化的基本完成。

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不仅已经发展壮大，而且已经开始组织起来。这种发展壮大以及组织，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取决于一两部资产阶级的法律或者某些非政府组织、“独立工会”的存在与否。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行之有效的斗争，并且迫使资产阶级稍稍减少了剥削程度，这可以从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在资本主义时代第一次发生了对劳动者比较有利的变化得到证明。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国民收入分配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其他各个阶级为了争夺国民收入（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通过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而能够使用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结果，因而是能够反映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最全面、最直观的指标。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迫使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获得更大的一个份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无产阶级力量增长以外，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原因，还能够迫使资产阶级让渡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有些同志拒绝承认这一点，这在理论上和统计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下一节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本文的统计附录详细讨论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统计附录中所讨论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将整个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劳动收入既包括了非农业部门的工资总额和其他劳动收入，也包括了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但是，中国的采用雇佣劳动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几乎全部集中在非农业部门。一般来说，只是在非农业部门中，工人阶级才直接展开与资本家之间的经济斗争。要了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相互力量对比的变化，通过观察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情况，可以得到更直接、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图一说明了 1980 年以来中国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情况。

【图一】



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包括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以及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关于劳动收入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定义及其数据来源，详见统计附录）。从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阶级斗争的几个发展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总的来说趋于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快速增长，其占非农业部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4%上升到1990年的10%。当时，中国正处于全面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治准备阶段。1986年，国务院开始在国营企业中推行劳动合同制和所谓“优化劳动组合”，原来在社会主义时代长期存在的城市工人与国营企业之间的隐性社会契约开始被破坏。1987年起，国营企业全面推行所谓“承包责任制”，国营企业内部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靠拢。1992年1月，劳动部等部门发出《关于深化企业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也就是当时喧嚣一时的所谓“砸三铁”（砸掉“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开端。1990年至1994年，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从38%大幅度下降到32%。这就从阶级力量对比方面为后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确立做了准备。

以1992年的十四大决定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所谓“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私有化的时代。1997年，非

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历史上最低的 31.7%。经过城市工人阶级的反私有化斗争，至 2002 年，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回升到 34%。

2002 年至 2010 年，在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阶级关系相对平稳，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达到了某种暂时的均衡。到了 2010 年，中国的阶级斗争到了一个新拐点，在经受了资产阶级长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积聚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出现了明显上升的势头。2010 年至 2014 年，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从 36% 大幅度上升到 45%，已经显著超出了九十年代初的水平。

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一方面，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的确定无疑的标志。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即将要面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走出来的“怪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资本积累才能带来“经济发展”，但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工人阶级斗争在短期的成功必然要减少资本家的利润率，破坏资本积累，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资产阶级的反扑准备条件。

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基本的经济现实，真正的、勇敢的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决不应该采取视若无睹、掩耳盗铃的办法，一味地回避、拒绝承认这一客观事实，用各种貌似“政治正确”、“立场鲜明”的言辞来回避对资本主义经济客观运动规律的认识和分析（如有些同志现在正在做的）；而是应该正视这一现实，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这一现实，从长远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寻找到资产阶级的主要弱点和无产阶级的主要优点，并据此建立起我们胜利的信心。

中国的无产阶级，能不能解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够解决的历史性难题，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做成一番前人没有做成过的伟大事业，取得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过的伟大胜利？

用自己的伟大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物价和工资

写这篇长文的初衷是想要和木清同志探讨一些问题。木清同志在破土网上发表的“中国工人工资上涨的真相——被！迫！还！摘！”，立场鲜明，酣畅淋漓，那句结束语“可见不是本届人民不行，而是本届资本家不行”更可谓画龙点睛。木清同志的本意是揭露楼继伟、张五常等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嫁祸于工人阶级的阴谋，为工人阶级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正

义斗争摇旗呐喊、擂鼓助威，附带发泄一些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对现状的不满，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走向危机的黑暗前途。

读了木清同志的文章以后，我既有启发，又有思考，启发思考之余，还是不得不说，木清同志的论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统计数据方面都失之于粗糙，甚至于有些苍白无力，而不少具体观点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样，虽然眼前写起来痛快、读起来解气，终究是骂不倒敌人的，虽然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士气，也留下了一些副作用，甚至会妨碍许多进步青年中的骨干分子提高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水平。

本来，争论的焦点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中是否发生了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现象（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即工资份额上升、利润份额下降）。在讨论中，木清同志实际上采取了偷换概念的办法。一方面，木清同志似乎并不否认，近年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木清同志努力将问题改变为名义工资上涨幅度是否超过了物价上涨幅度以及实际工资是否上升。木清同志试图通过这种议题的转换来论证，工资上涨主要是物价上涨带来的乃至于迫使的，而与各种可能有利于工人斗争的条件无关（至少工人阶级没有得到某种假想的“劳动力价值”以外非分的工资——一个题外话：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又是怎样确定的呢？归根结底，是不是取决于阶级斗争呢）。但是，木清同志这样做，实际上有些弄“巧”成拙。因为既然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那么，一般来说，就意味着不仅实际工资必然是增长的，而且其增长速度还超过了按照实际产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而木清同志想要论证的结果（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没有超过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或者超过不多），就成了逻辑上必然被否定的东西。

设想我们已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通读木清同志的文章，并未见到木清同志对这个前提产生质疑；如果确有质疑，恐怕也很难为现有数据所支持；统计附录中的图十说明，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几种不同的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都显著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后者又等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减去就业人员的增长速度。所以：

$$\text{平均工资增长速度} > \text{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 \text{就业人员增长速度}$$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等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加上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所以：

$$\text{平均工资增长速度} > \text{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 + \text{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 \text{就业人员增长速度}$$

其中，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减去就业人员增长速度就是按照实际产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因此：

$$\text{平均工资增长速度} > \text{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 + (\text{实际}) \text{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所以，如果我们已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根据这个已知条件，就意味着，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必然超过通货膨胀率（即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和。因此，只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正（有谁会认真地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是负增长吗？），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就必然超过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

在上面列举的公式中，通货膨胀率用的是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如果用全称，就该叫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也就是为了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折算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使用的物价指数）。在实际生活中，工人阶级家庭一般不会用自己的工资去购买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投资品，而主要是购买消费品。所以，要计算可以反映工人阶级实际物质消费水平的实际工资，应当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

如果以 2009 年的指数为 100（这一年上述的两种物价指数都下降），2014 年，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是 116.9，五年间年平均增长 3.2%；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是 122.1，五年间年平均增长 4.1%。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增长速度还超过了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速度。所以，如果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已经显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增长速度，那么超过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速度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当然，木清同志可能会说，消费者价格指数被大大低估了。那么，真实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多少？如果消费者价格指数被大大低估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会不会也被大大低估？低估了多少？

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2009-2014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名义）平均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 11.8%；同期，非农业部门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9.8%（见统计附录图十）。如果要物价水平增长速度超过工资增长速度，物价水平必须年平均上涨 11.8% 以上，那么非农业部门按照实际产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年平均下降 2% 以上！这可能吗？

“产能过剩”和利润率

为了批驳楼继伟、张五常等，木清同志努力要论证近年来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不是由于工人斗争力量上升造成的。其实大可不必。为什么要害怕向资产阶级显示我们的力量呢？

为什么要害怕向工人阶级说明自己的力量呢？当然，宣传工作要讲究策略性，但是策略性不能违反原则性，包括不能有悖于事实，也要考虑到不要为了眼前的一时方便而造成长远的被动。

为了将物价水平上涨造成工资水平上涨的论点与工资水平上涨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上涨这一所观察到的现象调和起来，木清同志提出了这样一套解释：“产能过剩”导致了“经济下滑”，“经济下滑”导致利润下降，而“产能过剩”又是由于工人工资太低、消费不足带来的。

现在凡是要谈论中国经济，无论是“官员”，还是经济学家、主流媒体，乃至左派的大大小小的业余经济评论家们，似乎言必称“产能过剩”，木清同志自然也不免于落入俗套。但是，什么是“产能过剩”？有什么标准？有一些具体行业的生产能力是可以评价、可以衡量的。比如，煤炭工业的已建和在建生产能力据说有 50 亿吨，而 2015 年中国的煤炭产量不到 37 亿吨，产能过剩比较明显。但是，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整个的生产能力是多少？其中利用了多少？有谁测算过？凭着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是做不好经济分析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

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积累的危机，资本积累的危机是由利润率下降带来的。这些观点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总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经验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都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各卷中所论述的观点。

所谓利润率，就是利润和资本存量的比例（“资本存量”即资本家累计的总投资额减去历年折旧以后的余额）：

$$\text{利润率} = \text{利润} / \text{资本存量} = (\text{利润} / \text{产出}) * (\text{产出} / \text{资本存量})$$

利润率又取决于利润与产出之比（也叫利润份额，即资本家的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产出与资本存量之比（即产出资本率）。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矛盾，有时会因为工人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导致利润份额下降，有时会因为资本家的过度积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导致产出资本率下降，有时两者都会趋于下降。这些，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中，人们有时会将产出资本率进一步分解：

$$\text{产出资本率} = (\text{产出} / \text{产能}) * (\text{产能} / \text{资本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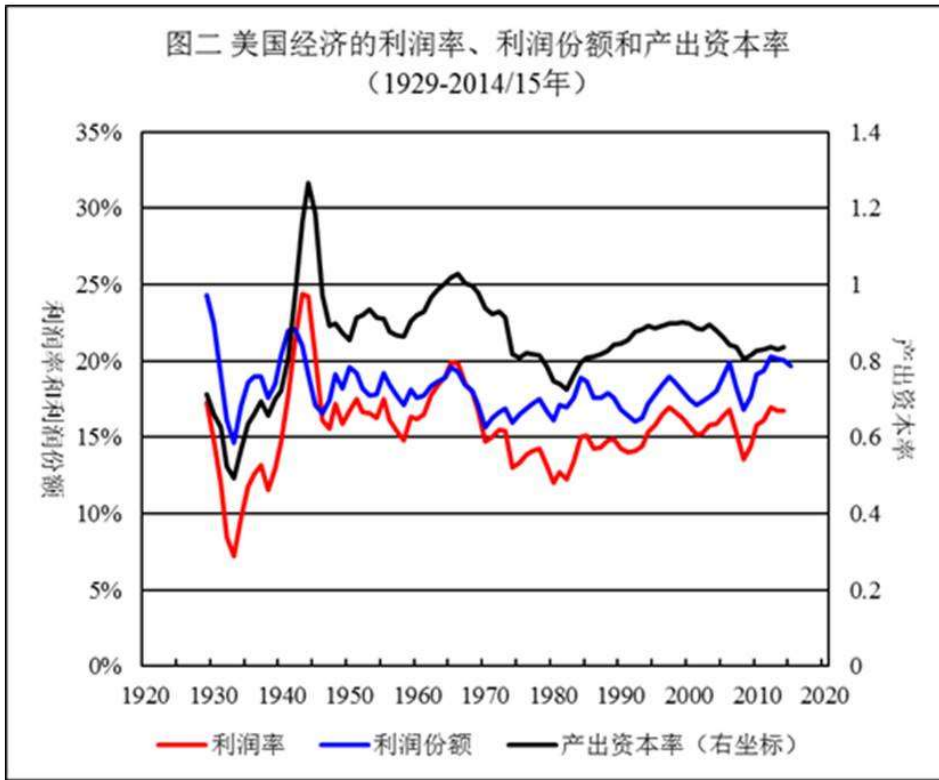
其中，产出与产能之比也叫能力利用率，产能与资本存量之比即产能资本率。这样分解的目的，是为了区分产出资本率下降（或者上升）的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长期的、技术性的因素导致过度积累，比如资本家为了抑制工资上涨的势头而采用高度自动化的技术，从而

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如富士康资本家正在做的用机器人代替工人），从而导致因为产能资本率下降而引起的产出资本率下降。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资本家不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设备、厂房、办公楼等，从而导致现有资本存量的能力利用率下降，因而出现产出资本率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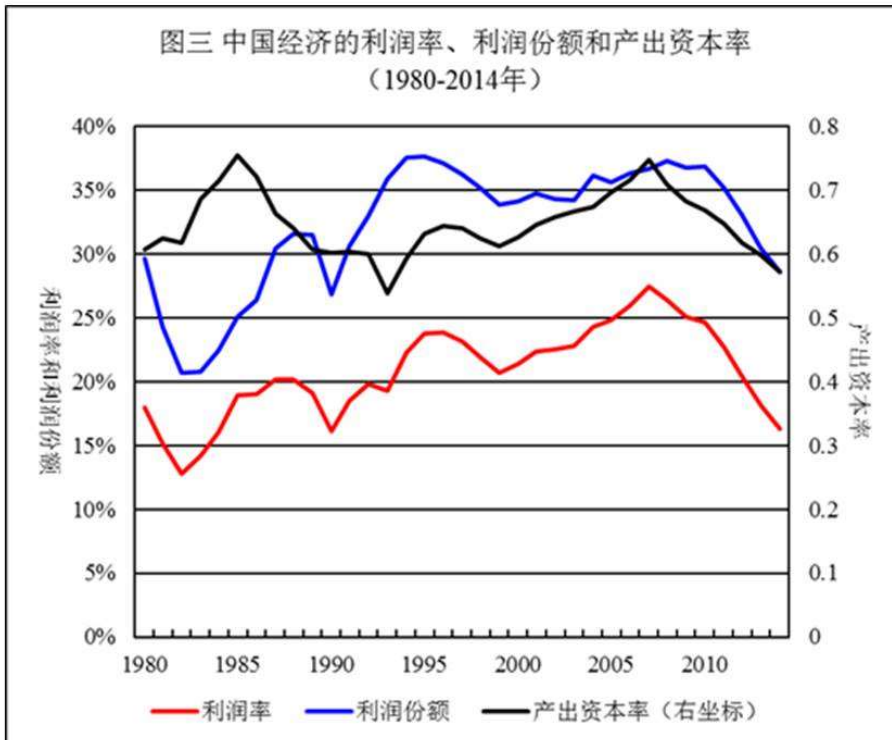
后一种情况，即由能力利用率下降引起的产出资本率下降（进而导致利润率下降）最接近人们（以及木清同志）目前所谈论的“产能过剩”。但是，七十年代以后，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发现，要准确地衡量整个经济范围的能力利用率，并不容易。资产阶级官方统计中没有这样的指标。在美国，联邦储备局发布历年的制造业能力利用率；但是制造业产值仅占美国全部经济产值的不到五分之一。中国连这样的指标也没有。即使有能力利用率的指标，除了明显的经济衰退时期外，也很难将其和整个经济的有效需求水平十分恰当地联系起来。因为能力利用率的变化可能受到需求水平以外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机器需要检修、垄断资本家故意保持过剩能力以遏阻潜在竞争者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实际研究中，人们一般将产出资本率在短时期比较突然、比较大幅度的变化与能力利用率的变化联系起来，而将产出资本率在较长时期的、趋势性的变化与技术性、结构性的因素相联系。

图二显示了 1929 年至 2014/2015 年美国历年来的产出资本率、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变化的情况（利润份额的数据至 2015 年，其余两项至 2014 年）。图三显示了 1980 年至 2014 年中国经济历年的产出资本率、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变化的情况。

【图二】



【图三】



首先看产出资本率（显示于右坐标）。1980年至1985年，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趋于上升，至1985年达到了0.75，就是说每100元人民币的资本存量可以产生75元的经济产值；与美国同年的产出资本率相比（0.81），差距不是太大。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的产出资本率趋于下降，至1993年下降到0.54。1999年至2007年，中国的产出资本率持续上升。2007年，中国的产出资本率达到了0.75。但是，在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出现了持续、大幅度的下降，至2014年下跌到0.57，与美国2014年的产出资本率（0.84）相比，要低大约三分之一，相当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产出资本率水平。但是，与美国大萧条时经济严重萎缩、四分之一的劳动力队伍失业的情况不同，中国近年来的产出资本率下降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非农业和城镇就业的迅速扩张以及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幅度上涨，所以属于比较典型的由于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产出资本率下降，类似于美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的情况（见图二）。

再看利润份额。利润份额是资本家的总利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这里说的总利润，包括资本家的利润、利息、租金等各种形式财产收入，具体来说，是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劳动收入总和（详见统计附录）、政府间接税和固定资本折旧。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在八十年代初曾经大幅度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导致包括利润在内的城市各部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下降。1983年至1988年，中国的利润份额从21%快速上升到近32%。1990年，利润份额一度回落到27%，此后又大幅度上升。1995年，中国的利润份额达到了近38%，相当于美国1995年利润份额（18%）的两倍以上。1995年至2010年，中国的利润份额一直保持在35%左右。然而，2010年以后，中国的利润份额出现了快速的、大幅度的下降，至2014年下降到了29%，与美国2014年的利润份额（20%）相比，仍然高9个百分点，但是，中国利润份额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是第一次在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劳动收入份额大幅度上升和利润份额大幅度下降的情况，这不仅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可能将被证明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利润率是资本家的总利润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1982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曾经一度下跌到不足13%。1987年和1988年，中国的利润率超过了20%。1990年，中国的利润率回落到16%，此后趋于上升。2007年，中国的利润率上升到了27%，达到了中国完成资本主义过渡以来的最高点，比美国同年的利润率（15%）高出12个百分点。2007年以后，中国的利润率出现了下降趋势。2010年以后，在产出资本率下降和利润份额下降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加速下降。2014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下跌到16.3%，已经低于美国同年的利润率（16.7%）。

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危机

在木清同志的文章中，也沾染了现在资产阶级网络上一些虚妄浮夸的习气，轻率地谈论所谓“经济下滑”、“经济下行”之类。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要在不久的将来陷入严重的、不可克服的危机，但是它目前还处于扩张的阶段。虽然利润率是在下降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指标，如产出、就业、销售额等还是在增长的。我们要严格区分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在日常运行中的表现（包括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的局部衰退）与这些矛盾真正集中爆发的危机时期，否则就会干扰到我们对阶级斗争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

如上所述，在 1995 年至 2010 年之间，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低产出资本率、高利润份额、高利润率。到了 2014 年，中国经济的特点已经变化为超低的产出资本率、仍然高但是趋于下降的利润份额和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以美国为参照）的利润率。

2010 年至 2014 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四年间累计下降了 8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约两个百分点。这个下降速度是十分惊人的。2010 年至 2014 年的利润率下降中，大约有五分之三是利润份额下降造成的，另外五分之二是产出资本率下降造成的。

利润份额的下降反映了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2010 年至 2014 年间，中国的利润份额下降了 8 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了 8 个百分点。目前还没有 2015 年的数据。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目前所发布的数据，2015 年与 2014 年相比，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6.4%；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 9.1%，而全国人口增长了 0.5%，所以全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大约增长了 9.6%；另外，农民工总量增长 1.3%，农民工平均收入增长 7.2%，即农民工工资总额大约增长了 8.5%。根据这两个指标，劳动收入总和在 2015 年有可能增加了 8.5-9.5%，比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两到三个百分点。这大约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了约一个百分点、利润份额下降了约一个百分点以及利润率下降约 0.5 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现在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产出资本率在短期的变化趋势是比较确定的。2014 年的产出资本率是 0.57，相当于资本产出率（产出资本率的倒数，也就是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 1.75。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总投资减去折旧）现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9%。所以，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约为 11%（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除以资本产出率），比目前的官方经济增长率（约 7%）快 4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产出资本率和利润率都要按照每年约 4% 的速度下降。按照现在的利润率水平（约 16%），这意味着利润率每年要下降 0.6 个百分点。

将利润份额的下降与产出资本率的下降相加，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在未来几年大约仍会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按照这个下降速度，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在五、六年内，就有可能跌破 10%，也就是美国经济在大萧条最严重时期的利润率水平。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利润率也不能简单可比，但是，还是可以说，利润率，作为一种可测量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指标，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为多次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大变化所验证。随着中国经济的利润率跌向 10% 左右，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重大、不可克服危机的可能性将会逐年增长，并且经过一定条件的积累，这种可能性将转变为确定性。这个结论是可以下的。

影响产出资本率的因素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会比美国的产出资本率低大约三分之一并且仍在趋于下降？从统计上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并且将其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结合起来，而不是笼统地、似懂非懂地谈论所谓“产能过剩”？毛主席教导我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行的。

产出资本率的倒数是资本产出率。资本产出率与马克思讲的“资本有机构成”有密切的关系。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发展趋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理论上和统计上都有很大的争议。概括地说，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内，无法从理论上来说明，在长期为什么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速度必然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而资本有机构成必然趋于上升。人们只是从经验上发现，资本劳动比率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情况在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实际工资快速增长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

从数学上说，如果已知经济增长率以及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暂且忽略固定资本与其他商品和劳务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则产出资本率在长期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就是说，给定上面两个条件，无论产出资本率是上升还是下降，在长期都会趋近于由上述两个条件所决定的均衡产出资本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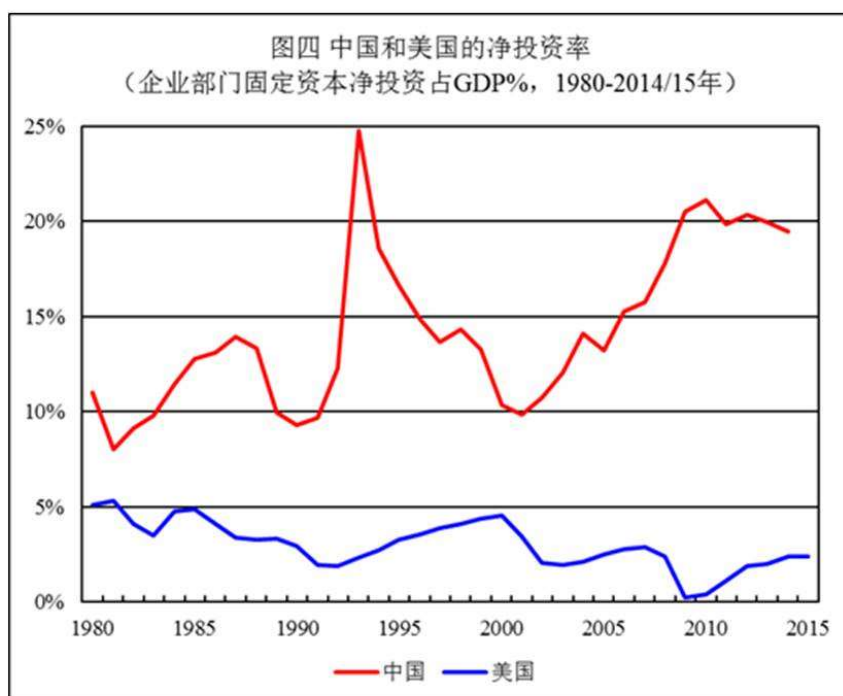
$$\text{均衡产出资本率} = \text{经济增长率} / \text{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以中国经济为例，中国现在的官方经济增长率约为 7%，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9%，因此按照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来计算的均衡产出资本率就是 0.37（注意所采用的净投资指标要与所计算的产出资本率中所使用的资本存量指标相匹配）。中国现在实际的产出资本率是 0.57，因此中国的产出资本率仍然会趋于下降，而且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不过，随着产出资本率的下降，如果净投资占产出的比例不变，就意味着资本增长速度逐步放慢（资本增长率 = 净投资 / 资本存量），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就会逐步缩小，从而产出资本率下降的速度也会逐步放慢，直至完全停止下降。这时，产出资本率就在理论上达到了均衡。

在上面的决定均衡产出资本率的公式中，均衡产出资本率与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成反比。所以，在经济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越高，长期的产出资

本率就会越低。图四比较了中国和美国 1980 年以来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情况。其中，中国的数据至 2014 年，美国的数据至 2015 年。

【图四】



近年来，美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即使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由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所谓“新经济”），美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也仅仅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4% 左右。在上一次经济扩张的最后两年（2006-2007 年），美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2009 年，美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仅有国内生产总值的 0.2%。在本次经济周期中，至 2015 年，美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才恢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4%。

按照人们想象的经典的资本主义形象，资本家虽然残酷剥削工人，但是在努力发家致富以后，除了个人享受之余，也用剩余价值的相当一部分来投入扩大再生产，扩大社会财富。与这种想象中的经典资本主义形象相反，现在美国资本家的总利润中，大约有 90% 都不再用于生产性的投资，而是用于资本家个人的挥霍浪费以及进行金融投机。就金融投机来说，美国资本家每年购买的政府债券、提供给居民部门的各种贷款，现在占到美国资本家总利润中很大的一部分，根据

不同年景，分别占到美国资本家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用于维持政府的赤字开支以及为工人阶级家庭购买住房、借债消费提供资金来源。

相比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倒是颇为符合“经典”的资本主义形象。中国资本家总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使用于生产性的资本积累。1980年至2005年，中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一般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0%至15%之间波动。1993年，爆发了一次投资“大跃进”，由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暴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一度跃升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5%。2005年至2009年，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上升。2009年以来，这个比例一直稳定在20%左右。

为什么中国资本家要把总利润中这么大部分（现在大约已经占到中国资本家总利润的三分之二）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挥霍浪费掉或者像美国资本家那样从事大量的金融投机呢？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里说一下笔者的初步看法。中、美资本主义在剩余价值使用方面的巨大差别恐怕反映了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各自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同地位。

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即在国际贸易中以较少的本国劳动交换较多的他国劳动）可以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获得巨大数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即在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生产出来、却通过不平等交换转移到美国等核心国家的剩余价值。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种超额剩余价值，仍然使得美国有条件一方面维持本国劳动人民较高的物质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以金融利润的形式保证美国资本家的投资仍然可以获得比较满意的利润率（见图二，美国资本家的利润率目前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最高水平，利润份额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最高水平）。

与美国不同，中国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从事出口制造业为主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工业国。中国资本主义承担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业生产以及实际的剩余价值生产的相当大一部分。中国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又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美国等核心国家。为了承担出口制造业的职能以及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必须进行大量的实物资本投资，以此来满足世界资本主义对工业品的需要并保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为此就要求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维持超乎寻常的高投资率，而这种高投资率又造成了中国经济产出资本率的快速下降，进而又导致了中国经济利润率的快速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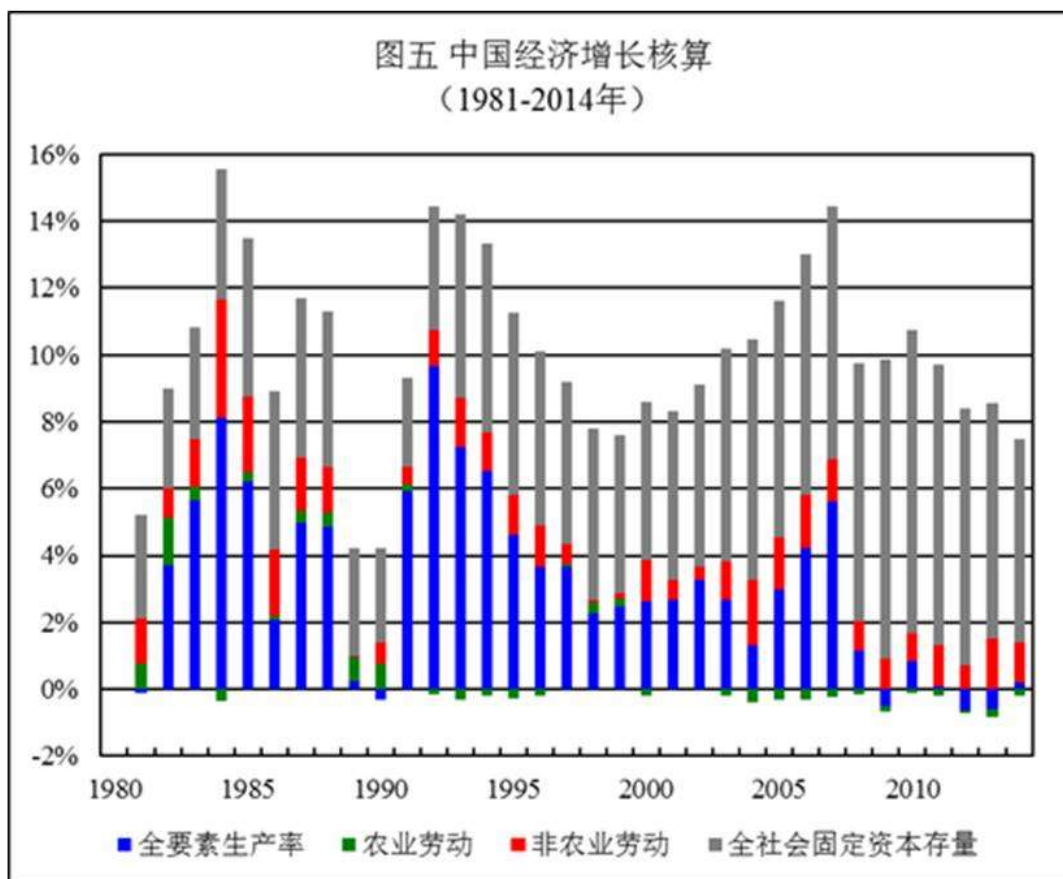
除了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外，影响中国经济产出资本率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中国经济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在上面计算均衡产出资本率时，先假设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不变，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势必要趋于下降。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多少呢？

下面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核算来评估一下中国经济在长期“可持续”的增长速度。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核算依据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本身是反动的。但是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借用这种方式来了解一些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趋势。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的来源可以分解为劳动增长的贡献、资本增长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把劳动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分解为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和非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

图五说明了中国经济在 1981 年至 2014 年经济增长核算的情况。其中，在计算资本增长贡献时，资本量用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来代表，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包括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

【图五】



在图五中，每一年柱形图的总的高度代表那一年的官方经济增长率，其中每一种颜色段的高度分别代表某一种“生产要素”或者全要素生产率所贡献的增长率。比如，198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9%，其中，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绿色）是1.4%，非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红色）是0.9%，固定资本增长的贡献（灰色）是3.0%，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蓝色）是3.7%。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业劳动增长平均每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约为0.5%。在1991年以来的各年中，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且近年来多为负值，可以忽略不计。自1985年以来，非农业劳动增长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在一个百分点上下，约占中国多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10%。

固定资本增长是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固定资本增长的贡献占全部经济增长的30-60%；2001-2010年，固定资本增长的贡献占60-70%；2011年以来，固定资本增长的贡献竟然高达90%。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反映的是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按照这一观点，中国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健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经济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其中，199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竟然达到9.6%。2001-201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仍然保持在2-3%，其中2007年达到5.6%。但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六年中有三年下降。2011-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下降0.2%。

对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来说，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或下降的实际意义是，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有可能同时满足工人阶级提高实际工资的要求和资本家提高利润率的要求，并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越高，资本主义经济就越可能实现较高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或者较高的利润率增长率。当然，这种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利益”到底如何分配，要取决于具体的阶级斗争。

反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同时满足工人阶级提高实际工资的要求和资本家提高利润率的要求。这时，如果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继续增长，则资本家的利润率势必下降。或者，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增长，但是增长率很低，而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比较快，情况也类似，资本家的利润率也不得不下降。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同时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工人平均工资快速增长以及资本家利润率下降的情况。这种经济现象就是这里所做分析的具体例证。

在长期，当产出资本率趋于均衡，从而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一致的时候，经济增长率会趋近于一个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

$$\text{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 = \text{劳动投入增长率} + \text{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 \text{劳动收入份额}$$

在中国，如上所述，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可忽略不计。集中讨论非农业劳动投入的增长率。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员已经达到全部就业人员的 70%，以后如果每年非农业就业份额仍然上升一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增长 1.25-1.4%（分别按照非农业就业份额 80%和 70%来计算）；另外，如果总的就业人员还能保持每年 0.5%的增长率，与 1.25-1.4%相加，就意味着非农业劳动投入每年可以增长 1.7-1.9%。

若干与中国情况相类似的半外围国家（如波兰、巴西、韩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当非农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超过 70%、接近 80%的时候，社会结构可能发生激烈变化，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物质利益以及更广泛政治、社会权利的斗争可能会高涨，进而导致全面的经济、政治危机。中国资本主义正在迈入这个“危险期”。即使中国的各种经济和政治矛盾在这个“危险期”中暂时不爆发，当非农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例超过 80%以后，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转移也会显著减少，从而非农业就业人员增长速度会显著放慢。

如果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数年仍然没有起色，从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零或者是负数，那么中国的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就不会超过 2%。如果乐观估计，假设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能够恢复到 1%左右，再假设劳动收入份额约为 50%，那么中国的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到 4%。所以，中国的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大约是 2-4%。在各项假设的参数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逐步放慢，直至下降到“稳态”经济增长率的范围内。

这对于中国长期的产出资本率以及利润率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暂且假设企业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变，仍为 19%。如果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是 2%，长期均衡产出资本率就会下降到 0.11；如果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是 4%，长期均衡产出资本率也只有 0.21。

即使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到 10%，如果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是 4%，长期产出资本率也不过只有 0.4，比中国现在的产出资本率（0.58）仍然要低大约三分之一。

如果中国工人阶级经过斗争，将劳动收入份额从现在的约 45%再向上提高几个百分点，提高到 50-55%，就可以将资本家的利润份额压低到 20-25%。按照这样的利润份额以及 0.4 的长期产

出资本率，中国资本家的长期平均利润率将仅有 8-10%。历史经验证明，这样低的利润率（大致相当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大萧条时期的利润率）将无法保证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

况且，企业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从 19%调低到 10%，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要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约 10%，就需要相应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会直接导致资本家的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大幅度调低企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会妨碍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占领国际市场，乃至动摇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地位。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属于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这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矛盾。

因为中国资本主义主要承担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制造业生产，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并且为无产阶级的集中和组织准备了各方面的条件。这个基本趋势，是由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会以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不会因为一两部资产阶级法律的存废而受到影响。

事实上，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在经过了资产阶级长时期的肆意剥削和压迫以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初步壮大起来。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资产阶级斗争力量下降的局面。这种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反映在资本主义的国民收入分配上，就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在近年来持续地、大幅度地上升。

同样由于中国是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国家，这就要求中国的资本家将总利润中很大的一部分投资于工业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这就造成了中国经济中大大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而造成了中国经济超低水平的并且仍然趋于下降的产出资本率。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而不是核心国家，属于剩余价值对外转移的国家而不是自世界其他地区向本国输入剩余价值的国家，因此，中国资本主义无法像美国资本主义那样通过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缓和内部的阶级矛盾并为资本家提供满意的利润率。在经济指标方面，这就表现为中国经济产出资本率的大幅度下降、利润份额和利润率的大幅度下降以及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或者负增长。

因为上述这些变化，中国的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局面，中国工人阶级即将面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上世纪中后期曾经遭遇的困境。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可能使资本主义的国民收入分配在一个时期内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而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但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暂时胜利，必然要导致利润份额和利润率的下降，并威胁到资本积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资本积累的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全面紊乱，并迫使资产阶级动员其所能动员的全部力量向工人阶级反扑。到目前为止，遇到了上述困境的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都以历史性的失败告终。能不能突破这个历史“怪圈”，是中国工人阶级即将面临的伟大历史挑战。

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御用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媒体纷纷发表言论，叫嚣要进行所谓“供给侧改革”，要修改本来也没起什么作用的《劳动合同法》，还抓了几个工运积极分子。但是，仅仅靠这些小动作，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目前工人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的态势的。这是因为，目前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发展，靠的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宽容，也不是靠几部资产阶级法律，更不是靠少数各种政治派别的“良心人士”。从根本上来说，目前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发展，是中国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带来的，是中国人口结构、就业结构、阶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以后必然要产生的结果，是因为中国农村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产业后备军开始缩小，是因为中国劳动力队伍的无产阶级化，是因为在长期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在积累、阶级觉悟在提高、组织能力在增强。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上升，其原因是结构性的，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带来的，只要中国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期，只要城镇就业、非农业就业仍然在增长，目前的阶级力量对比态势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综合目前各方面情况，资产阶级上层的决策人物，目前还下不了决心，通过主动制造大规模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的办法来压迫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各种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估计会继续下去，直至中国爆发真正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为止。

两大阶级真正的决战应当在这种真正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初步的判断，即中国工人阶级在未来几十年的长期斗争中，有没有胜算？胜算几何？

应当说，在未来的斗争中，在工人阶级方面存在着重大的不利条件。主要的不利条件，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无准备的。虽然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已经有了增长，虽然在现实阶级斗争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斗争积极分子，但是真正站在阶级立场上自觉的（而不是从个人、小群体的直接经验和直接利益出发的）、尤其是能够认识到工人阶级长远利益和历史使命的积极分子还是极少数。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左翼进步力量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并且近年来出现了青年化的趋势，吸引了几乎全部的政治上有觉悟、有理想的青年（而不是一般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中挣扎的青年）。自发的、没有外部资助的、政治上受限制受压迫却仍然充满活力的左派青年

团体遍布全国，而右派（自由派）方面则几乎没有这样的团体。然而，这种左翼进步力量到目前为止几乎全部地局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仍然处于很初步的状态。

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无准备决定了，在未来的重大斗争中，工人阶级不可能在短期内突破现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束缚，也不可能短期内从政治上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因而斗争必然是长期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这一重大不利条件，是主观方面的，因而是暂时的，是可以并且必然要在未来的斗争中随着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而逐步得到克服的。

在资产阶级方面，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各国资产阶级不同，在未来的重大斗争中，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具备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这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上升，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自身带来的；只要中国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仍然发展，造成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上升的各项客观条件就不会消失，因而任何工人阶级的挫败只会是短期的、暂时的。

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在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当工人阶级力量上升造成利润率下降和积累危机后，资产阶级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不是暂时的胜利），比较长久地恢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必须要寻找到一块新的地理区域，这块地理区域要能够提供相当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其他各项必需条件。在二十世纪晚期，中国提供了这样的地理区域。目前，世界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以外再寻找到一块足够大的地理区域，可以提供数量、质量都与中国的劳动力相当而且又足够低廉的劳动力队伍，并且还要提供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和政治条件。印度等地方，虽然劳动力数量巨大且廉价，但是在劳动力队伍的健康水平、文化水平、技能等方面落后中国约二十年；基础设施落后且资产阶级国家的运转效率低下；严重的能源、环境约束，从根本上排除了印度成为“第二个中国”的可能。

由于资产阶级不能够对工人阶级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只有寄希望于通过大规模经济危机，通过制造大规模失业，临时重建产业后备军的办法，来逼迫工人阶级退却。这种办法，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定会采用的，并且还可能配合以类似“休克疗法”的政策（比如，大幅度紧缩货币供给、提高利率、全面金融自由化等），主动加重经济危机，来增加工人阶级的困难。当资产阶级一开始采取这种办法时，也会是穷凶极恶、来势汹汹的。有些同志，可能会被资产阶级表面的嚣张气焰所迷惑、所吓倒，以为资产阶级已经占了上风，以为历史的车轮又倒转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将是大可不必的。未来中国资产阶级的“休克疗法”，将被证明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一样，看起来十分凶恶，短期内也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的困难，但是归根结底，属于“兔子尾巴长不了”。

经济危机不仅会增加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困难，也会增加资产阶级的困难，大批资本家将破产跳楼，其余的中小资本家也将惶惶不可终日，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会发生严重动摇。

在危机期间，工人阶级除了开展广泛的经济斗争、反失业反欠薪以外，还可以将在岗工人的斗争与失业工人的斗争结合起来，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向失业工人提供救济，增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困难。左翼进步团体可以参加到广泛的群众斗争中（不限于左派领导或者影响的斗争），将资产阶级的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的崩溃。通过这些斗争以及资产阶级自身的困难，来迫使资产阶级政府放弃“休克疗法”的政策，转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由于导致工人阶级力量上升的各种客观因素继续存在，一旦资本主义经济转入扩张，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就可以很快地得到恢复，并造成新的利润率危机和积累危机。

这样，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就可以形成拉锯战的局面。在反复的拉锯战中，工人阶级将在广泛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得到锻炼，在斗争中将产生一大批觉悟大大提高了的工人积极分子；这些工人积极分子将与越来越大量的左翼进步分子有机地结合起来。工人阶级就将不仅成为一支强大的经济斗争力量，而且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斗争力量。

不仅如此，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复拉锯斗争中，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他劳动群众因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利益得不到解决，也将逐渐地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丧失信心和耐心。在政治上，他们将整批整批地向工人阶级靠拢，从而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资本主义联盟创造条件。这样的联盟一旦形成，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对工人阶级根本有利的变化。

在整个的两大阶级拉锯搏斗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具体统治形式是无关紧要的，不是影响两大阶级力量对比的基本因素。资产阶级的任何统治形式都解决不了未来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

概括来说，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之间在未来的重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严重的困难。无产阶级的困难是主观方面的，是暂时的，是可以在斗争中逐步克服的；资产阶级的困难是客观方面的，是长期的，是由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所决定的，因而是不可克服的，并且资产阶级的困难必将随着斗争的发展而日益加重，直至将资产阶级的统治完全压垮为止。

统计附录：1990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近年来，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趋势和原因，在主流经济学界和左翼进步学界，都产生了相当的争议。去年以来，楼继伟等高级官员多次发表言论，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是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主张“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劳动合同法》要照顾资方，工资增长不得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等。

对于楼继伟的观点，很多左翼进步学者和积极分子都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大体上是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不“僵化”，而且对资本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管束，《劳动合同法》也没有起到它本应发挥的作用；中国工人工资近年来的上涨主要是物价、生活成本上升造成的，资本家的利润率下降主要是产能过剩带来的，等等。另外，在左翼学者内部，对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具体情况及其原因，也有不同意见。

在这篇统计附录中，我将详细介绍我个人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利润份额和资本产出率（即产出资本率的倒数）的估计并进一步说明如果通过所观察到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考察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

因为不是正式的学术论文，而只是讨论文章，对于数据来源和参考文献等，只做一般性的介绍，不做具体的、符合学术标准的引用。我个人对相关数据来源的真实性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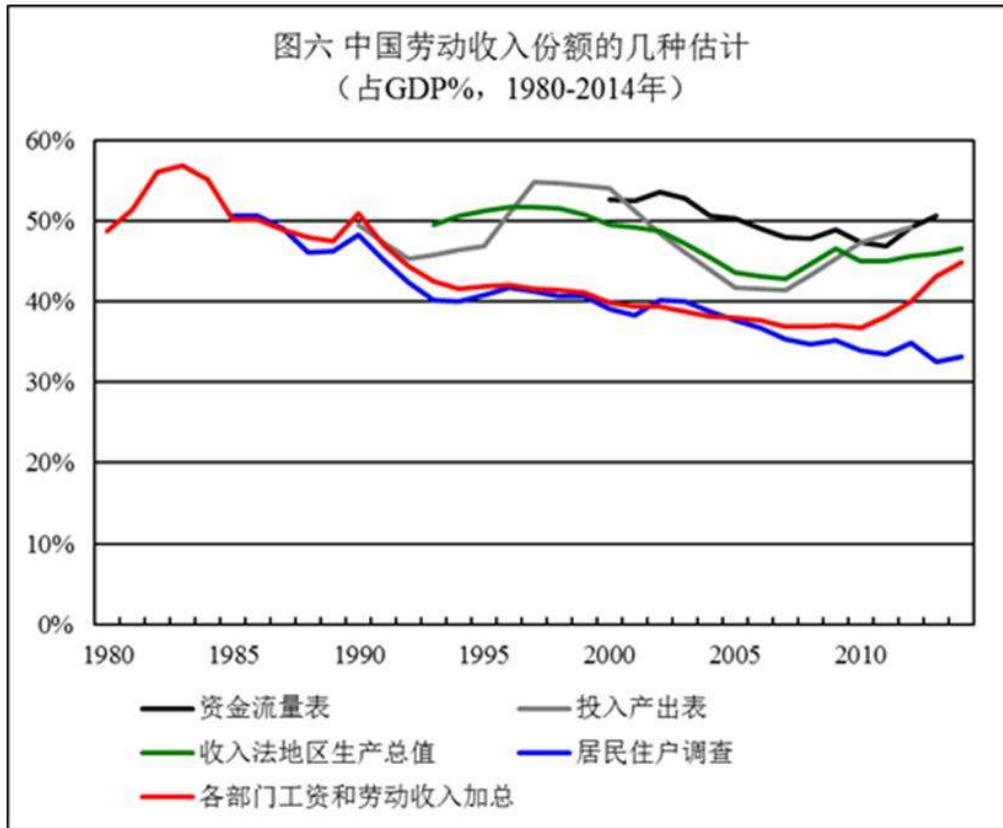
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几种估计

所谓劳动收入，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得的工资、福利或者从事主要依靠自身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不剥削他人或者仅有少量剥削的小生产活动而获得的收入。与之相对立的，是资本家通过资本主义经营和投资活动而获得的利润、利息、租金等，统称资本收入。

所谓劳动收入份额，指的是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总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资本主义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中，按收入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了包括劳动收入、资本收入以外，还包括政府间接税（如关税、增值税、销售税）和固定资本折旧。

由于中国官方国民收入统计的不完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统一的、来自官方统计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无论在主流经济学界还是在左翼进步学界，目前也还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估算方法。

【图六】



图六比较了几种不同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计算方法。其中，前四种直接来自于官方数据，最后一种（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则是笔者以官方原始数据为基础估算的。下面简要地说明一下各种官方估计方法的结果以及相互之间的优劣。

官方方法中的前三种，分别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其中，资金流量表包括2000年至2013年间的各年数据（资金流量表在2000年以前的数据与2000年以后的数据在统计口径上有很大的不一致，这里不再考虑资金流量表在2000年以前的数据）。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即按收入法计算的各省市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包括1993年至2014年间的各年数据。投入产出表则是自1990年开始，每隔两至三年发布一次，目前发布的最后一年是2012年。

上述三种方法，都分别发布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增加值之和）。投入产出表和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发布增加值之和或地区生产总值在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即资本收入）、生产税净额（即政府间接税）和固定资本折旧之间的分配；资金流量表则仅发布劳动者报酬和生产

税净额。原则上，只要用劳动者报酬除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增加值之和）就可以得到劳动收入份额。对于数据缺失的年份，则假设劳动收入份额在最靠近的两个有数据年份之间取直线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表所公布的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或增加值之和）与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并不一致。所以在计算劳动收入份额时，要分别与每一种方法自身所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相一致。

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2002年至2011年由近54%下降到47%。2013年，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回升到51%。

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1992年至1995年约为45%，1997年突然出现大幅度上升，2000年至2005年趋于下降，2007年以后趋于上升。以往，因为投入产出表与资金流量表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大多数年份都显著低于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然而，在2012年，二者的统计口径似乎已经调整为一致，因而根据两个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均为49%。

根据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加总计算而得的劳动收入份额，其统计口径也发生过变化，而且各省市自治区调整统计口径的年份还不一致。概括来说，按照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7年至2010年间的变化趋势与投入产出表大体一致，近年来则稳定在45-47%的水平。

上述三种计算劳动收入份额的官方方法，依据的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概念，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也都无法在经过批判分析以后有效地用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上述三种方法，在以往各年都发生过统计口径的变化，并且各自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水平和变化趋势并不一致。这就使得研究者无法运用现有数据对不同时期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此外，上述三种方法虽然公布了按照各自方法所计算的劳动者报酬总额，但是他们各自所采用的劳动者报酬的具体定义、组成成分和详细数据来源却并不公开。其他研究者对于这三种官方方法的数据合理性和可靠性无法进行独立验证，因而也就很难展开有学术意义的讨论。

官方方法中的第四种，是以国家统计局的城乡居民住户调查为基础，另行计算劳动收入总额。国家统计局在居民住户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发布历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将上述各项分别乘以历年的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然后再加总，就可以得出劳动收入总和；然后再除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得到劳动收入份额。

按照居民住户调查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包括 1985 年至 2014 年间的历年数据。按照这种方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幅度下降，由 1990 年的 48% 骤减为 1993 年的 40%；此后，一直到 2003 年，基本保持稳定；2003 年至 2011 年，趋于下降，至 2011 年下降到不足 34%。2013 年，因统计口径变化，按照居民住户调查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 32%，2014 年回升到 33%。

居民住户调查，其可靠性，受到选取样本以及被调查者提供情况真实性的影响。如果选取的样本不具备代表性，就可能高估或者低估劳动收入。另外被调查者可能隐瞒一部分真实收入，或者隐瞒收入的真实来源，比如将一些非劳动收入划入劳动收入的范围。从长期平均的观点来说，这些误差可能会相互抵消，但是在短期、在局部，可能导致与真实情况比较大的偏离。

下面会详细介绍笔者所采用的估算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方法（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其基本意图，是以官方统计数据中相对最为可靠、同时也覆盖最多就业人口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为基础，尽可能采用自 1980 年以来统计口径始终一贯的指标，分别估算各类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最后再加上单位（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和其他福利等未向劳动者直接提供的劳动报酬，从而得出劳动收入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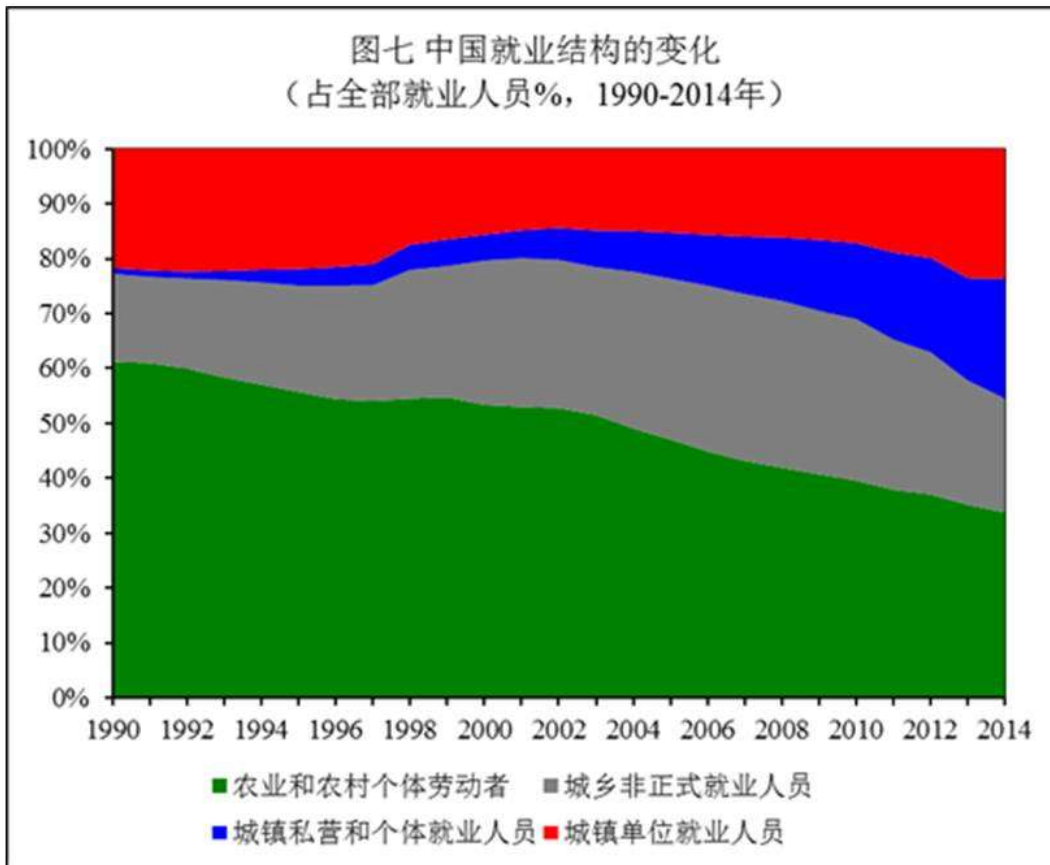
通过保持统计口径前后一贯，就可以对各个年份、各个时期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有意义的对比，进而结合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展开分析。为此，首先要说明中国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以来在就业结构方面的变化。

资本主义发展和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趋势性变化。一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批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因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由九十年代初占全部就业人员的约 60% 下降到现在的约 30%；再就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社会主义残余的消失，非农业就业本身发生了“非正式化”，也就是原来劳动者权利较有保障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正式”经济部门大大萎缩，而劳动者没有权利或权利没有保障、资产阶级政府的法律也不能有效约束的大量私营、个体“非正式”部门则快速扩张。

图七说明了中国各类就业占全部就业人员比例变化的情况。

【图七】



1990年，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即通常所说的“务农农民”）和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个体劳动者有39600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6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当时的名称是“城镇单位职工”）有14100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22%。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有670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1%。除了上述三类部门以外的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10400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16%。

当时的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中，大约有2300万属于城镇非正式就业人员，8100万属于农村非正式就业人员。1990年，乡镇企业职工总数为9300万人，外出农民工约2200万人。外出农民工中，约40%属于进城农民工，另外60%属于在外地农村打工的外出农民工。所以，当时的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大约90%属于乡镇企业职工，其余则多为进城农民工。

至2000年，在经历了九十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面确立，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村的农业和非农业个体劳动者的总数下降到了38500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下降到了53%。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总数大幅度下降到了11300万人，占

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下降到了 16%。另一方面，城镇私营和个体单位的就业人员迅速增加到 3400 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增加到了 5%。

在九十年代，扩张幅度最大的就业类型是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至 2000 年达到了 18900 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达到了 26%。其中，8500 万人属于城镇非正式就业人员（几乎相当于 1990 年的四倍），10500 万人属于农村非正式就业人员。当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 12800 万人，进城农民工估计为 4200 万人。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中，大约 70% 属于乡镇企业职工。至 2006-2009 年，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总数保持在近 2.3 亿，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了 30%。

2008 年以来，中国的就业结构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农村的农业和非农业个体劳动者的数量加速下降，至 2014 年已经减少到了 26100 万，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大幅度减少到了 34%。另一方面，在非农业领域，中国的就业结构出现了某种“再正式化”的倾向。这种“再正式化”倾向，部分是由于统计范围的变化，如 2013 年，部分原乡镇企业就业人员被调整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但是主要地，是反映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扩大企业规模，也要求资产阶级国家加强执行其已有的一些制度、法律。除此以外，广大劳动群众以及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为了争取劳动者权益而进行的斗争，也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对阶级关系做了某些调整。

2002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下降到了 10600 万人，这也是历史最低点。此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数量缓慢回升；2008 年以后，加速回升。至 2014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达到了 18300 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了 24%，甚至超过了九十年代初的水平。

2000 年以来，城镇私营和个体单位的就业人员继续迅速增长，至 2014 年，已经达到了 16900 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了 22%。另一方面，至 2014 年，官方就业和工资统计仍不能有效覆盖的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减少到了 16000 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也减少到了 21%。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 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了 2 亿 7400 万人，其中 10600 万人为本地农民工，16800 万人为外出农民工。全国农民工中，17% 属于所谓“自营就业”，即从事个体劳动。扣除从事“自营就业”的农民工以后，全国从事雇佣劳动的农民工总数约为 22700 万人，与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相比，多出近 7000 万人。这 7000 万人，估计主要是受雇于城镇私营和个体单位。

如上所述，在 1990 年至 2014 年的整个时期，在农村从事农业和非农业个体劳动的劳动者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绝大部分。1990 年，这两部分劳动者之和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 83%。2014 年，这两部分劳动者之和，仍然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 57%。且关于这两部分劳动者工资和收入的官方统计较为完备，所以可以这两部分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为基础，估算全社会的劳动收入总和。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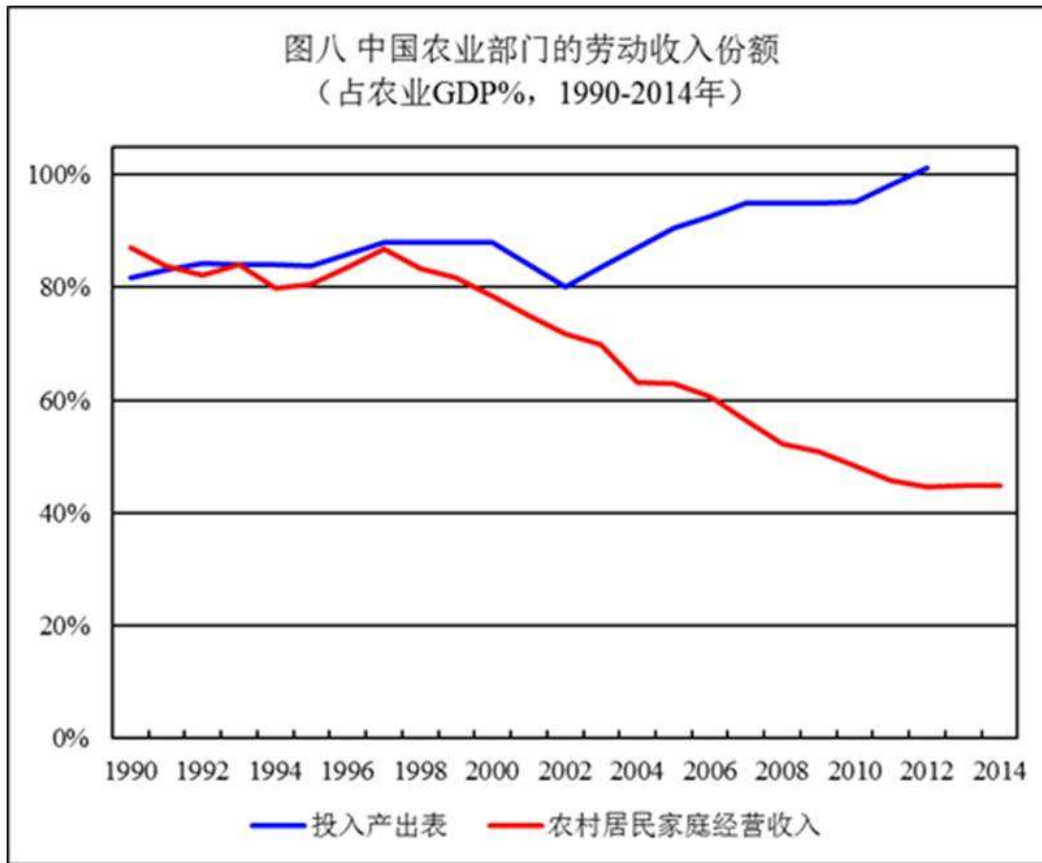
首先来看在农村从事农业和非农业个体劳动的劳动者。按照官方统计，这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属于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国家统计局发布自 1980 年至 2012 年历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2013 年和 2014 年，国家统计局改为发布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可支配收入。

在估算 1985 年至 2012 年的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时，我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再乘以乡村人口，即得到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总额；2013 年和 2014 年，则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可支配收入，再乘以乡村人口。

中国从 1982 年开始逐步解散人民公社，一直到 1984 年才完成。1985 年以前，农村劳动者参加集体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被国家统计局列入了工资性收入。为了与 1985 年以后的数据可比，在估算 1980 年至 1984 年的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时，我先用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和人均工资性收入之和乘以乡村人口，得到农村劳动收入总额；再用农村劳动收入总额减去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总额，所剩余的部分即为所估计的农村劳动者个体经营收入与参加集体农业生产所获得收入之和，以此作为 1980 年至 1984 年的“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总额。

图八比较了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按照官方的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农业劳动者报酬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图八】



在 1990 年至 1997 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农业劳动者报酬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致相当，都在 80-88% 之间波动。但是，自 1997 年以后，特别是自 2002 年以后，二者的运动方向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背离。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自 1997 年以后直线下降，直到 2012 年下降到 45%，才初步稳定下来。2002 年以后，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农业劳动者报酬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显著上升。2007 年以后，投入产出表索性在农业部门中不再计算营业盈余（即资本收入）。到了 2012 年，由于政府给农业的补贴超过了农业固定资本折旧，竟出现了农业劳动者报酬大于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不包括从事农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如国营农场职工的劳动报酬）。2012 年，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有 339 万人，平均工资约 22700 元，工资总额约 770 亿元。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包括从事非农业的个体劳动经营收入。2012 年，农村个体就业人员达到近 3000 万人，相当于当年农村农业劳动者和非农业个体劳动者总数的约 10%。当年农村家庭经营收入总额为 22700 亿元。假设非农业个体劳动者的平均收

入与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一样，则农村非农业个体劳动者的家庭经营收入总额约为 2300 亿元，抵消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以后还富余 1500 亿元。如此算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有可能高估而不是低估农业劳动者报酬。

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确立以来，农村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据国家统计局的农村居民调查，2012 年，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 3533 元，但是最富裕的 20%农户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 8500 元，最贫困的 20%农户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仅有 938 元。2012 年，中国乡村人口 64200 万人。如果所有农村人口都能获得最富裕 20%农户的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则农村家庭经营收入总额才可以达到 54600 亿元，才能大致相当于投入产出表所报告的农业劳动者报酬总额 53000 亿元。可见，投入产出表所报告的农业劳动者报酬很可能不符合绝大多数农业劳动者实际的劳动收入状况，而是包含了大量的农业资本家收入和其他剥削收入。

2012 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农业劳动者报酬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 101%，而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仅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 45%，两者相差 56%。2012 年，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 9.5%。所以，仅高估农业劳动者报酬一项，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者报酬，即高估了全部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 5 个百分点。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在最近的一些内部讨论中，有左翼进步学者对以官方工资数据为基础计算劳动收入总额提出质疑，认为官方的工资数据没有包含劳务派遣工等正式职工以外的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也没有包括在岗职工除工资以外的各种福利、劳务费等；因此，以官方工资数据为基础计算劳动收入总额，会大大低估劳动收入份额。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引用一下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的统计指标解释：

工资总额 指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1990 年 1 月 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号令)进行修订，在报告期内(季度或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是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和其他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之和。

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房费、水费、电费、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个人缴纳部分等。

工资总额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

如上，国家统计局现行的“工资总额”指标，除了包括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以外，还明确包括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和其他就业人员工资总额，是各种形式的劳动报酬总额，并且包括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的个人缴纳部分（但是不包括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的单位缴纳部分）。

另外，从杭州统计信息网可以下载到《劳动统计主要指标解释》，其中列举了13项不包括在“工资总额”中的企事业单位支出项目，然后明确说明，除了已经列举的13项以外，其他所有劳动报酬，均应计入工资总额。下面引用《劳动统计主要指标解释》所列举的13项内容以及列举以后的说明：

工资总额不包括以下项目：

- 1、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有关规定发放的创造发明奖、国家星火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支付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以及支付给运动员在重大体育比赛中的重奖；
- 2、有关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方面的费用。具体有：职工死亡丧葬费及抚恤费、医疗卫生费或公费医疗费用、职工生活困难补贴费、工会文教费、集体福利费、探亲路费等；
- 3、有关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待遇的各项支出；
- 4、支付给聘用或留用的离、退休人员的各项补贴；
- 5、劳动保护的各种支出。具体有：工作服、手套等劳动保护用品，解毒剂、清凉饮料，以及按照国务院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劳动部等七单位规定的范围，对接触有毒物质、矽尘作业、放射线作业和潜水、沉箱作业、高温作业等五类工种所享受的由劳动保护费开支的保健食品待遇；
- 6、稿费、讲课费及其他专门工作报酬(仅指非本单位组织，在业余时间进行讲课或写作所得报酬)；
- 7、出差伙食补助费、调动工作的旅费和安家费；
- 8、实行租赁经营单位的承租人的风险性补偿收入；
- 9、对购买本企业股票和债券的职工所支付的股息（包括股金分红）和利息；
- 10、劳动合同制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由企业支付的医疗补助费、生活补助费等；
- 11、因录用临时工而在工资以外向提供劳动力单位支付的手续费或管理费；
- 12、支付给参加企业劳动的在校学生的补贴；
- 13、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补贴。

(注：工资总额的统计，除以上 13 项内容的费用外，其余均计入工资总额的范围。因此在计算工资总额时，只考虑某项开支是不是职工的劳动报酬，不考虑其经费来源和支付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是职工的劳动报酬，其费用不论是由工资科目开支的，还是工资科目以外的经费开支的；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都应计入工资总额统计。)

13 项中，比较大的开支项目是有关离退休人员待遇的各项支出。

国家统计局根据现行的工资总额定义，公布了 1995 年至 2014 年的历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并且明确说明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总额。对于 1990 年至 1994 年，我采用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作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替代指标。

在本节靠后的部分，笔者将会介绍估算除工资总额以外劳动报酬的方法，主要是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和其他福利。

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纳入官方统计的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可以算是半正式部门的就业人员。2009 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假设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劳动所得等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就可以用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乘以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总数，得出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2009 年以前的年份，没有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的官方数据。鉴于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的劳动状况与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类似（2009 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相当于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88%），我假设，1980 年至 2008 年，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等于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

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是从事工业、建筑业或者服务业，但是在官方统计中既不属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也不属于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的就业人员。农村从事非农业的个体就业人员已经

与农业劳动者一并考虑。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中有一部分属于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员（2014年就业人数达到4500万人）。乡村私营企业是由过去的乡镇企业的一部分演变而来。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的工资统计数据。但是，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与农民工群体有很大的重合。可以确信，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几乎全部来自本地和外出农民工。国家统计局自2009年以来，每年发布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据此可以得到2008年至2014年的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假设农民工平均每年工作10个月，就可以得到上述各年农民工的年平均收入。假设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与农民工的年平均收入相等，再乘以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总数，就可以得到2008年以来的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乡镇企业职工。据1997年至1999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可以得到1996年至1998年乡村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乡村企业是乡办、村办企业的简称，即乡镇集体企业。1990年至1995年，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各卷得到各年的乡村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我假设，1990年至1998年，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等于乡村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

1998年，乡村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当于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97%。2008年，农民工年平均收入相当于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74%。在1998年至2008年之间，我假设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例随着年数的递进取直线变化，平均每年减少约2.3个百分点。然后再用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乘以上述假设的比例，即可以估算出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并进而估算出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1990年以前，乡镇企业职工占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的绝大多数。所以，对于1980年至1989年，我假设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等于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后者用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乘以乡村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得出。

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

以上各项工资和劳动收入，已经包括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和非农业个体劳动者、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以及不属于上述范围的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即包括了全社会的所有就业人员。

但是，上述各项工资和劳动收入，指的是劳动者直接获得的劳动报酬，没有包括企事业单位（即雇主）为劳动者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也没有包括企事业单位支付的其他一些福利（见上述《劳动统计主要指标解释》所列举的 13 项）。

国家统计局发布从 1989 年以来历年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但是没有发布住房公积金的数据。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住房供给金 2014 年年度报告》，2014 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额约 13000 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如果单位和个人各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一半，则单位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

各省市自治区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比例并不统一，但是多数地方单位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计约为缴费基数（职工上一年平均工资）的 30%、个人缴纳部分约为缴费基数的 10%。另外，单位和个人各自缴纳相当于缴费基数 10%左右的住房公积金（最低 5%，最高可到 20%，多数为 12%）。所以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能与单位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大致相当。

另一方面，并非全部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都来自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基本保险费。以 2014 年为例，据财政部公布的《关于 2014 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2014 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0439 亿元，但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保险费收入相加，为 28513 亿元，其余为财政补贴收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收入。

在没有更加可靠的数据以前，我暂假设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相加相当于各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 70%。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仍然为职工提供较为全面的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1980 年至 1998 年，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和，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主要为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支付的各项保险福利费。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和常年保持在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 30%以上，其中约 70%属于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用。

中国从 1991 年开始实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对 1991 年以来历年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与全国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用中的退休金（占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用的 50-80%）进行比对以后，发现二者基本相当。考虑到企业部门离退休人员所得到的离休金、退休金实际上主要来自于单位和个人在当期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为避免重复计算，在计算“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

基金和其他福利”时，不再将企业部门离退休人员所获得的离休金、退休金包括在“其他福利”中。此外，从九十年代到现在，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一直实行由财政支出中支付离休金、退休金。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休金、退休金，我将其作为通过财政再分配获得的收入，而不作为属于劳动收入性质的“其他福利”。

这样，在计算“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时，原则上仅包括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以及用人单位为在职职工提供的除工资、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以外的各项福利，而不包括用人单位直接给离退休人员支付的离休金、退休金和其他费用。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 =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 70% +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的其他福利

其中，1989 年以前，没有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关于其他福利的计算，1980 年至 1998 年，用如下公式计算：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的其他福利（1980 年至 1998 年）= 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额 - 离休退休退职人员保险福利费用 + （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 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10%

其中，对于城镇单位提供的其他福利，用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额与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用总额之间的差额来估算。这个差额在 1990 年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 16%，到了 1994-1998 年，大约稳定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 10-11%。另外，对于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也假设他们从用人单位获得的福利相当于工资的 10%。这是考虑到：九十年代，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主要是乡镇企业职工，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乡镇集体企业职工，享受一些工资以外的福利待遇。比如，《江苏省志·乡镇工业志》关于“职工福利”一节有这样的说明：1994 年以前，乡镇工业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不含奖金）的 11%提取职工福利基金；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职工工资总额（不含奖金）的 14%提取职工福利基金。此外，一些资本家为打工的农民工提供所谓“包吃包住”，相关吃住费用不在农民工所获得的货币工资以内，在其所获得工资基础上酌加 10%可能更符合农民工实际获得的劳动报酬。

1999 年至 2014 年，用下面的公式计算用人单位提供的其他福利：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的其他福利（1999年至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10%

也就是说，1999年至2014年间，用人单位提供的其他福利统一按照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10%估算。

根据财政部下属《中国财政》杂志社网站上“探析企业职工福利费财务制度的改革”一文所说明的情况，1994年至2006年之间，城镇企业实行1993年7月开始施行的《企业财务通则》，规定城镇企业按照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14%提取职工福利费，其使用范围包括：职工医药费（含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医护人员的工资、医务经费、职工因工负伤赴外地就医路费、抚恤费、探亲差旅费、职工生活困难补助、福利部门的人员经费、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医疗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费，以及按照国家规定开支的其他职工福利支出等。

从2007年1月1日起，城镇企业实行新的《企业财务通则》，不再按照工资总额的14%计提职工福利费。不过根据2008年1月以后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允许企业将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加以扣除。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2006年本市企业人工成本基本情况》，在企业人工成本构成中，劳动报酬占65.7%，福利费占6.6%，福利费大约等于劳动报酬的10%。据一个叫做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所做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用工状况研究》，2009年，职工薪酬占开发区内制造业人工成本的71.7%，福利费用占7%，后者占前者的9.8%。据济南市发布的2011年《济南市企业人工成本构成情况》，在企业人工成本构成中，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占68.6%，福利费用、职工教育经费、劳动保护费用合计占6.8%，后者大约等于前者的10%。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2013年开封市分行业企业人工成本水平和构成》，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占人工成本的68%，福利费用占6.5%，后者占前者的9.6%。据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2014年沈阳市企业人工成本状况》，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占人工成本的61.2%，福利费用占5.9%，后者相当于前者的9.6%。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2014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在全行业人工成本构成中，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占78.5%，福利费用占5%，后者相当于前者的6.4%；如将福利费用、职工教育经费和劳动保护费用合计，则占人工成本的6.9%，相当于劳动报酬的8.8%。

综合上述情况，假设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的福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0%，可能大体符合实际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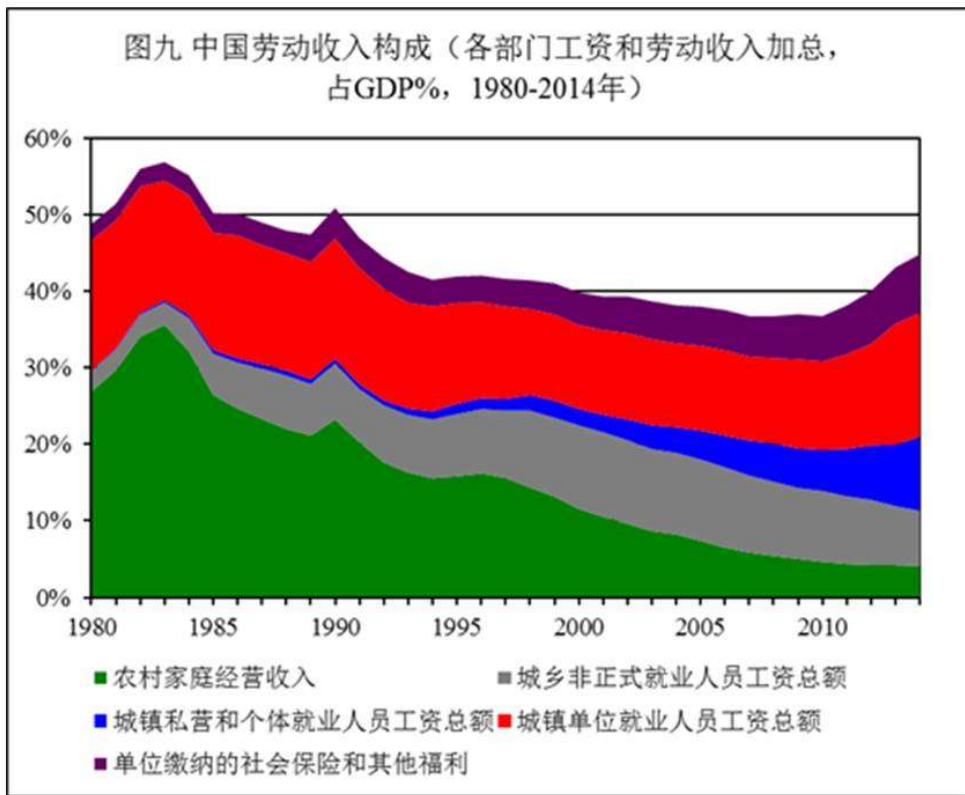
估算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

按照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劳动收入总额的计算公式为：

劳动收入总额 =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 +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 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 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 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

图九说明了 1980 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总额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他们各自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变化的情况。

【图九】



按照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计算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度大幅度上升（主要是由于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的大幅度上升），于1983年达到了57%。至1989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了47%。1990年，劳动收入份额有所回升。1990年至1994年，劳动收入份额再次大幅度下降，由51%下降到42%。1995-1997年，劳动收入份额稳定在42%左右；此后又趋于下降，至2007年下降到37%。2007-2010年，劳动收入份额稳定在37%左右。自2010年以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显著的、大幅度的回升，至2014年已经达到45%。

1990年至1994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3%下降到16%，下降了7个百分点，大约占这一时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80%。其次，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16%下降到14%，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1994年至2007年，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6%大幅度下降到仅有6%，下降了10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4%下降到11%，下降了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4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近5%；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4年的8%上升到2000-2002年的11%，此后又下降到2007年的10%；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4年的3%增加到了2007年的5%。

2007年以后，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继续下降，但是下降速度大大放缓，至2014年，下降到4%。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长期下降以后，出现了显著的回升，至2014年，超过了16%，已经略微超过1990年的水平。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继续快速上升，至2014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至2014年，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到7%。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与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7年的16%增加到2014年的24%，上升了8个百分点，足以解释这个时期所观察到的全部劳动收入份额上升。

关于2010年以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这里采用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与四种官方方法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都不相同的水平和趋势。用这里所采用的方法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可靠不可靠？是否可以作为左翼进步学者和积极分子借以分析阶级斗争形势的参考或依据？

首先，与几种官方方法不同，这里采用的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确保了劳动收入总和的各个组成部门在数据来源、统计口径方面在整个分析时期（1980-2014年）的一致或者基本一致。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对不同时间段上所观察到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和分析。比如，根据现有数据，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定，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本世纪初显著地、大幅度地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而从官方的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等数据中，则不能这样肯定地下结论，因为无法排除所观察到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是由于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变化造成的。

其次，这里所介绍的采用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计算劳动收入份额的方法，其每一个组成部分，数据来源都是清晰明确的，任何一个粗通经济学和国民收入统计知识的读者都可以应用可公开获得的数据自行验证，因而是可验证的、可重复的，可以自由讨论的，并且可以在讨论中改进的。

从图六中可以观察到，从1985年至2007年，按照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按照官方住户调查数据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水平和变化趋势方面几乎完全一致。这部分地是由于二者所采用的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的数据完全一致，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家庭经营收入还是中国全部劳动收入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

但是，按照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2007年以后先是趋于稳定，在2010年以后又出现了显著的、大幅度的上升，在2010年至2014年间上升了约8个百分点；而按照居民住户调查数据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2007年至2011年间继续下降，然后在2013年因为统计口径变化进一步下降，在2007年至2014年间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这里的问题是，在这两组数据之间，哪一组数据更符合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实际情况？2010年以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还是仅仅趋于稳定（或者继续趋于下降）？这关系到对当前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判断。

如上所述，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根据居民住户调查所得到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在2013年发生了统计口径变化。在2013年以前，国家统计局每年分别公布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及其在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之间的分配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在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之间的分配。自2014年起，国家统计局不再发布上述数据并自2013年起改为发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在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之间的分配以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在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之间的分配。由于这个变化，导致按照居民住户调查新口径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比按照原来口径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要低大约3个百分点（不过这项变化对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的计算影响不大）。

按照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按照居民住户调查数据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所包括的劳动收入项目也并不完全一致。前者包括了“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后者则不包括。2007年至2014年间，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3%上升到7.7%，增加了两个多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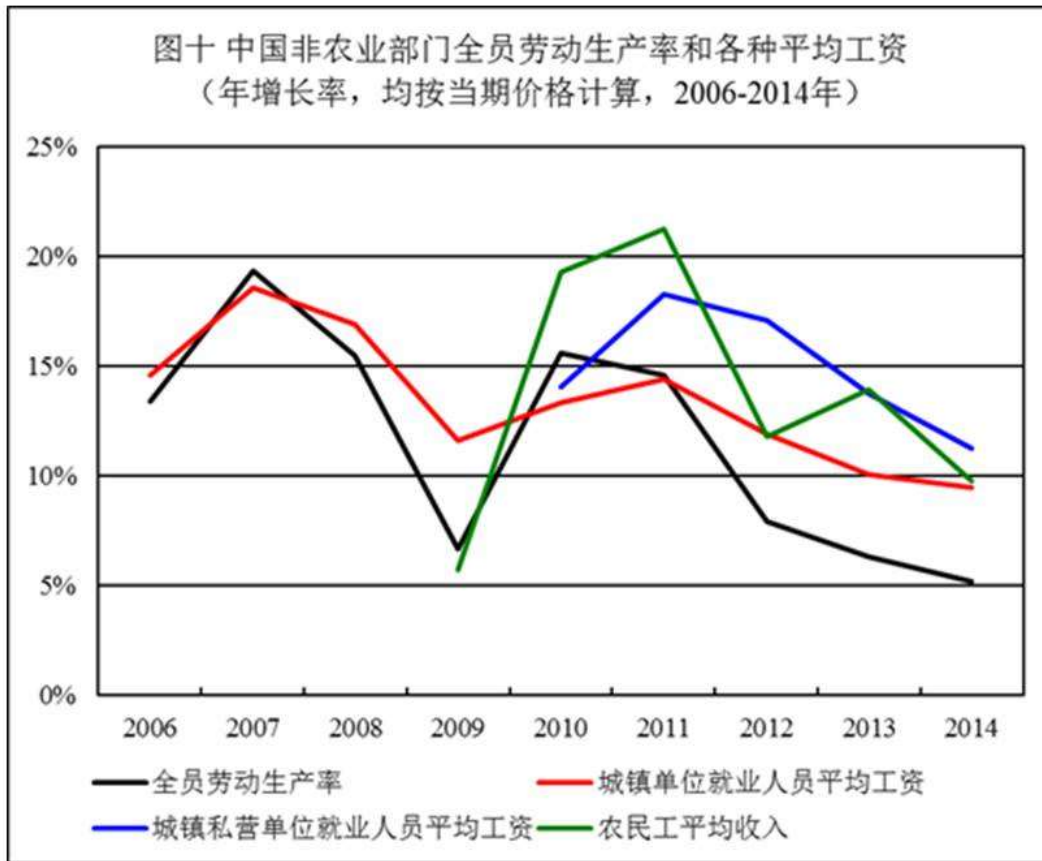
这两项差别（居民住户调查统计口径的变化和两种方法所包括劳动收入项目的差别）可以解释两组数据在 2007 年至 2014 年间不同趋势的大约一半的差别。

两组数据所采用的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完全一致，所以这部分的差别可以排除。剩下的主要差别是，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法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之和作为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总额；而按照居民住户调查所计算的劳动收入则分别采用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以及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作为基础，再分别乘以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再相加从而得到城乡居民非农业劳动收入总和。后者，由于样本选择不当、被调查者隐瞒真实收入或收入来源的倾向，在短期内发生较大误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并如图九所显示），2007 年以后，按照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完全可以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以及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两者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上升得到解释。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有自 1990 年以来始终一贯的数据，由国家统计局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获得（即由所有该项统计范围内的企业报告加总），并且因为工资数据又是单位就业人员缴纳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基金的依据，所以可以与税务部门相关数据相互印证，属于各项官方劳动收入数据中最可靠、最有权威性的。所以，在没有强有力的、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2007 年以后，主要由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上升而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应当认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出现了大幅度上升，但是这部分上升与城乡非农业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以及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下降大致相互抵消）。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还可以从现有的几种来自官方统计的平均工资在 2010 年以后增长速度普遍超过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来佐证。所谓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即非农业部门国内生产总值除以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员总数。图十显示了 2006 年以来中国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各种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变化的情况。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各种平均工资均取名义值，即按当期价格计算。

【图十】



如图所示, 在 2006-2008 年,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与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2009 年, 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幅度放缓,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10 年,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但是农民工平均收入比上一年增加了 19%。2011 年,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农民工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均显著超过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自 2012 年至 2014 年, 三种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均显著超过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按照平均增长率来说, 2007-2010 年, 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12.5%,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平均增长 13.9%, 后者略微超过前者。2010-2014 年, 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8.4%,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平均增长 11.4%,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平均增长 15.1%, 农民工平均收入年平均增长 14.1%。所以, 近年来, 几种不同类型的就业人员, 都出现了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情况。有的同志可能会说, 这是楼继伟之流的反动观点! 如果有同志这样想, 那么请不要激动。这是笔者在综合、全

面分析各方面有效数据以后得出的结论，不是随心所欲下的结论，也不是凭主观臆想或者靠着支离破碎的印象下的结论。同样的一组数据，有力地支持了 2007 年以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结论。我们不能因为主观上喜欢某些结论，就在某一个场合乐于采用一些数据，而当主观上厌恶某些从现有数据中不可避免要得出的推论时，又在另外一个场合抛弃同样一些数据。马克思主义者也好，资产阶级政府官员也好，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里，即便是带着不同的阶级立场“眼镜”，如果对某些问题的表面现象产生了大同小异的想法，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至于，对近年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这种现象，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这正是本文的正文部分尝试要讨论的问题。

估算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投入产出表比较

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个问题是，笔者所估算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是否大致符合历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实际水平，还是可能存在显著的低估或者高估？

从图六中可以看出，在 1990 年以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里，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水平上要显著低于按照官方的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据此，有左翼学者在内部讨论中提出，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实际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现在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这位学者的意见，对原来的劳动收入份额估算做了改进，改进的结果使得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1990 年以来的各年都有所提高，但是仍然显著低于上述三种官方方法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

三种官方方法中，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始终偏高。即使在 2000 年调整统计口径以后，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仍然保持在 50% 左右。近年来，固定资本折旧与政府间接税两者相加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7%。如果劳动收入总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0%，那么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就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23%。如果再扣除资本家所缴纳的所得税（近年来，企业所得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4%），资本家的税后总利润将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0%。考虑到近年来中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左右，如果资本家的税后总利润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0%，就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家要将他们的全部收入都用于资本积累，而不保留任何收入用于奢侈消费。这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实际行为显然是不相符的。如果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只有 23%，那么，根据中国现在的产出资本率，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将只有 13%。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经济在 2008 年经济危机时的水平，并且显著低于美国经济现在的利润率水平。这与目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快速资本积累的实际情况，也是不相符的。

按照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受到各省市自治区在不同的年份分别对统计口径做不同调整的影响，且按照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加总所获得的全国地区生产总值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两者之间有很大的误差。这里对按照资金流量表和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不再讨论。下面集中探讨笔者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别。分别从 2005-2012 年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两个时期来讨论。

如上所述，在 2005-2012 年间，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按照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别，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不同估计。按照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说，与笔者所采用的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相比，投入产出表所采用的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在 2005 年高出 28 个百分点，在 2007 年高出 39 个百分点，在 2010 年要高出 47 个百分点，在 2012 年高出 56 个百分点（见图八）。农业在 2005 年、2007 年、2010 年、2012 年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 11.7%、10.4%、9.6%和 9.5%。所以，由于投入产出表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高估，所导致的对以上各年劳动收入份额的高估分别为 3.3%、4.1%、4.5%和 5.3%。

2005 年、2007 年、2010 年、2012 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笔者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相比，分别约高出 4%、5%、11%和 9%。所以，在 2005 年和 2007 年，如果消除了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不同估计的影响，则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按照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到一个百分点以内。

在 2010 年和 2012 年，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不同估计大约可以解释两种劳动收入份额之间 40-60%的差距。从 2007 年到 2010 年，按照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突然从 41%增加到 47%，在三年内增加了 6 个百分点，到 2012 年又增加到 49%。这种突然变化，与可观察到的各种工资、劳动收入指标均不相符，只能用统计口径的重大变化来解释。有很大的可能，在 2010 年和 2012 年，投入产出表改为采用与资金流量表一致的统计口径（因而二者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几乎完全一致）。所以，在 2010 年和 2012 年，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按照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别就基本上可以从二者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不同估计以及投入产出表自身统计口径的变化中得到解释。

概括来说，在 2005-2012 年期间，如果投入产出表没有发生统计口径变化，如果投入产出表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没有高估，则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其他部分大体一致，不存在低估或者不存在显著的低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首先，在整个九十年代，笔者所采用的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与投入产出表所采用的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各自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体一致，没有显著差别。所以二者的差别不能用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差别来解释。

在1990年和1992年，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非常接近，上下相差仅一个百分点（见图六），说明在这两年，二者所采用的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应当基本一致。到了1995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比笔者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高了5个百分点。到了1997年，二者之间的差距扩大到了13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又扩大到了14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有两个可能性。一是1995-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中包括了某种笔者没有发现的特殊的劳动收入来源，并且这种劳动收入来源的重要性在1995年以后突然扩大，然后到了2005年又突然消失。如上节所述，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已经覆盖了全部就业人口，并且考虑到了各个部分就业人口的各种形式劳动收入，除了直接劳动报酬以外，也估算了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和其他福利。即使会有一些误差，很难想象误差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并且，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确实与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0年和1992年很接近；在扣除对农业劳动者报酬的不同估计以后，在2005年和2007年也很接近。因此，在上一节已经列举的各种形式劳动收入以外，再“发现”新的重大劳动收入来源乃至其规模可以大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这种可能性可以说等于零。

这就只剩下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在此期间，投入产出表的统计口径，又发生了某种令人难以理解的重大变化。在有更多的信息之前，我们只能猜测。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大规模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过程中的混乱时期，国家统计局能够有效统计的单位数量大大减少了，非正式经济部门迅速膨胀。于是，国家统计局在制作投入产出表时一度将所有已经确定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但是又没有有效统计数据说明其收入分配结构的经济产出统统视为劳动者报酬。比如，1997年至2000年，按照笔者估计，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9%-11%，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左右；两者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是11%-13%，如果再加上相当于工资总额10%的职工福利，就是12%-14%。如果“营业盈余”（资本家的利润、利息等收入）与劳动者报酬基本相当，那么非正式部门的营业盈余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14%。如果这部分营业盈余被投入产出表计入了劳动者报酬，就正好可以说明与笔者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距。

上述讨论说明，与笔者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相比较，按照官方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若干年份显著高出的部分（如在 1997-2000 年和在 2010-2012 年）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笔者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不存在严重低估真实劳动收入份额水平的问题。

估算中国的利润份额

利润份额即利润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这里所说的利润总额包括资本家从当期生产中所获得的一切形式的财产收入，如企业利润、利息、租金等。

根据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利润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其他收入组成部分的关系是：

国内生产总值 = 劳动收入总额 + 利润总额 + 政府间接税 + 固定资本折旧

所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劳动收入总额、政府间接税、固定资本折旧，即得到利润总额。

关于劳动收入总额的估算，前面已经做了详细介绍。

政府间接税（如关税、销售税、增值税、地产税等）是政府以商品、劳务或者有形财产为对象获得的税收，不是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收入征税，所以叫间接税，属于政府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我用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历年税收总额减去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所余下的部分即作为政府间接税总额。

固定资本折旧的估算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

1980 年至 1989 年，我用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减去 1994 年以前的《中国统计年鉴》上所发布的按照净物质产品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即原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定和形成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所计算的“固定资产积累”，以两者之差作为这一时期的固定资本折旧。

1990 年、1992 年，我采用投入产出表所发布的固定资产折旧并做如下调整：

固定资本折旧 = 投入产出表固定资产折旧 * （国家统计局现在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 / 投入产出表各部门增加值之和）

也就是将投入产出表所发布的固定资产折旧调整为与国家统计局现在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可比。

1991年，没有投入产出表。我假设1991年固定资本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1990年和1992年的平均值。

1993年至2014年，我采用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所发布的固定资产折旧并做如下调整：

固定资本折旧 = 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本折旧 * (国家统计局现在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 / 各地区收入法生产总值之和)

估算中国的资本产出率

资本产出率即固定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产出资本率的倒数。资本产出率一般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成正比。

估算固定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是永续盘存法。根据永续盘存法，期末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如下：

期末年实际固定资本存量 = 期初年实际固定资本存量 + 期初年和期末年之间历年实际固定资本净投资之和

其中，某一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净投资等于该年的实际固定资本投资减去当年的实际固定资本折旧。

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出期初年以后各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以后，再用实际固定资本存量乘以历年的固定投资价格指数，即可得到各年按照当期价格计算的名义固定资本存量。

下面说明我对中国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的估算和对中国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的估算。

首先要确定期初年。我以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以后的1952年为期初年。根据1994年以前的《中国统计年鉴》所发布的数据，1952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

之和为 167 亿元。另据《中国统计年鉴》所发布的 1952 年工业总产值数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 41%。据此，我假设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占全部企业部门固定资产净值的 40%。因此估算 1952 年中国企业部门固定资产净值为 418 亿元。

此外，1952 年，生产性固定资产积累 57 亿元，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积累 31 亿元。生产性固定资产积累占全部固定资产积累的 65%。据此，我假设 1952 年企业部门固定资产净值占全社会固定资产净值的 60%。因此估算 1952 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净值为 696 亿元。

1952 年至 1989 年，我采用 1994 年以前《中国统计年鉴》所发布的历年固定资产积累作为计算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时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净投资；我采用 1994 年以前《中国统计年鉴》所发布的历年生产性固定资产积累作为计算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时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净投资。

上述固定资本净投资再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即以前者除以后者）以后，即得到 1952 年至 1989 年各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净投资。对于 1952 年至 1989 年，我采用张军计算的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这一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见张军和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 K 的再估计”，《经济研究》2003 年第 7 期）。

1990 年至 2014 年，我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减去上一小节所估算的固定资本折旧总额，即得到全社会固定资本净投资；再用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就得到各年的全社会的实际固定资本净投资。据此就可以计算出 1952 年至 2014 年各年的全社会的实际和名义固定资本存量。

从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上，可以获得 1992 年至 2013 年各年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加）。其中，1992 年至 1999 年，因为资金流量表上的国内部门增加值与国家统计局现在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一致，要做如下处理：

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资金流量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国家统计局现在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 / 资金流量表国内部门增加值)

1990 年和 1991 年，我假设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是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的 73.4%（与 1992 年相同）。2014 年，我假设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是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的 62.8%（与 2013 年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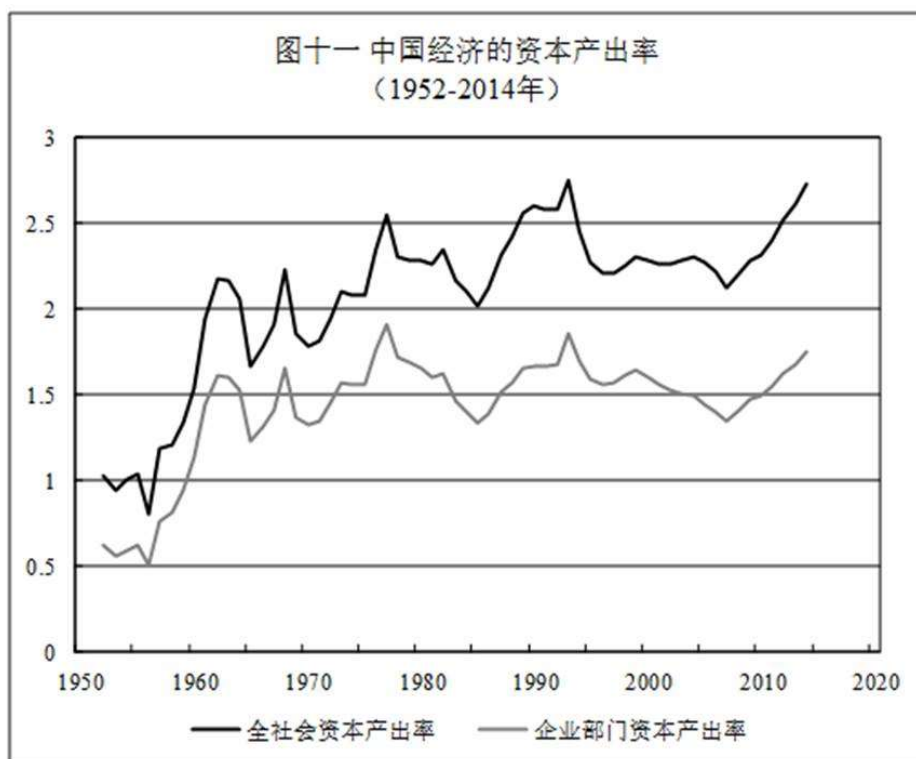
从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投入产出表，可以找到分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数据。1995年至2012年，我假设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折旧总额是全部固定资产折旧减去房地产业和其他服务业两个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1990年和1992年，我假设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折旧总额是全部固定资产折旧减去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据此可以计算出投入产出表有数据年份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折旧占全部固定资产折旧的比例。没有数据的年份，则假设该比例在两个有数据年份之间按照直线变化。2013年和2014年，假设该比例为64.9%（与2012年相同）。

用上述的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折旧占全部固定资产折旧的比例乘以前面估算的全社会固定资本折旧总额，就得到企业部门固定资本折旧总额。

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减去企业部门固定资本折旧总额，即得到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再用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就得到各年的企业部门实际固定资本净投资。据此就可以计算出1952年至2014年各年的企业部门实际和名义固定资本存量。

图十一说明了1952年至2014年中国历年的全社会资本产出率和企业部门资本产出率。其中，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国内生产总值均按当期价格（即名义值）计算。

【图十一】



关于华为问题致远航一号同志的信

2016-6-27

作者: 万里雪飘

远航一号同志:

这次为了是否支持华为而在红色中国网引起的争论暴露了红色中国管理层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管理层再也不能采取沉默的态度。如果对于华为问题无法取得统一认识, 那么管理员有必要说出个人看法, 在此前提下继续共同维持红色中国网站的运营。

支持华为的新愚公作为网站编辑不仅存在思想认识问题, 也存在阶级立场问题。今天新愚公支持华为, 如果明天华为爆发劳资纠纷, 他是否继续支持华为?

世上没有不拉偏架的编辑, 不拉偏架的编辑不是好编辑。新愚公拉偏架很好, 把他的本来面目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应该充分暴露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新愚公在《支持华为》中说: 我自认为也只是一个觉悟比较低的小资产阶级, 对于马列毛也只有感情倾向, 不懂什么理论, 不爱读社科类的文章, 所有的马列毛知识都源于学校课堂, 没有能力和理论家、革命家们在网络上讨论高深的问题。

联系上下文, 他似乎是在讥讽认真研读经典理论的网友, 并以自己不爱读社科类文章为荣, 这次他的表现在让人大开眼界。既然新愚公不读经典理论, 那么他的时评是怎么出来的? 他根据什么认为他的时评代表了毛主席的人民史观? 今天学校课堂上的马克思主义教材都是什么人编撰的? 被这些马克思主义秀才洗脑难道是光荣而不是羞耻?

新愚公支持华为想干什么? 他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旧中国农民有分地要求, 所以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 这是当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现实基础。毛主席逝世后, 特色党早已把土地分给农民,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现实基础早已不存在了。今天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历史使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在农村把分掉的土地重新整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并改造民营资本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如果撇开在底层挣扎的

中小企业，特色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营资本恐怕不存在，那些规模私企哪个不是官商勾结侵吞国家财产的孽种？将来对于这些孽种怎样改造不是在这里要说明的问题。

我不知道红色中国网站的经费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也不想知道是怎样解决的。但是国内的所谓左派网站打着毛旗敛财的事实是明摆着的，所以这些所谓左派网站对于自己的批判是有限度的，对于威胁到自己财路的批判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拉黑，这是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既然他们的网站需要依靠敛财维持，那么谁要是在理论上把他们彻底驳倒，谁就是要他们的命，拉黑异己者是他们的本能。

这次就说到这里，欢迎批评指正。如有必要，此信可以公开。

萬里雪飄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关于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一些情况——复万里雪飘

2016-6-27

作者：远航一号

万里雪飘同志、各位网友：

今天早上收到万里雪飘同志的信，询问关于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情况。

首先感谢万里雪飘和各位网友对红色中国网的关心。万里雪飘同志询问我们目前经费的情况，我可以借此机会向各位网友汇报一下。红色中国网迁出境外以后，一开始没有经验，日常开支比较大。2012年时，曾经进行过一次公开募捐。这里的有些老网友可能还有印象。当时凡是收到的募捐，我个人都已经回信确认。后来，我们找到了比较节约的办法。目前红色中国网的日常运营费用，完全由编辑部自筹，也就是由我们自掏腰包。

红色中国网的编辑部有一个演变过程。最早是由原中国工人网的一些同志牵头办起来的。迁出境外后，由我担任红色中国网主编，编辑部人员扩大，对于各种进步倾向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不仅表现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也表现在编辑部的组成上。

我可以向各位网友简单报告一下。我可以明确说，在我们编辑部中，目前有马列托倾向的同志，也有像新愚公这样“自认为也只是一个觉悟比较低的小资产阶级，对于马列毛也只有感情倾向，不懂什么理论，不爱读社科类的文章”（这当然是新愚公同志谦虚的说法），也有坚定的马列毛积极分子，还有向我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新愚公同志的话说，还是个一团浆糊的“文科生”）。

目前，编辑部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每周分别安排不同的同志担任值班编辑。一般情况下，值班编辑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放手工作。有重大、原则性问题时，还是由主编负责。

这次关于华为问题的讨论，很热烈。但是并不属于重大原则性问题。就我个人观点来说，我不隐瞒，我赞成 Red Flag、万里雪飘、赤旗等网友的观点，不赞成林林、子云等网友的观点。对于新愚公同志，我不赞成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观点，但是支持他的工作。

新愚公同志对编辑工作是认真负责的，虽然“拉偏架”，但是对于不赞成自己观点的 Red Flag、bapl 等网友的文章也都给予重点推荐。其实新愚公同志说自己“拉偏架”，自己给自己把帽子扣大了。编辑部成员表达个人观点是完全正常的，我自己过去也常常是这样做的。我们编辑部成员不

承担绝对“中立”的义务，编辑部成员的个人观点也不表明编辑部整个的立场。包括我们的红色中国时评，也是编辑部成员个人的观点。这是我们在长时期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比较好的工作方法。

革命队伍也好、进步网友也好、编辑部也好，要在一切问题上都达成完全一致，那是不可能的。重大问题要讲原则，一般问题要辨是非、讲道理。有些道理，能够马上讲清、达成一致，这当然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即使是简单的问题，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人们不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吗。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是马上非要解决的问题，一时半刻又解决不了，那就暂时不解决，或者逐步解决。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新愚公同志表达这样一些观点，明天我们的托派编辑可能又会表达另外一些观点。这都是符合毛主席所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范畴的。各位网友可以畅所欲言，我们编辑部内部对各种问题的观点，也不强求一致。对于这一点，还请各位网友理解。

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漫长的。近两年来，红色中国网客观上存在着网友数量减少、编辑部队伍涣散的情况。与国内一些进步网站相比，我们落后了。这都是工作中的正常现象，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一些自己周围的、表面的消极现象就看不到更加本质的、积极的发展因素。一方面，红色中国网和其他一些传统左派网站近年来缺少进步，另一方面，另外一些进步团体正在积极地、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上了一个台阶。对于其他进步团体的成绩，我们由衷地表示祝贺和高兴。对于我们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尽量减少主观方面的问题，对于客观的、暂时克服不了的困难，也不怨天尤人，而是坚持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为整个进步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发挥一点其他进步团体暂时还发挥不了的作用。

欢迎各位网友对我们的工作继续给予批评和指正。

怎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美国大选？

2016-9-4

作者：远航一号

这个周末，是美国的所谓劳动节。过了劳动节，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传统上最后冲刺的阶段了。美国大选，向来是资产阶级民主滑稽戏中的重头戏，对于美国和世界的政治走向都有重要的影响。目前，国内的主流媒体，无论是自由派的还是所谓“民族主义”的，对此也都有报道和评论，但是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并迎合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一些低级趣味，见识庸俗和狭隘，对于马列毛主义者没有什么帮助，对于群众则有迷惑的作用。

怎样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分析美国大选这种政治现象，这是个重要的题目，需要专门研究。笔者能力有限，目前还力不从心，这里姑且写几点感想，凑一个短篇随笔。

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要了解美国政治，首先就要了解美国资本主义，了解它的本质和现阶段的特点。我们知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在经过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革命高潮的打击以后，美帝国主义一度出现衰落。到了里根、格林斯潘时期，美国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重振霸权，并挽救世界资本主义。其中主要的，是在内部实行产业调整，放弃一些制造业，将资本积累的重心从物质生产转向金融投机；在外部，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威逼利诱，加快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步伐，一面搞垮苏联，一面将中国拉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共荣圈”，依托中国提供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打赢全球范围的阶级战争。

经过上述调整和重组，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得以在上世纪末回光返照，一度繁荣起来，政治上也因为“历史的终结”而洋洋自得，时人甚至于都在忙于讨论美国将成为“新罗马帝国”。然而，好景不长，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很快激化起来。到了本世纪初，布什政府的对外军事冒险全面失败，依靠债务消费堆积起来的虚假经济繁荣也随之破灭。

奥巴马执政八年，无所作为。对外，美帝国主义在全面战略撤退与进行新的军事冒险、挽救霸权衰落两种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但是，总的来说，其衰落的趋势在继续。对内，债务消费泡沫破裂以后，美国资本主义内部原来的社会妥协基础崩溃，阶级和种族矛盾达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最激化的程度。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美国资产阶级对选举政治失控的局面。

美国的两党政治，在很长时期中维持了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但是两党背后的资产阶级集团以及选举中的社会基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民主党是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从1932年至1980年，民主党执政32年，共和党执政16年。自罗斯福起，民主党就是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但是在选举政治中也依赖工会官僚以及“南方民主党人”（即南部各州白人奴隶主的后代）。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打击下，民主党被迫放弃“南方民主党人”；后者在1980年里根上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比尔·克林顿上台，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主党不再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蜕变为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政党，主要代表华尔街金融资本家以及硅谷高技术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在选举政治方面，民主党主要依靠所谓有较高教育水平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少数族裔新兴资产阶级所裹挟的非裔、西语裔群众；工会官僚的作用已经边缘化。另外，六十年代一度加入革命浪潮的一些原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也被民主党收编，成为其所谓“进步”的一翼。

另一方面，共和党所代表的资本家集团逐步收缩为军事工业综合体和传统制造业、采矿业资本家集团。被民主党和工会官僚所抛弃的白人工人阶级以及小业主逐步地向共和党靠拢，成为共和党的选举基础。这部分群体，在上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繁荣时期，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和阶级妥协的主要支柱；到了新自由主义时代，一步步被美国资产阶级抛弃，因而成了阶级矛盾激化的焦点。其情形，与中国的国企老工人，有一定可比性。白人工人阶级和小业主的不满，首先通过“茶党”运动表现出来；这次，则通过特朗普竞选集中爆发。

特朗普本人是个大资本家。但是，特朗普现象决不能从特朗普个人而只能从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来理解。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和小业主，幻想回到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特朗普的崛起，反映了这种幻想。他们期望，只要赶走非法移民，压制住少数族裔，自己就可以恢复到上世纪的“世界工人贵族”的地位。对外方面，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主张恢复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这是与美国金融和高技术资产阶级继续维持全球霸权的妄想相矛盾的。

正因为如此，还在共和党初选的时候，整个共和党的“体制派”就不遗余力，违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各种惯例，公开阻挠特朗普当选。在特朗普出乎几乎是整个资产阶级及其媒体的预料，居然在共和党预选突围以后，包括保守派媒体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媒体继续对特朗普展开围攻，希拉里·克林顿轻松当选，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最近一两个星期，形势起了变化。希拉里的电子邮件门因为联邦调查局公布其调查记录又开始发酵。希拉里与特朗普之间的民意调查数字也起了变化，选情开始吃紧。从马克思主义观点

看，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一部分制造业和采矿业资产阶级不甘心被华尔街和硅谷长期主导，不惜以一定程度上破坏美国的霸权利益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为代价，希望通过对外政策上的全面战略收缩以及经济政策方面的贸易保护主义来巩固本集团的利益。这部分资产阶级应当是特朗普的真实阶级基础。

与此同时，这部分资产阶级也已经行动起来，在加强对希拉里负面宣传的同时，对特朗普竞选团队进行了重组和控制，避免特朗普被白人工人阶级和小业主等“暴民”完全劫持。

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如果特朗普当选，在国内当然会实行一些反动政策，但是客观上会加速美帝国主义的衰落，因而对世界人民将是有利的。即使特朗普不能当选，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和小业主社会经济地位的衰落、美国资产阶级的分裂、美国种族矛盾的激化，都不能改变。现在，大片美国地区已经出现人民起义以及低烈度游击战频繁爆发的情况。在有些地区，资产阶级的正常法律秩序已经无法维持，已经开始出现外围化或“第三世界化”。

无论十一月份的大选谁胜谁负，美国资本主义日益激化的内外矛盾，都已经开始超出美国资产阶级控制的范围。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彻底烂掉的那一天，正在缓慢地但是确定地向我们走来。

关于“宪政”的思考

2016-10-6

作者：沙海之舟

编者注：错误观点

“宪政”又称“立宪主义”，英语中相对应的词是 Constitutionalism，发源于英美，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主要成就。我国从近代以来开始受“宪政”观念影响。早期主要受英国“立宪政体”的影响，把宪政理解为民权与君权的结合，所谓“君民共主”。后期倡导“民权主义”，强调政权和治权分离。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五权宪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宪政主张的集中体现。有人说，“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这是不对的。因为毛主席就曾经提出过“新民主主义宪政”这个主张。

毛主席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提出“宪政”的呢？这是毛主席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的一次讲演。毛主席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又指出：这种民主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毛主席为什么提民主的政治呢？就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提“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特色社会也是如此，口头上谈的是“依法治国”，实际却是以警察和武警治国，疯狂地镇压人民的反抗，实行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当时，毛主席提出“宪政”的目的，是提醒党内有一些同志不要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真会实行宪政。毛主席就是在这个演说里揭露蒋介石的欺骗宣传，以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醒，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无产阶级的策略。“新民主主义宪政”，事实上并没有实行，国民党反动派也绝不会实行。但是，在当年确实使民众觉悟，继而认识国民党反动派“一党独裁”的反动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由于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便不再使用“宪政”这个概念，而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则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

如今，为什么有一些人重提“宪政”的口号呢？这是自由主义者的政治主张。西方政治学学者萨托利说，“立宪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就是宪政”。国内有的学者也

说，“当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复兴是分不开的。知识界当前对宪政的诉求恰恰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复兴的一部分。宪政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概念。”

“资产阶级宪政”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是宪政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现代西方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

尽管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噪，但是对于这样的“宪政”，尤其是“宪政”的“内涵”，特色社会是绝不会接受也绝不会容许的。因为，所谓“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就是要取消特色党的“一党独裁”。“多党轮流执政”更不容许。所谓“军队国家化”实质是要特色社会抛弃“党指挥枪”。当然，这不是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指挥枪”，而是大资产阶级执政党的“党指挥枪”。当然，所谓“新闻自由”也不会容许，因为所有舆论工具都“姓党”，姓现在的特色党。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宪政”的主张，试图赋予宪政以“社会主义的原则与内容”。体制内的学者就把“社会主义宪政”解释为：以宪法为前提，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等为特征的国家关于实施、维护和发展完善宪法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岂不知，如今的《宪法》，尽管是修改后的《宪法》也只是形同虚设，工人阶级早已失去主人翁地位；“党的领导”就是“一党独裁”；人民只是被权力和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对象，“当家做主”纯属欺人之谈；“依法治国”，就是暴力维稳，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保障人权”更是一文不值的屁话。何况，所谓“保障人权”是一个超阶级的概念。有无产阶级的权力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权力，有资产阶级的权力自然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权力。所以，体制内的学者的所谓“社会主义宪政”，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客观上是在欺骗人民，维护修正主义统治的长治久安。

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实行“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人民哪里有“自由”可言，--“敢有歌吟动地哀”；把好端端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在反对修正主义法西斯统治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人民民主”即“民主政治”，可以作为无产阶级在现阶段的口号和策略，唤醒民众推翻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一党独裁”，但绝不是无产阶级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实行什么“社会主义宪政”。我们的目的只能是在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个历史阶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2016-10-6

作者：远航一号

近日，红色中国网友就“宪政”、“民主”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这无疑是有益的。借此机会，可以结合当前中国阶级斗争的实际，重新学习马列毛的一些经典著作。

感谢沙海之舟、万里雪飘两位网友的讨论。在讨论中，两位网友都提到了毛主席 1940 年的著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主席的著作除了包含了很多永不磨灭的光辉思想以外，往往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展开论述和探讨的。在学习毛主席这篇著作时，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包括当时中国尚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初期，表面上的国共合作仍然维持，大批党员干部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仍然抱有幻想并缺乏必要的警惕等。尽管有这些特定的历史背景，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所表达的许多思想仍然是严谨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比如，沙海之舟网友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脱离开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整个的思想，单独把这句话拿出来，是容易引起误解和歧义的。即使在这篇讲话中，毛主席也区别了资产阶级的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社会主义的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宪政。即使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毛主席已经明确指出了，不仅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谓“宪政”是对人民的欺骗，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想要搞“宪政”也是行不通的。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要搞宪政照样行不通的思想对于现在一些醉心于“二次革命”并企图与自由派搞“统一战线”的同志，是有特别借鉴意义的。

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中国各进步阶级的要求，而且指出了，它的实现是需要一定的具体条件的。具体来说，不是“会一开，电报一打”，宪政就促成了。所谓“宪政”，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一定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毛主席说：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在陕甘宁边区才有实行宪政的实际条件。为什么在陕甘宁边区有实行宪政的实际条件呢？因为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领导，因为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保卫着边区，因为实行了减租减息，因为对地主汉奸实行了革命专政。没有这些条件，即使颁布了“好宪法”也是没有用的。不经过艰苦斗争，无论怎样吹吹打打、开会、打电报、写文章，乃至召集了“国民大会”，都是没有用的，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可见，即使某些同志真的认为中国现在只能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不配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也应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实际的阶级斗争、用于与现实的工人阶级相结合，而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空洞的口号和呼吁上。后者，即使作为“策略”，也是不高明的，反而可能把群众的“脑筋闹昏了”、“弄糊涂”了。

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毛主席也说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有些同志言必称“宪政”，写文章总是离不开“宪政”，对于“宪政”到底是什么，其实似懂非懂、不懂装懂。比如，沙海之舟同志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宪政的“内涵”，列举了九个方面（其中包括所谓“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等），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宪政”本质的认识，也不符合一般资产阶级政治学关于“宪政”的基本观点，倒像是从低水平自由派宣传材料那里抄袭来的假冒伪劣产品。

在今天的条件下，广大的中国人民有没有争取政治自由、政治民主的愿望？当然有！但是，政治是讲求实际的，仅有空洞的愿望是不作数的。没有现实的有利于人民的阶级力量对比做保证，什么阶级的民主或“宪政”都是搞不起来的。这不仅是因为今日中国资产阶级的最高当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沙海之舟网友总是舍不得丢掉给中国资产阶级戴上“修正主义”这顶桂冠，其实际效果，就是为在沙海之舟看来可能不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留下一道后门）不能容忍对人民群众做出民主自由方面的让步，而且是因为，就今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说，资本主义已经相当程度上黑社会化，资产阶级已经相当程度上流氓化、黑帮化。通过周秀云案、雷洋案等，这些都有充分的体现。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除非以革命的暴力消灭至少一部分资产阶级的、黑帮化的反革命暴力，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遑论宪政）都是不可能有保障的。当然，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这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任何稍有政治常识或者一般的组织工作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关系做保证，即使某个人在名义上被任命为某一职务，实际上也是玩不转、干不成事的。关于“宪政”问题，其道理也是一样的。宪法写得再好，如果财政收入收不上来，警察不听你的指挥，黑社会每天乱杀人，无论什么政府，三天都维持不下去。

类似的问题，其实在现在的左派队伍中也同样存在。相当一部分同志，由于脱离工人阶级，又脱离现实阶级斗争，只是忙于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扯皮；其中个别同志，又有些名利思想，相互不

服气，不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左派山头林立，每个山头往往又多次分裂。不要说搞民主集中制，就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宪政”精神搞“费厄泼赖”（公平游戏、按规则办事）都搞不起来。

主张“宪政”的左派同志的现状如此，又如何能指望这些同志带领人民群众去争取真正的一地、一省乃至全国的民主宪政呢？

我看，主张“宪政”的同志不如从我做起，从自己周围做起，先在自己旁边的左派小圈子中实践一下“宪政”，以为其他同志的榜样，以免流于空谈，一事无成。

还是对远航一号网友说点什么

2016-10-8

作者：沙海之舟

编者注：错误观点

既然远航一号网友在文章中提到我的文章，还是说点什么吧。有道是“有来无往非礼也”。

说“沙海之舟网友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脱离开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整个的思想，单独把这句话拿出来，是容易引起误解和歧义的。”

在《关于宪政的思考》一文中，原文是这样的，即“毛主席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又指出：“这种民主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这是连贯下来的，怎么是“单独把这句话拿出来”呢？后面引用主席的话难道看不见吗？评论文章不要割裂，也不要曲解，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说“沙海之舟同志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宪政的‘内涵’，列举了九个方面（其中包括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等），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宪政’本质的认识，也不符合一般资产阶级政治学关于‘宪政’的基本观点，倒像是从低水平自由派宣传材料那里抄袭来的假冒伪劣产品。”

远航一号网友大概有所不知，这是笔者参考“求是网”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并引用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吃人政治：万万要不得的西方宪政》，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不是什么“自由派”的文章。这是体制内学者对“宪政”的看法，并不属于“自由派”一类的文章。当然，对于这篇文章的观点，我是反对的，因为维护的依然是修正主义的反动的法西斯统治。“求是网”是如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求是》杂志主办的理论宣传研究平台，大概不应该算是“低水平自由派宣传材料那里抄袭来的假冒伪劣产品”吧？我倒是希望远航一号网友详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宪政’本质的认识”以及“一般资产阶级政治学关于‘宪政’的基本观点”，还望不吝赐教。关于“宪政”问题，国内尤其是体制内的理论界、法学界的一些学者都在探讨，可谓众说纷纭。我的那篇文章也是在看了有关资料和文章之后形成的一点粗浅看法，难免存在谬误，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沙海之舟网友总是舍不得丢掉给中国资产阶级戴上“修正主义”这顶桂冠，其实际效果，就是为在沙海之舟看来可能不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留下一道后门。”

远航一号网友这样说又不“实事求是”了，我也不能接受。我曾经在多篇文章引用毛主席的话，即：“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我也是这样认识的，即：中国的修正主义上台之后，搞得依然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这难道不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吗？所谓“为在沙海之舟看来可能不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留下一道后门”一说，是从哪里谈起呢？这只能是你的主观臆断，而主观臆断往往得出有悖于事实的结论。我倒是难以理解，远航一号网友为什么对“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上台”如此“敏感”？张宏良先生倒是不承认中国存在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也不承认修正主义上台之后搞得是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近来看了你的几篇文章，感觉如今你对有的问题看得比较准，当然，是指“有的问题”。过去。我们曾经在一些问题上，有过思想上的“交锋”，这说明我们在“有的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这是很正常的。我这个人马列主义水平很低，有时不知天高地厚，多次与水平高的人“理论”。没办法，我是个愿意“求真”的人。“求真”能促进我学习。人嘛，从无知到有知就要不断地学习。尽管我已年近古稀，还是愿意与年轻一些的同志探讨一些问题，---活到老学到老嘛！

要痞子运动，还是要“宪政”，这是个问题

2016-10-8

作者：远航一号

感谢沙海之舟同志诚恳、坦率的讨论。虽然我与沙海之舟同志有观点上的分歧，但是大家都是马列毛主义者，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都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应该以“同志”相称。如果沙海之舟同志不便以“同志”称呼我，问题也不大。不过，至少在红色中国网，远航一号并非一般网友，而是担任着红色中国网主编的职务。

关于沙海之舟同志所列举的作为资产阶级“宪政”特征的九个方面，经沙海之舟同志说明，来自求是网而不是自由派媒体。我妄自揣测，而没有做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这是我的错误，向沙海之舟同志道歉。

既然沙海之舟同志问到，那么就继续谈谈“宪政”的问题。“宪政”的问题，如果从资产阶级政治学来说，主要指的是用宪法来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制度。它在近代的起源，是资产阶级对王权的约束（十三世纪英国的“大宪章”）。资产阶级“宪政”与资产阶级“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资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上就是“主权在民”，即认为政府合法权力的终极来源是“人民”；而“宪政”在原理上并不涉及政府权力来源的问题。

就历史实际发展来说，在二十世纪以前，不仅是工人阶级，甚至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都是排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民主”之外的。成年男性普选权是到十九世纪末才普及的，妇女选举权的普及要等到二十世纪。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南部各州，黑人实际上是没有选举权的。即使在今天，美国宪法中仍然有大量的反民主残余（见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著，《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323332/>）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资产阶级“宪政”的本质并不复杂，无非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即资产阶级为了剥削、压迫无产阶级而在政治上采取的一种统治形式。

对马列毛主义来说，今天的主要问题，不是去纠缠资产阶级“宪政”或者任何形式的“宪政”是不是一种“好”的政治制度，而是要了解宪政赖以存在的实际历史条件是什么，背后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又是什么。

从世界范围来看，真正长期稳定实行资产阶级宪政的无非是欧美少数国家，包括几亿人口。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靠着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得以在历史上的一定阶

段，对本国工人阶级做出一些让步，达成一定的阶级妥协，并且用资产阶级宪法将已经形成的阶级妥协确认下来。所以，不是因为有了资产阶级“宪政”，从而工人阶级得以有自由民主的权利（请注意权利、权力的用法）；而是因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某种均衡，工人阶级的力量足以为自己争取到某些权利，但是并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于是才有了现代条件下的资产阶级“宪政”。

而在世界上真正的广大的地区，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几十亿劳动群众生活在没有“宪政”或者“宪政”很不完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有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如非洲、中东、除印度以外的南亚、东南亚的一部分、东欧和中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十分虚弱，阶级矛盾尖锐，又杂以种族和宗教矛盾，军阀和各种武装集团林立，混战不休，连“政”都谈不上，更遑论“宪政”。

所以，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其实是无所谓“宪政”的。在这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既不是“最坏”，也不是例外。那么，就中国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欧美那样的稳定“宪政”、费厄泼赖呢？（就是在欧美国家，阶级妥协和“宪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目前，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资产阶级“宪政”已经出现了衰落瓦解的迹象）

那么，中国资本主义有什么特点呢？现代中国资产阶级是靠着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化掠夺和血汗工厂残酷剥削起家的。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有着强烈的腐朽性和野蛮性。即使在资本主义正常统治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单纯地依靠正规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公权力”），而是按照中国资本家喜欢实用的特点，普遍地大量地与黑恶实力勾结在一起，经常动用黑社会镇压工人罢工、群众斗争。指望这样的资产阶级，有一天会突然“成熟”起来、“文明”起来，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不仅是与虎谋皮，也实在是太不合中国“国情”了吧。

而在中国工人阶级方面，虽然在毛主席去世后，一度受到严重挫折，但是新一代无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虽然中国无产阶级现在主要还是进行经济斗争，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和狭隘性，即使是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经济和社会要求都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发生着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在血汗工厂仍然遍地的条件下，中国资本家就已经大叫大嚷劳工成本过高、社保负担过重。中国的资产阶级如此没出息，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对中国工人阶级做出有意义的让步并且还用“庄严”的宪法确认下来呢？

在中国现实的社会中，中国工人阶级即使是为了争取并确保一些基本的社会权利，争取并确保一些基本的人身安全和保障（如消灭黑社会），也绝不能指望资产阶级（连雷洋那样的上等小资都指望不上资产阶级，周秀云们还能指望司法公正吗），而只能靠自己的斗争。

而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只有突破了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的狭隘界限以后，才能开始解决自己的一些基本问题。至少就中国来说，要解决周秀云这样的案子，要解决千千万万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是被资产阶级媒体所掩盖起来的类似周秀云这样的冤屈，靠什么样的资产阶级法律，都是没用的，只能靠毛主席所说的“敢把皇帝拉下马”式的大民主，只能靠巴黎公式式的、苏维埃式的、革命委员会式的群众民主专政；而群众民主专政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不可能像“宪政”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而很可能是“严重破坏法治”的痞子运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这样的痞子运动有朝一日来了，沙海之舟同志准备站在哪一边呢？是要痞子运动，还是要“宪政”，这是个问题。

下面说说“修正主义”和“最坏的资本主义”。毛主席讲过的话，都包含着不朽的光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但是这不等于说，毛主席的话，每个字、每句话都要一成不变地照搬照用，而不顾及其具体的历史环境。

比如，苏联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就已经完全变修，可以说修正主义上台。但是，修正主义上台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中苏论战是在六十年代初，但是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就上台了，那么五十年代时，苏联是什么社会性质呢？

再比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修正主义统治进一步巩固。但是就苏联国内来说，经济基础基本上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地位仍然是有保障的，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相比，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在当时仍然是比较进步的，苏联工人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显然不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如果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最坏的资本主义”，那么到了叶利钦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时期，苏联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又该怎么讲呢？（叶利钦时期的俄国资本主义倒是“民主”的）

即使就中国来说，1976年以后与1992年以后也是有重大差别的。1976年以后，修正主义就上台了。你如果对老工人讲，1976年以后，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那么1992年以后全面私有化、大规模下岗，是不是就成了“最最坏的资本主义”呢？那么，本世纪以来，是不是又成了“最最最坏”呢？

再往前说，什么叫“修正主义上台”？这个问题也并不简单。实际上，即使在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修正主义者在台上的时候也是占多数。1966年以前，刘、邓不仅在台上，而且基本上大权在握，掌握着党、政方面的实权。如果不是这样，百花齐放、大跃进两个运动就不可能被破坏，毛主席也没有必要去搞文化大革命了。文革实际上只有三年。九大，毛主席是与林彪分权，林彪也并非革命派，并且要与苏修搞好关系。1974年，邓小平就重新上台了，党政军一把抓。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毛派自始至终没有掌过实权。

如果硬要按照“修正主义上台 = 法西斯上台 = 最坏的资本主义”的教条、金科玉律，一个字不许改动，那么岂不是在整个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已经是“法西斯上台”、“最坏的资本主义”，或者至少有三分之一、一半已经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这岂不是把资产阶级对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全部都坐实了吗？

沙海之舟同志，这样的严重后果，是你所期望得到的吗？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上层建筑

2016-10-8

作者：万里雪飘、远航一号

远航一号同志：

拜读了《要痞子运动，还是要“宪政”，这是个问题》，对于其中涉及到的关于社会性质的问题作为内部交流商榷一下。【再比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修正主义统治进一步巩固。但是就苏联国内来说，经济基础基本上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地位仍然是有保障的，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相比，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在当时仍然是比较进步的，苏联工人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显然不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照这段文字的逻辑，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反对苏修就没有理由了。问题出在哪里呢？还是出在哲学问题上，通常的唯物主义在定性前苏联的社会性质时陷入了困境。通常唯物主义认为，只要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工人阶级生活有保障，这样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以历史人本主义看前苏联的社会性质，尽管它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工人阶级生活有保障，但是群众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在群众之上形成了强大的官僚特权阶级。这个官僚特权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官僚特权阶级控制的公有制经济。

事实上，没有抽象的公有制，公有制本身就是人与人关系。所以，公有制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存在于阶级矛盾之中，公有制的社会性质决定于阶级专政，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公有制已经失去社会主义性质。因此，社会主义很容易复辟资本主义，只要群众丧失管理国家的权力，复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七六年反革命武装政变那样。这就是毛主席不顾七十三岁高龄，不惜粉身碎骨，发动文革的历史逻辑。

在马克思的历史人本主义那里，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历史范畴归根结底就是人与人关系，____人与人关系同时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____，是人与人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历史前提，但是没有抽象的生产力，物质生产活动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离开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不可想象。同样辩证逻辑，经济基础是人类的历史前提，但是没有抽象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将自身存在的性质表现为上层建筑，离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不可想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经济结构在和上层建筑相对时，我们将它们概括为经济基础。所以，要判断社会性质，我们只要看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可

以了，看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思想等形式就可以了。毛主席强调政治挂帅，与苏联展开论战，其历史逻辑就在于此。

不当之处请指正。 萬里雪飄

二零一六年十月七日

万里雪飘同志，

这段文字是可以发表的。同志之间有不同角度很正常。我这里讲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简单化的说法。我以往的文章实际上已经说明过，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并不是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否则就不能说清有阶级、阶级斗争这些问题。走资派就是官僚特权阶级。尽管如此，这种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仍然是进步的，无论如何将修正主义产生后的“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复辟尚未发生），在脱离主席原话具体背景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积累了过去几十年中外阶级斗争经验的情况下，硬说成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荒谬的。

实事求是说，就是当年在毛主席领导下，1956-1976年的整个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不占优势实际上都是问题。文革前，毛主席实际被架空。文革初，乱了敌人，也乱了自己，武汉兵变，连主席本人的安全都无保证。九一三之后，老干部全面回潮，邓1974年上来的时候很猖狂。综合这些情况，单就上层建筑来说，革命派充其量也就是与走资派分天下，八大政治局多数都是走资派，十大也没站住，兵权、组织、财权，一个都没搞到。

先提出这些问题。可以继续探讨。

远航一号

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马列毛左派怎样做宣传工作？

2016-10-3

作者：远航一号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伟大中国革命胜利 67 周年的日子。借此机会，与同志们一起探讨一下，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红色中国网作为一个马列毛左派的工作网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宣传方针。

自本世纪初以来，马列毛左派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做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中国政治和思想舞台上一支显著的力量；马列毛左派的构成也实现了由老干部、老工人为主到老中青三代兼顾的历史性变化。

另一方面，马列毛左派目前仍处于较为分散、较为混乱的状态，形式上、认识上不统一，无论是传统左派团体还是新兴进步学生团体，客观上都存在着多个“山头”。这种情况，在现阶段是有客观基础的，不应急于改变。各马列毛团体在工作中要互相促进、互相帮助、友好竞赛，展开比学赶帮超，而不要相互拆台、恶性竞争，乃至于上纲上限，公开论战，不适当地将革命队伍内部矛盾（或至少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

在这样的环境中，红色中国网如何发挥有限的但是独特的作用？我个人的意见以及最近一个时期作为主编的实践，主要是发挥我们在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方面的一定优势，并结合作为境外网站的便利条件，在为广大左派群众提供较为真实、有效并且关键的阶级斗争信息以及根据这些信息得出正确的理论认识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

最主要的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帮助广大的左派积极分子和工人斗争积极分子学习正确分析、认识当前中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树立中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信心、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必然胜利的信心。

实事求是地讲，由于目前的阶级斗争还处于僵持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尚未全面爆发，相当一部分左派同志对于上述两点是信心不足的；整天摇头叹气、悲观失望的人，也不在少数。正因为如此，在我们有限力量的范围内，努力做好上述工作就尤为必要。

由于我们的工作力量在客观上有限，也由于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还没有充分发挥，红色中国网目前原创文章很少或几乎没有。尽管如此，通过坚持这个阵地，通过有效地将各进步网站、资产阶级媒体以及小资产阶级左右派媒体所发布的各种消息、评论组织起来，通过这些消息、评论

所反映的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方方面面，仍然可以把资本主义矛盾以及阶级斗争进程中较为重要、较为本质的方面比较及时、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并帮助有心的读者通过这些方方面面的信息把握住当前矛盾和斗争的本质，逐步看清资本主义黑暗的前途和无产阶级光明的前途。

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推荐的文章就必须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内容、有联系的，而不能仅凭一时的感觉，将各种各样话题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更要自觉地与目前左派队伍中相当程度上存在的无所作为、悲观失望的情绪做斗争，与夸大资产阶级力量、否认无产阶级胜利前途的种种错误思想做斗争，包括与那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号而实际上畏惧资产阶级、不承认无产阶级可以胜利的错误思想做斗争。

下面说一些具体问题。

关于自由民主问题

关于所谓“自由民主”问题，具体来说，关于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所谓“一次革命”还是“二次革命”），关于马列毛左派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政治关系（合作关系还是斗争关系），关于马列毛左派在未来斗争中要不要把“自由民主”作为一个主要政治斗争目标以及口号等，在各传统左派团体中有很大争论，也可以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对于各青年左派团体实际上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所谓“自由民主”的问题，目前在左派队伍中所造成的主要危害，不在于所谓“自由民主”是一种资本主义改良并可能造成工人阶级幻想等。主要的问题是，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环境、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及其特殊矛盾，在中国的条件下，未来将不可能出现一个长时期的、稳定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局面。

中国工人阶级未来的斗争势必要超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狭隘界限并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斗争形式以及胜利的前途。不去认识这种前途，而是幻想未来将有一个长时期的、稳定的“自由民主”时期，乃至左派可以在这种“自由民主”环境中和平地、合法地、无忧无虑地进行“阶级斗争”，将把我们自己在精神上禁锢起来，使我们自己以及工人斗争积极分子对于未来激烈和伟大的斗争处于无思考、无准备的状态，从而延长工人阶级成熟和发展的阶段，推迟工人阶级的胜利，增加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痛苦，乃至使得未来的阶级斗争变得更加残酷。

关于工人斗争

工人斗争是红色中国网积极宣传的一个主要方面，尽管其目前所得到的读者的关注度并不是最高的。

在现阶段，中国工人的斗争主要是经济斗争。在现阶段，无论是工人的政治斗争还是经济斗争，无论是老工人的斗争还是新工人的斗争，无论是纯粹的经济斗争还是在某些政治派别影响下的经济斗争（如自由派、毛派、托派），原则上，只要可以增加资产阶级的困难，加深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对于未来，都是有利的，因而也都属于我们宣传的范围。

但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还是存在着先进与落后、主流与支流的差别；客观上，存在着马列毛左派与自由派以及其他派别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在与此相关的问题上，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内部以及与其他左派团体之间曾经多次发生争论。

工人阶级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许多具体的个人、许多大大小小的群体组成的。所以，我们在做与工人阶级有关的宣传工作时，要运用马列毛主义，做细致的分析，分清其中的主流和支流，分清其中的先进和落后，分清其中哪些是代表本质代表未来的、哪些是受剥削阶级影响并且终将在斗争中被淘汰的。

举例来说，大致在 2010 年以前，以老工人为主的反私有化斗争是代表了当时工人阶级斗争先进方向的。这以后，随着国企私有化基本完成，情况就起了变化，各地新工人的斗争成为工人斗争的主体。尽管如此，很多地方的老工人仍然在坚持斗争，他们所代表的先进革命传统在未来仍然会发挥大作用。

新工人斗争中，传统上是比较纯粹的经济斗争，并且过去属于小资产阶级右派的自由派对新工人斗争建立了某种舆论上的垄断（虽然其实际影响有限）。但是，近年来，情况也起了变化，有些具体斗争是马列毛左派或者与马列毛左派接近的团体领导的。最近，沃尔玛工人反对所谓“综合工时制”的斗争是在有托派同志参与的情况下由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工人积极分子进行了比较自觉的、抵制自由派工贼干扰破化的斗争。随着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今后这种案例，还会越来越多，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斗争的基本要求势必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职业工贼）限制、破坏工人运动的图谋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工人积极分子的认识也必然要在这样的反复的冲突中不断得到提高。

因此，对于马列毛左派所领导的工人斗争，对于工人斗争中自发产生的抵制自由派工贼破化的进步趋势，我们都应该大力加以宣传，因为这是先进的、代表未来的、有前途的。

反之，对于像胡常根这样的尚未完全无产阶级化的落后分子，我们要揭露他的本来面目，并与之展开必要的斗争，不能抱着小资产阶级的廉价的同情心，做农夫可怜毒蛇的傻事。

对于自由派在工运中的影响，要区别几种不同的情况，分别予以处理。

在有的情况下，确有在政治上属于自由派的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出于小资产阶级同情心，能够比较真诚地帮助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中的某些个人，并且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比如，周秀云案中，目前正在帮助周秀云同志家属进行司法斗争的几位律师应当属于这种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毫无保留地宣传并支持他们帮助劳动者个人的具体斗争。这样做，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斗争的大局。

在有的情况下，属于自由派的某些积极分子，政治上一贯反动（具体来说，即反毛反社会主义），并且明确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要篡夺一部分工人运动领导权；并且由于其阶级局限，已经给具体的工人运动造成了危害，并且已经引起了一些本来并非政治上敏感的工人积极分子的警觉。比如，自由派工贼王江松及其追随者，就属于这种情况。对于这样的自由派工贼，我们要对其展开坚决的揭露和斗争。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红色中国网不便对其展开直接斗争时，则应对在一线展开直接斗争的同志或工人积极分子给予大力宣传和支援。

还有一种情况，如广州曾飞洋案，曾本人的政治立场其实是比较清晰的，与曾发生联系的海外组织其政治背景也是比较清晰的，基本上是服务于西方帝国主义（以西方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培养“团结工会”式的所谓“独立”劳工组织的目的。其长远危害是巨大的，左派对之应当保持相当的警惕。

另一方面，曾本人的政治面貌尚未给当地的工人斗争带来直接的危害，当地工人斗争积极分子也尚未直接感觉到曾的活动所产生的局限性（区别于王江松对沃尔玛工人斗争的破坏）；并且相当一部分马列毛积极分子由于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幻想和糊涂对于曾的危害认识不足，乃至当时一部分同志对于曾入狱还产生了“唇亡齿寒”的错误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红色中国网内部也是有分歧的。作为主编，我基本坚持了冷静观察、不过度卷入的方针，抵制了一部分同志要求我们“声援”的主张；同时对于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也给予了一定的讨论的空间。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自由派思想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应当指出，在目前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积极或不积极的工人在实际斗争中受到自由派影响是不足为奇的。一般情况下，只要这种自由派思想的影响（比如某些工人表达一些对美国民主的向往）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没有影响到实际斗争，都不妨碍我们对相应的工人斗争的宣传。

但是，要警惕，某些打着维权积极分子旗号而实际上已经变质的坏分子（如胡常根），政治上不是一般地受自由派影响，而是积极地反毛反社会主义，乃至恶性挑拨工人阶级不同部分之间的矛盾，那就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而要将其作为反动分子来对待，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某些左派团体（无论表面上是毛派还是托派），打着宣传马列和工人斗争的旗号，实质上贩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私货，甚至于肉麻地吹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对于这种错误倾向，我们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抵制和斗争。如果是在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内部产生类似错误倾向的，我作为主编，也要与之展开坚决斗争。

关于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中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到目前为止，中国资本主义尚未爆发真正的经济危机。

在经济危机问题上，我们要运用马列毛主义的真理，坚定地相信，危机的来临与革命的来临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经济危机的认识，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努力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一般矛盾和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我们的分析方法，要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也要区别于为资产阶级金融投机服务（并且用来欺骗煽动小资产阶级的）种种所谓“财经分析”。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既看到危机必然来临的趋势，也不要毫无根据地用“危机马上就来”一类的虚张声势来吓唬别人、“鼓舞”自己。无数历史经验证明，不讲科学，不信马克思主义，而搞耸人听闻、新闻炒作那一套，是长久不了的。

关于国际形势

目前总的国际形势，是美帝国主义衰落，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加深，帝国主义的中东战线完全崩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原有的阶级结构有逐步崩溃的危险。

对于这样的国际形势，我们要积极宣传、客观介绍，以增进左派群众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了解，增强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信心。

在这个大前提下，要反对一些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是夸大中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把中美资产阶级的关系歪曲为是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宣传美国要“围堵”中国等。其中一些人，进而主张为了“中国崛起”的目的，国内的各被压迫阶级都要放弃自己的斗争，维护“稳定”的大局，等待中国的“富强”。这无疑是反动的，我们应当与之斗争。

还有一种错误倾向，是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将要或者已经上升为“帝国主义”，并且号召左派把很大一部分乃至主要的力量用于反对“民族主义”或“中华帝国主

义”。这种倾向，表面上显得很革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上升，不相信无产阶级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资产阶级，而把资产阶级想象得很强大，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只要搞对外扩张就可以“缓解”它的一切矛盾，然后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中美或中日战争上。对于这种危害越来越大的“中帝论”，我们也要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

最后，关于宣传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和进步斗争的问题。作为一个进步网站，红色中国网毫无疑问应该积极宣传世界各国人民的进步斗争。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根据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实际发展状况，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在近期内不大可能发生突破性的变化。我们在做国际斗争宣传时，要注意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国际斗争的作用，不仅要宣传外国好的经验，也要注意吸取外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斗争中所经历的教训。

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有着光荣伟大的革命传统，我们要敢于承认这些传统，并且将其发扬光大。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我们要相信自己国家的劳动人民，有能力、有决心、有智慧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光明大道。

红色中国网将在这一伟大的斗争中发挥自己微薄却实实在在的作用。

读远航一号《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马列毛左派怎样做宣传工作》一文的思考

2016-10-13

原作者：“风之神”

编者注：错误观点

一，关于自由民主的问题

自由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是坏东西，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由民主这个口号首先被资产阶级利用，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专制锐利的思想武器，因此一提起自由民主这个口号就被习惯的认为是资产阶级专有的政治口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但考虑到人们习惯性的认识，无产阶级在使用这个口号时应持审慎的态度。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定要爆发的，并不会因为特色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而有所改变，但在危机爆发的形势上会有其特点。经济危机的爆发必然会激起无产阶级的强烈反抗，而无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必然导致特色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这同样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矛盾愈是尖锐、特色资产阶级愈是暴露出其残酷性与专制性，无产阶级会从中感受到切肤之痛，基于此，无产阶级应该大胆的去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以便更好的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服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争取民主、自由斗争中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前者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而后者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积极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并适时将斗争引向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就此停步不前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自由派，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二，关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问题

资产阶级自由派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面对官僚、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有一定的民主要求，因此无产阶级不能一概排斥，但资产阶级自由派目的是建立西方宪政民主政体而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官僚、大资产阶级之争是政体之争而非国体之争，在本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所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在策略上既要合作也要斗争，既要利用其

积极的一面又要防备其反动的一面，在革命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同时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争取部分自由派的转变是有可能的，对自由派内部也要区别对待，切莫一棍子打死。

三，关于特色是否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

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美国那样实力超群的国家才称得上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也分三六九等、有强有弱，判断帝国主义国家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形成特别是金融寡头垄断及资本的大量输出，根据这个划分标准，中特色早已羽化为帝国主义国家，关于中特色的官僚、大资产阶级垄断及资本输出的数据星火网相关文章早有阐述，在此就不在罗列。中美矛盾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最主要的矛盾，中美争夺将是国际政治的一条主线，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战争，这是被世界历史一再证明的规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延续，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危机的逐渐展开激化了阶级矛盾，他必须要开发外部市场为资本增值找到出路，缓解阶级矛盾，这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相互转嫁危机的道路上迎头相撞了，所以帝国主义时代严重的经济危机总是伴随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经济危机是革命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同样也是革命最有力的杠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红色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诞生了一大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同样不可避免，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又总是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

四，关于特色中国经济危机爆发的特点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势看，中特色与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中特色区别于民主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在于特色党一党专制的政体及其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由于中特色也是以私有制为主体，雇佣劳动制为主要劳动形式，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所以中特色与其他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不同的是由于中特色是一党专制并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在应对经济危机时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多的手段，能够大大延缓危机的发生，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所谓的管控危机的手段不过是延缓危机的手段、转嫁危机的手段，并不是解决危机的手段，危机越往后拖延，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愈发尖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暴露、积聚、直到阶级矛盾的全面爆发，也就是说种特色管控危机的手段不过是准备更全面、更彻底、更具有破坏力危机的手段而已，为自身准备更多的掘墓人而已！

原文后跟贴： 宋小小

中美争夺是主线吗?这也太抬高邓修了.毛主席时代都不能单独抗衡美帝,要拉拢美帝对抗苏修,难道特修比毛时代还强大吗?如若是,那就复辟有功了!至于什么资本输出的问题,在资本世界中,总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虾米,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特修挖空心思吹嘘如何比毛时代强大、富有,以证明毛主席搞的那一套是错误的.....等等、等等.可我们的同志为什么也帮着吹捧呢?难道特修不是帝國主义國家,我们就没有理由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吗?

平抑房价、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2016-10-26

作者：李民骐，这是作者应国内某媒体邀请撰写的对当前热门经济问题的评论文章。

编者注：改良主义

近年来的房价暴涨，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为迫切关心的问题。由于房地产畸形发展而引起了多个部门严重生产过剩、居民和企业部门债务临近危险水平，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乃至担心中国经济将步日本、美国的后尘，房地产泡沫破裂，进而导致全面经济危机，使得中国经济由此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潭不得自拔。

比如，近来网上流传署名“望长城内外”的文章（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何会出现“两高并存”的问题？）。文章指出，中国房地产业目前存在着高房价、高库存“两高并存”的严重失衡局面，房地产价格暴涨已经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并大大增加了实体经济部门的生产成本，房地产泡沫已发展为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作者指出，必须深刻反思房地产无序发展引起的教训，进而反思当前整个的经济发展路线，要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的，将改革目标调整为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草根网专栏作家“云台剑侠”提出：“换个思路解决住房问题”。云台剑侠认为，现行的房地产政策是死路一条，中国的住房问题绝不可能靠住房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来解决，只有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由国家投资建房，实行公有民租的方式，才能满足百姓的住房需要，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居住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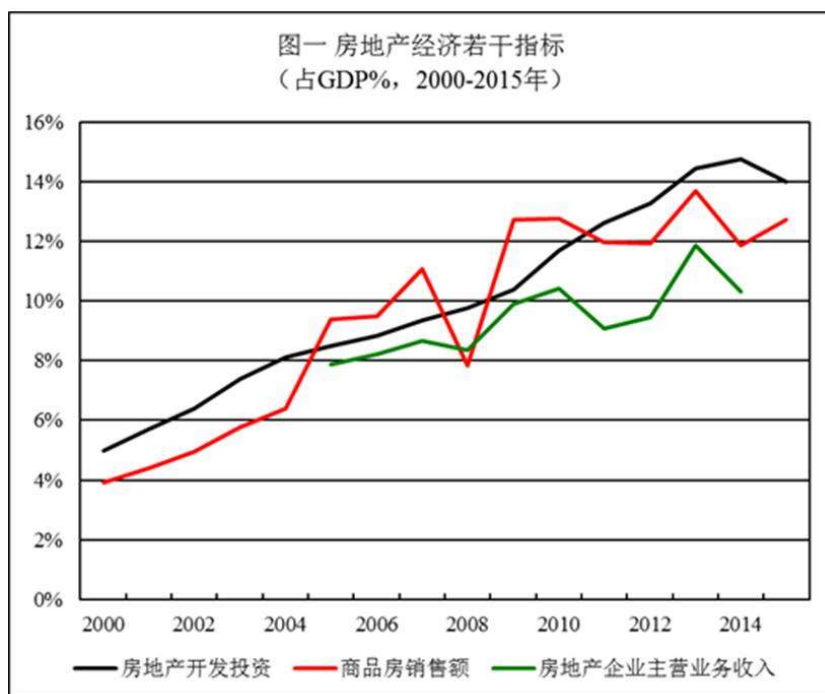
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癫狂的房地产已经变成了一场集体心理实验），作者自称“在一线城市苦苦奋斗，但已经被疯狂上涨的房价蹂躏得绝望的人”，这是当前城市生活中大批欲为中产而不得的高学历青年被高房价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态在精神和物质生活上都逼迫到崩溃边缘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认识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评估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危害，站在进步立场上的各界人士在房地产以及相关经济问题上应当提出怎样的政策主张？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与进步学界各位人士以及各位读者共同探讨。

房地产与中国经济

要谈论房地产问题，首先要对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重要性有个较为客观准确的估计。目前网络上对此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房地产业的影响已经达到中国经济规模的 20%，有的认为房地产及其上下游活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之和已经达到中国经济规模的 50%。这里，采用几种较为直接、公开、权威的数据来评估目前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力争做到不夸大、不缩小。

图一比较了几种较有代表性的房地产业活动指标占中国经济规模的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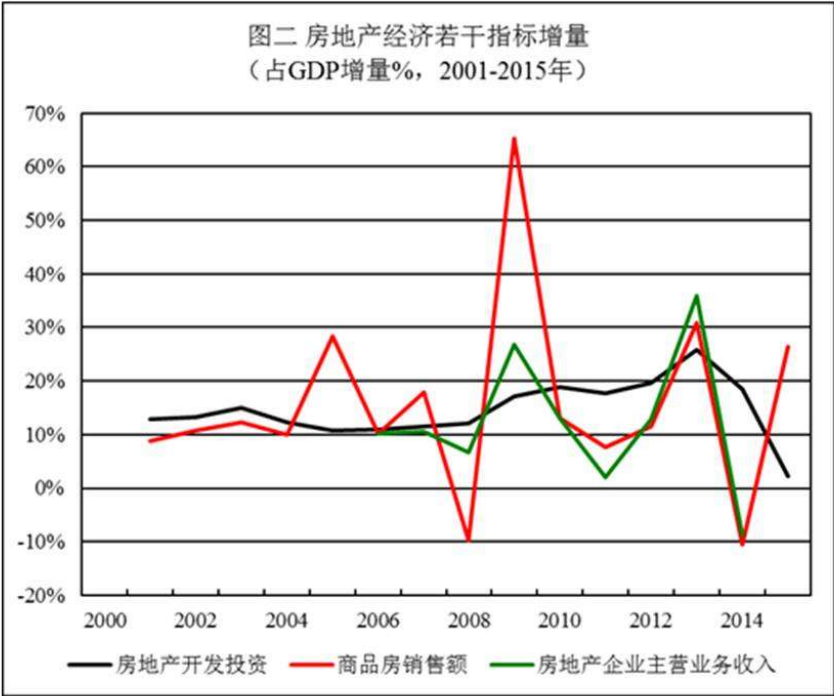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是房地产企业以赢利为目的进行的投资支出（不含城镇单位和农户自建房屋而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反映了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最终需求。商品房销售额是房地产企业销售住房、办公楼、商业用房而获得的销售总收入。房地产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指的是房地产企业通过出售商品房、出租房屋、转让土地等活动而获得的营业收入。该项通常小于商品房销售额，因为主营业务收入按实际发生的收入计算而商品房销售额按合同价款计算。主

营业收入包括了房地产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各项增加值（包括利润、工资、固定资本折旧等），也包含了房地产企业的各项业务成本（如土地购置费用和商品房建筑成本）。

200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商品房销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200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商品房销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房地产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201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8%，商品房销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8%，房地产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3%。201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商品房销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7%。

自2000年以来，房地产业各项活动指标在中国经济中的影响显著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4-5%上升到2014年的10-15%。

图一显示的是房地产业各项活动与历年国内生产总值绝对水平的比较，还不能充分显示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图二说明了房地产业各项活动指标自2001年以来历年增量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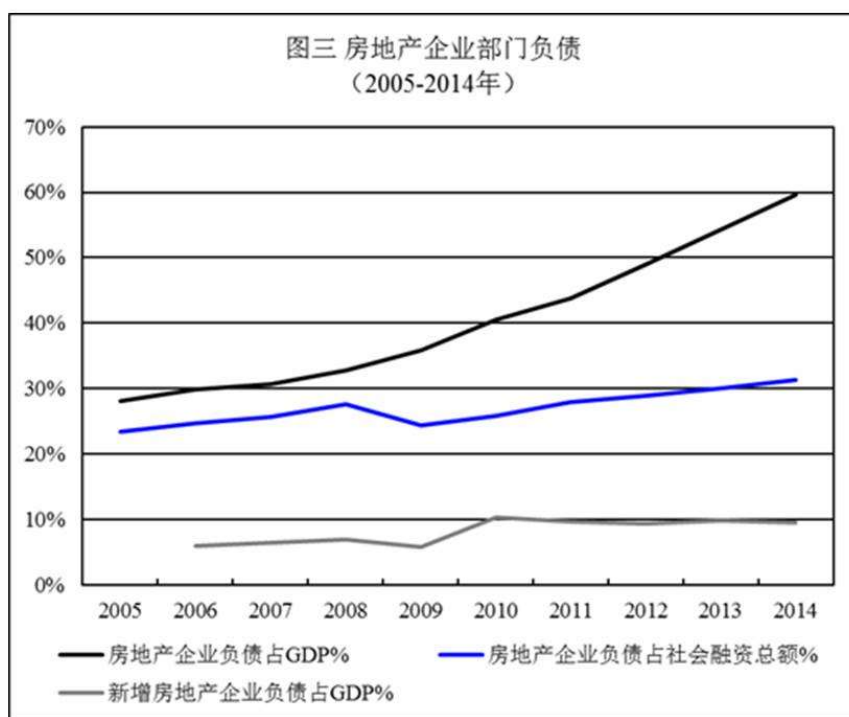
显然，房地产业各项活动增量占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比例波动剧烈。在有的年份，房地产业对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贡献巨大。如2009年，商品房销售额增量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增量的 65%。2013 年，商品房销售额增量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 31%，房地产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量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 36%。在有些年份，房地产业活动则发生负增长，如 2014 年，商品房销售额和房地产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都发生负增长。

今年前三个季度，房地产活动异常活跃。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 年 1-9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今年 1-9 月，商品房销售额达到 8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暴涨 41.3%。由于去年商品房销售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3%，据此可以粗略估，商品房销售额对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贡献将达到 5 个百分点。由于现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仅增加约 7 个百分点，那么商品房销售额增量将占到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绝大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推算方法，假设商品房销售额在当年全额支付，又假设由此产生的销售收入全部转化为房地产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增加值，其中的土地购置费用部分又通过居民和政府部门的支出转化为其他行业的收入。尽管如此，这一推算还是可以粗略地说明房地产活动目前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

图三用房地产企业债务增长的情况说明了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带来的金融隐患：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 年。

如图三所示，2005年时，房地产企业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到30%，2014年时已经达到60%。“社会融资总额”大约相当于中国经济中的全部非金融部门债务（中央政府债务除外）。2008年以前，房地产企业负债大约占中国经济中全部非金融部门债务的四分之一，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约三分之一。这说明房地产企业负债是整个中国经济债务水平上升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

新增房地产企业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9年以前，大约在6%，2010年以后，大约在9-10%。这个比例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稳定，其实大有学问。新增债务与新增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如果长期保持不变，就可以决定长期的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比如，2014年，新增房地产企业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9.5%，当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4%，这就意味着两者之比是148%，接近150%（在经济学中，这也叫做边际债务收入比）。也就是说，如果新增房地产企业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以及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没有变化，在长期，房地产企业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继续上升，直至趋近于150%。事实上，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未来很可能下降，从而意味着债务收入比上升的空间更大。另外，上述分析还没有考虑到居民部门为了买房而借入的住房抵押贷款。

根据这一节的简单分析，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房地产企业部门的负债增长显然不可持续，确有因为房地产企业大面积资不抵债而触发金融危机的危险。房地产企业部门的各项活动已经占到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份额，并且至少在某些年份，房地产企业部门各项活动的增长占到了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或者相当一部分。因此，一旦房地产企业部门爆发危机，将有可能引发整个中国经济的危机，或者导致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乃至引起经济负增长。由于房地产企业以及相关居民部门债务对投资和消费活动的抑制作用，在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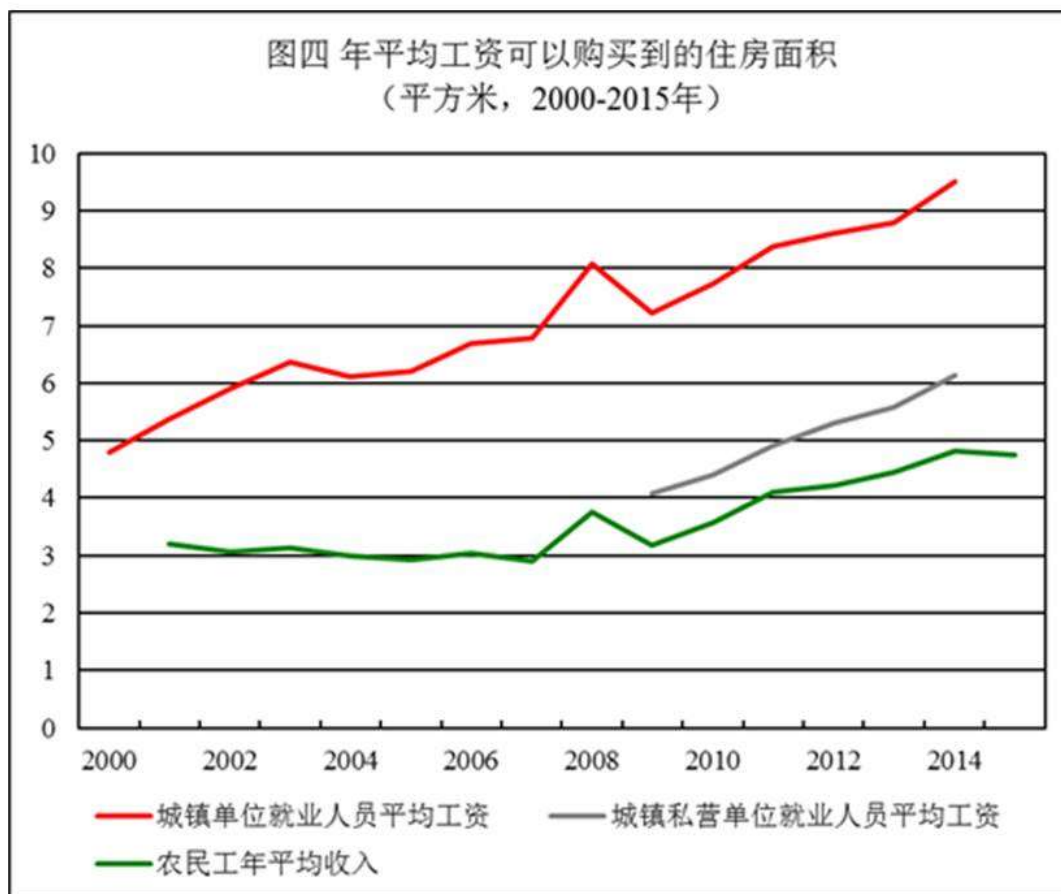
房价与工资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遏制房价暴涨，并使得房价逐步降低到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相适应的水平，确保所有劳动者都能获得合理的、有尊严的、能够满足正常生活需要的居住条件，是当前最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至2014年，全国住宅商品房每平方米平均单价从1948元上升到5933元，年平均增长8.3%。这个增长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没有超过工资的增长速度。同一时期，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按名义工资计算）年平均增长13.7%。当然，这里说的房价是全国平均价格，没有考虑到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

2015年，全国住宅商品房每平方米平均单价达到6472元，比上年增长9.1%。今年前9个月，全国住宅商品房销售额6.86万亿元，销售面积9.31亿平方米，每平方米平均销售价格7373元，比2015年全年平均价格已经上升了13.9%，显著超过了当前的工资增长速度。

图四显示了2000-2015年各类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按照当时全国平均房价可以购买到的住房面积：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

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年平均工资，指的是税前工资，没有扣除个人所得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等。所谓“年平均工资可以购买的住房面积”说的是假如一个劳动者一年不吃不喝，没有其他任何开销，也不纳税，不缴社保，将全部年收入用来买房“在理论上”可以买到的住房面积。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属于中国城市就业的“正式部门”，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股份制单位、港澳台资和外资单位。200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可以购买不到5个平方米的住房面积。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可以买到9.5个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2009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城镇私营单位不在“城镇单位”的统计范围内）可以买到4个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到了2014年，大约可以买到6个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2008年以前，农民工的年平均收入（按照10个月的月平均收入计算）大约可以买到3个平方米的城镇住房面积，此后有所增长。2014年，农民工的年平均收入可以买到4.8平方米的城镇住房面积，但是2015年，农民工年平均收入所折算的住房面积下降到4.7平方米。

即使就条件最好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水平来说，尽管其年平均工资所折算的住房面积有所增长，但是仍然大大低于一个城镇居民家庭为了维持正常居住条件所需要的水平。目前，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增加到30平方米以上。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正常居住条件，户平均住房面积应达到90平方米以上。如果按照正常情况下房价不应超过居民家庭年平均收入三倍推算（从而每年房贷还本付息按房价约10%计算，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一个家庭两个劳动者的年收入相加至少应能购买3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平均每个劳动者的年收入至少应能购买15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也就是说，现行房价至少要下降三分之一（从而劳动者年平均收入可以购买的住房面积增加50%），才能保证城镇就业人员中平均条件较好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不到四亿城镇就业人口的一半）通过购买商品获得城镇平均水平的居住条件。这还远不能满足城镇私营和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员的需要。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现在的房价大大超出了广大劳动者的承受能力，房市又为什么异常火爆呢？今年的商品房销售额有可能超过10万亿元，这10万亿元的销售额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现有的统计数据无法让我们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显而易见，在城镇挣扎奋斗勉强糊口的农民工不可能是购房的主力，城镇私营单位和非正式部门的工人也不可能是购房主力，即使是在城镇单位就业的普通职工通常也仅有一套供本人居住的住房。目前，能够在高位房价上继续投入巨资购买房屋的只能是资本家以及某些“灰色收入”群体。并且，这些特殊社会群体购买房屋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待价而沽、囤积居奇，利用房价上涨的趋势大捞一笔。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4年以《城镇住房空置率与住房市场发展形势》为主题的调查报告，在城镇地区全部家庭中，仅有21%的家庭有多套住房；但是在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中，有40%的家庭有多套住房，在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中，有53%的家庭有多套住房。根据该调查报告，2013年，中国城镇地区有22%的住房（约5000万套）处于闲置状态，可供1.5亿人居住。

可见，对住房拥有大量投机性需求的（表现为拥有多套住房和闲置住房），主要是社会上最富有的特殊群体，特别是最富有的 1% 的家庭。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房地产泡沫

住房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当然是由供求决定的。但是住房作为商品有其特殊性。住房是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所有人对于住房都有所谓“刚性需求”。在住房私有化的大趋势下，一般劳动者家庭都不得不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来购买住房。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也由于住房的建设周期较长，住房建设在短期相对于需求会有一些的滞后性。因此，在城市化建设初期，往往会发生住房价格以较快速度上涨的现象。住房一旦建成，又可以长期保存，短时间内不会变质损坏，因而投机者可以长期持有、待价而沽。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就使得住房成为大规模投机泡沫赖以形成的“资产”，而不再是简单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耐用消费品。

一旦房价开始出现上涨的趋势，就会有投机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推动房价进一步上涨。房价的持续上涨造成了普遍的房价上涨的预期，这时大量的普通家庭抱着侥幸心理也开始踊跃买房，甚至不惜背上沉重的债务，房价开始进入暴涨阶段，投机商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泡沫一旦形成，就很难停下来。就一般商品来说，如果某种商品价格上涨，会吸引更多的商品生产者进入这一行业，从而增加这一商品的生产，供给上升以后，价格就会降下来。从表面上看，中国近年来住房供给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据 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0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2.5 亿平方米；2014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10.7 亿平方米。2000 年至 2014 年，商品房屋的建筑竣工面积翻了两番，年平均增长 11%。既然房屋供给迅速增长，为什么房价仍然暴涨呢？一方面，这是因为投机性需求比房屋供给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开发商看到房价不断上涨的趋势，并不急于出售所有的建成住房，而是有意识地将一部分建成住房控制在手里，人为地限制住房供给，给房价上涨推波助澜。有资料表明，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空置的住房面积多达 10 亿平方米（新华视点，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01/c_1115153720.htm），相当于 1000 万套住房。这里说的“空置房”，指的是房地产市场上尚未售出的住房，区别于前面所说的已经为居民拥有但并未使用的闲置住房。

在房地产泡沫产生过程中，要产生对住房的巨大的投机性需求，除了资本家和特殊社会群体的自有资金外，还需要信贷资金的大量投入。所以，在表面上，如果中央银行下决心紧缩货币供给，银行系统减少贷款（紧缩“银根”），似乎就可以抑制住对住房的投机性需求，消除房地产泡沫。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也好，财政部也好，乃至国资委、发改委，都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控制。至于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其经营目的也是为了

赢利而不是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如果银根紧缩，那么就是普遍紧缩，不会仅仅是减少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而是会普遍地减少对一切生产活动以及居民正常消费需要的贷款。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收缩对各个经济部门的打击是“无差别”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实行有差别的信贷配给，比如由国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银行只给生产性部门贷款，不给房地产等投机部门贷款，那么就属于政企不分、行政干预、指令性计划，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机制，是严重违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的。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应变化的影响是无差别的，中央银行一收紧货币供给，利率必然普遍上涨，往往是房地产泡沫还没有破裂，许多正常的生产部门已经纷纷周转不灵、陷入困境。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东南亚各国、英国、欧元区，企图靠货币调节来抑制房地产泡沫并实现经济软着陆，无一不遭到失败。

历史经验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避免房地产泡沫，也不可能避免泡沫破裂以后的严重经济危机以及给劳动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

那么，号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能不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的历史覆辙呢？这要看中国现在的经济政策能不能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克服市场经济内在的盲目性、非理性。

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战胜房地产危机

如上所述，目前的房价水平（即使按全国平均房价来说）大大超过了城镇广大劳动者所能承受的合理水平，目前的房价暴涨使得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另一方面，在市场主导、以赢利为目的的房地产业主导住房建设的大形势下，一旦房价大幅度下跌，又势必导致大批房地产企业资不抵债，进而引发全面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目前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是要采取大胆果断的措施，不仅平抑房价，而且从根本上满足城镇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城镇新增就业人群的基本住房需求。与此同时，防患于未然，一方面力争避免房地产危机爆发，另一方面本着“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原则，做好万一房地产危机爆发的应对准备。

就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要来说，应当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放弃在实践中已经证明失败的由市场和私人资本主导的房地产体制；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原则出发，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在计划指导下、国有资本主导、以满足民生为目的的住房建设政策。

具体来说，由中央政府牵头、地方政府参与，以五至十年为期，进行大规模的以满足新增城镇就业人员住房需要为目的的住房投资建设。根据现在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员 1000 万以上的具体情况，可以每年新建约 500 万套国有廉租住宅。为此每年需要建设住房面积约 5 亿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造价 3000 元匡算，约需投资资金 1.5 万亿元，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

2015 年，全国的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高达 18 万亿元，其中存在一些浪费，还有一些是用于并非社会十分需要的项目（比如边远地区的高速公路或者某些表面化的城市建设），将这些浪费的或者并非社会十分需要的资金节约下来，就是一笔可观的资金。另外，目前中央政府债务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增发一批债券，比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用于向地方政府提供建设国有廉租住宅的专项资金，其余所需资金则由地方政府自筹（或者从现有资金中节约，或者向银行贷款）。如此连续投资 5 年，中央政府债务仅增加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5%；如利息率是 5%，则中央政府每年新增利息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况且，这笔投资是可以逐步回收的。

如果一套 100 平方米的国有廉租住房造价 300000 元，出租第一年月租金为 1000 元，大约相当于一个有两份工作的农民工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第一年后（随着工资增长）每年租金可以上涨 5%，那么只要 17 年，国家就可以收回原始投资成本。

每年 500 万套的国有廉租住房，可以满足相当一部分新增城镇就业人口的住房需要，由此形成的每年 5 亿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大约相当于现在每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一半，可以对住房价格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每年新增 1.5 亿元的国有住房投资，可以稳定总需求，缓解部分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减少下岗失业人口，促进社会稳定。

在理想情况下，通过国有住房建设，可以一方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住房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促进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使房价逐步回落到合理水平。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内在的非理性和无政府状态，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住房的供求形势发生变化以后，房价在短时间内发生暴跌，并进而导致大批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破产。

房地产危机一旦爆发，可能从两个方面对整个经济造成重大威胁。一是，房地产投资大幅度下降，并且通过“乘数作用”（因为投资减少导致收入减少，又导致消费等支出进一步减少）以及对居民、企业部门信心的冲击，导致消费和投资全面下降。二是，大批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破产后，银行系统坏债大幅度增加，银行可能被迫减少借贷、收回贷款，使得经济雪上加霜。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还是要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用主动的计划干预来克服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如果万一发生房地产投资大幅度下降并引起有效需求

全面不足的情况，可以及时增加国有部门的公共投资，并适当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比如，全面提高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从而稳定总需求。如果房地产危机导致银行系统大面积坏债，则应迅速地（在必要时，不计代价地）向银行系统注入国有资本，将坏账注销，用政府债务代替银行债务，使得银行系统得以顺利恢复运转；同时指导国有银行部门将一批资不抵债的私人房地产企业收归国有，改组为国有的住房建设和管理公司，其所拥有的尚未售出的商品住房则可以改为国有廉租住房，用于缓解城市劳动群众住房紧张的状况。只要有强大的国有部门做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就可以避免类似美国那样的“大衰退”或者日本那样的长期停滞。

在深层次方面，则应反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改革路线，吸取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教条而多次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既适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局限性。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市场经济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市场经济既不能避免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吃穿住行方面的基本需要，更不能克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痼疾。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制度，具体来说，只能靠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及全社会自觉的、有意识的计划调节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在未来能不能顺利发展，取决于经济领域的决策当局，敢不敢解放思想，打破对市场的迷信和教条，承认并发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探索出一条不仅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而且从根本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特朗普胜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2016-11-10

作者：远航一号

大约两个月前，笔者在题为“怎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美国大选”的短评中，在分别分析了希拉里·克林顿与特朗普的阶级基础以后，曾经断言：

“无论十一月份的大选谁胜谁负，美国资本主义日益激化的内外矛盾，都已经开始超出美国资产阶级控制的范围。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彻底烂掉的那一天，正在缓慢地但是确定地向我们走来。”

出乎整个资产阶级主流媒体的预料，实际上也出乎笔者个人的预料，特朗普在遭到几乎美国整个资产阶级阵营的反对，遭到整个主流媒体的狙击，竞选经费仅为对手一个零头的情况下，违背了美国资产阶级选举的各种“准则”和惯例，竟然当选了。这是美国资产阶级对国内政治发展全面失控的确凿表现。在两个月前的短评中，笔者也曾经说：“美国资本主义内部原来的社会妥协基础崩溃，阶级和种族矛盾达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最激化的程度。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美国资产阶级对选举政治失控的局面。”但是，资产阶级的失控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并非笔者始料所及的。

那么，特朗普已经当选，按照正常情况（即假设美国资产阶级在未来一个时期不采取一些体制外的非常手段），将在明年一月份正式就任美国下一任总统，对于美国和世界的局势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分析一下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面临的矛盾。

在上世纪中期，世界资产阶级曾经一度被迫对世界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做出很大的让步，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出现了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高涨的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深刻的积累危机。为了挽救危机，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政策，在国内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在世界范围则将工业生产部分转移到中国等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地区。

为了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资产阶级积极在世界范围推行资本自由流动、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由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和硅谷“高技术”资本家组成的大资产阶级暴富，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主要由能源和军事工业综合体组成的传统行业工业资本家也随之受益；其中，前者是民主党的主要阶级基础，后者是共和党传统精英的主要阶级基础。另一方面，美国

工人阶级则陷入了生活水平下降与停滞不前的困境，其中相当一部分破产失业、生活无着，贫困与接近贫困线的劳动群众达到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经历了 2008-2009 年的经济危机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社会妥协机制近乎完全崩溃。在这种形势下，奥巴马这个年轻时曾经伪装“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客粉墨登场。奥巴马上台后，完全充当了美国金融资本家的忠实走狗。他一上台，就花了一万多亿美元为银行资本家冲销坏账。奥巴马执政八年，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继续上升，资本家的总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水平。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在目前美国的具体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发展不能够导致社会革命，但是阶级斗争仍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这种表现，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引起社会进步，但是却能够严重地削弱美国和世界资产阶级，为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斗争创造条件。

这次特朗普能够胜选，其所依赖的选民基础主要是以白人为主的各种族工人阶级和小业主。大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所谓“专业技术人员”）继续甘当民主党和金融资产阶级的走卒。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政治历史上，美籍华人第一次成为一支显著的政治力量。华人倒向特朗普是后者胜选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提出了一些迎合白人工人阶级、小业主以及可能包括一部分中小资本家的政治口号。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一是减税政策，二是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三是打击非法移民。这几种政策，如果在白人工人阶级、小业主的强大压力下，再获得一部分与华尔街、硅谷联系不太密切的资本家的支持，有可能得以实行。

其中，减税政策本身，主要的直接受益者是资本家。但是，如果特朗普政权将减税政策（本身将增加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与贸易保护主义（有助于减少贸易赤字）结合起来，将有可能导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全面瓦解，并进而削弱中国等依赖美国出口的亚洲各国资本主义。限制移民的政策，可能减少美国资本家可以直接获得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美国工人的斗争，同时加深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资本主义的矛盾。

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在白人劳动群众的压力下，提出了一些减少美国对外干预的主张，遭到华尔街资本家的激烈反对。但是，面对美帝国主义政治和军事力量全面萎缩的现实，特朗普有可能实行在全球收缩帝国主义战线的计划，特别是从中东撤出美国的干预力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中东的各资产阶级政权将更加不稳定，沙特王朝可能会迅速垮掉，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欧洲也可能陷入政治和经济的总危机。

世界范围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浪潮发端于里根、撒切尔时期，并在比尔·克林顿任美国总统期间达到鼎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华尔街资本家的政治总代表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大选中惨败，新自由主义乃至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下坡路已经在世人面前展开了。

究竟谁支持了川普？

2016-11-11

作者：水边

川普当选之后，国内国外很多媒体都鼓吹川普是靠了底层（年轻）群众的支持，而战胜了代表体制力量的希拉里。甚至远航的文章里面，也做了如下的断言：

“这次特朗普能够胜选，其所依赖的选民基础主要是以白人为主的各种族工人阶级和小业主。大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所谓“专业技术人员”）继续甘当民主党和金融资产阶级的走卒。”

但是真的如此吗？还是要靠证据说话。

大家可以看看大选的调查（比如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xit-polls.html?_r=0），这个是比较公认的权威数据。

这个里面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年收入在 50000 美元以下的（也就是将近美国一半人口的底层群众），只要是去投票了的，大部分都投票给了希拉里。而川普的票源在哪里呢？

不是收入低的底层工人，而是来自于收入高于 5 万美元的白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些人里面很多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年龄在 45 岁以上。

恰恰不是什么底层，不是什么反体制力量，把川普推上了台，而是这样一群人，是靠近既得利益，靠近体制的人。

在美国政治里面，投票的人不多，大概只有一半，而底层投票比例低，中上层投票比例高，这就是为什么底层没有选择川普，但是川普依然获胜了。

希拉里的问题是她自己的问题太多了，形象太差，没有能够让更多的底层群众对选举有热情。这跟奥巴马当时是很不一样的情况。可以说，民主党选择了希拉里，是完全自毁长城。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得出川普的上台是得到了白人工人支持这样一个结论，这是川普一

派一直宣传的，但是工人显然没有那么笨。当然，基于川普上台政治基础的一系列其他结论也就成了没有根据的了。

再谈特朗普上台的选民基础 —— 与水边同志商榷

2016-11-11

作者：远航一号

红色中国网的水边编辑写了一篇短评，批评远航一号在“特朗普胜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中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关于特朗普的选民基础，水边引用了《纽约时报》的数据，认为年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选民主要把票投给了希拉里·克林顿，因而远航一号所说的“以白人为主的各族工人阶级和小业主”是特朗普的主要选民基础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这里首先要说明，我与水边同志探讨的是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不是特朗普作为资产阶级政客的阶级基础。就阶级基础来说，特朗普作为一个美国主要资产阶级政党（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其阶级基础只能是资产阶级。

我去了水边介绍的《纽约时报》的选举统计网址。这里也要说明一下，这个统计是选民投票后在投票站出口处所做的民意测验，有一定误差，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还是可以说明一定问题。

如水边所说，家庭年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有51-53%的选民把票投给了希拉里·克林顿，有41-42%的选民把票投给了特朗普。在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各组别中，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人数都超过了投票给克林顿的人数，但是比例差别不大，也就差1-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年收入5-10万美元这个组别中，有50%的选民把票投给了特朗普，46%的选民把票投给了克林顿。就美国来说，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往往在10万美元以上。一个有两份稳定工作的工人阶级家庭也完全有可能获得10万美元左右的税前收入。所以，年收入5-10万美元基本上代表上层工人阶级和下层小资产阶级的收入水平。

在美国这样一个阶级、种族、宗教等矛盾交织错综的国家，在政治分析中不能不考虑种族的因素。所以，我在原文中，特别提到了以白人为主的工人阶级和小业主。应当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中，白人工人阶级一定程度上受益，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由于很多白人工人在制造业中工作，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首当其冲，失去了大量原来令人羡慕的高工资、有保障的工作，许多人陷入贫困。其情景，与中国的国企老工人有一定可比性。

相比之下，少数族裔的工人阶级深受压迫，往往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其中至少一部分工人（特别是其中的新移民）其绝对生活境遇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未必下降。其情景，又与中国的农民工有一定可比性。再加上被出身少数族裔的资产阶级欺骗并受到美国小资产阶级“左派”流行的“身份政治”（强调种族、性取向，淡化阶级）的影响，往往被民主党裹挟。如果做个类比，在中国也有一些伪装关心底层的所谓“良心”知识分子，往往喜欢炒作城乡差别，并故意用城乡差别来掩盖阶级差别，并借机攻击城市工人，因而可以吸引一部分政治上不觉悟的劳动群众。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白人工人阶级投了谁的票呢？在《纽约时报》的网址上有这样一项统计，在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中，投特朗普票的高达 67%，而投克林顿票的只有 28%。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显然主要是工人阶级，还包括一些小业主。

要知道，白人工人阶级在美国的“新政”时代，是民主党的主要群众基础。到了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时期，就已经被民主党抛弃。但是，在 2000 年大选中，仍然有大约一半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把票投给戈尔。但是，在这次大选中，特朗普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二的白人工人选票。

白人工人对特朗普当选所起的关键作用在俄亥俄、密歇根、威斯康星等产业工人较为集中而对选举结果又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州中，都有突出表现。比如，在俄亥俄州煤矿工人集中的蒙罗郡，2012 年大选中，奥巴马得票超过罗姆尼 8 个百分点，而在此次大选中，特朗普赢了克林顿 47 个百分点。在密歇根州蓝领工人集中的马康姆郡，在 2012 年大选中，奥巴马赢了 4 个百分点，而在此次大选中，特朗普赢了 12 个百分点。

在《纽约时报》的统计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指标。那就是，与过去相比，你的家庭的财务状况在今天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在回答“家庭财务状况在今天更好”的选民中，有 72%投了克林顿的票，24%投了特朗普的票；而在回答“家庭财务状况在今天比以前恶化”的选民中，有 78%投了特朗普的票，只有 19%投了克林顿的票。在奥巴马时代，资产阶级继续暴富，美国家庭收入的不平等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资本家总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水平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水平。哪个阶级受益？哪个阶级受损？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

在资产阶级选举政治中，选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重要的因素。在以往，当资产阶级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选举进程的时候，金钱的“投票”往往才是决定选举胜负的最主要因素。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有趣的统计数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年 9 月 9 日有一篇报道，标题为“大多数行业的捐款者支持克林顿”。<http://www.wsj.com/articles/donors-in-most-industries-back-hillary-clinton-1473462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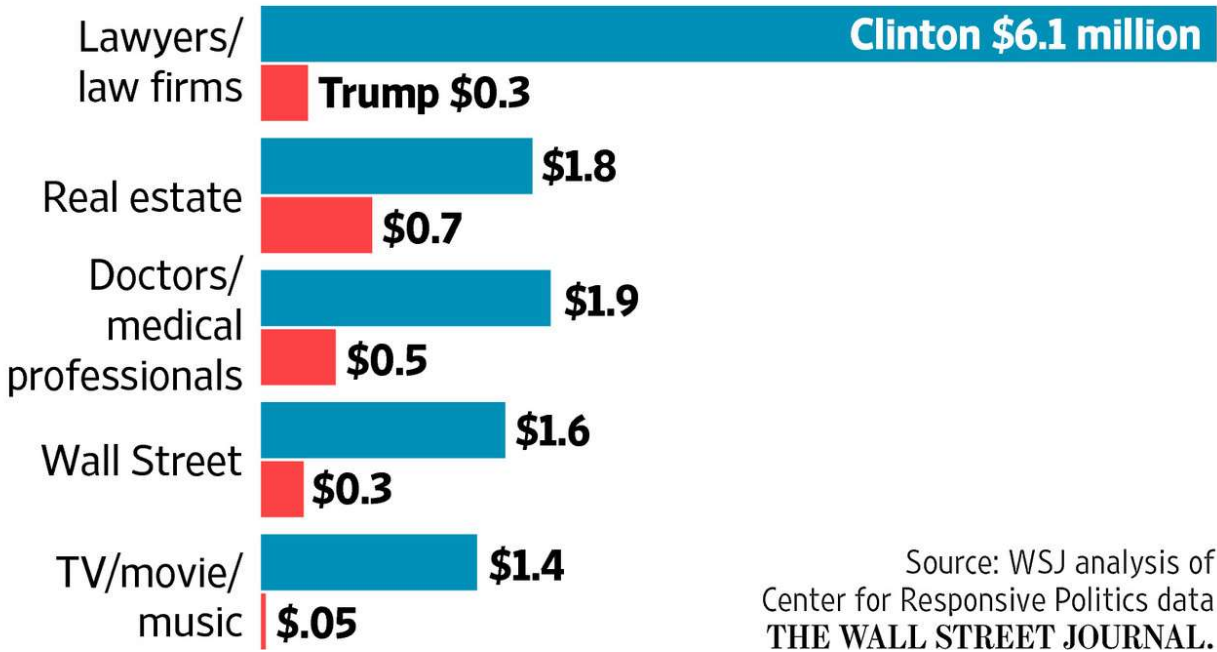
下面一幅图说明了五个给大选捐款最多的行业所捐款项在两个主要候选人之间分布的情况：

Industry Dollars

Hillary Clinton holds a fundraising advantage among business industries with the most donations from May through July of this year.

Donations to presidential campaigns by industry

Among five industries that donate the most



如图所示，在今年5月至7月，律师和法律界给克林顿捐款610万美元，给特朗普捐款30万美元；房地产业给克林顿捐款180万美元，给特朗普捐款70万美元；医生和医疗界给克林顿捐款190万美元，给特朗普捐款50万美元；华尔街金融界给克林顿捐款160万美元，给特朗普捐款30万美元；电视电影音乐等娱乐界给克林顿捐款140万美元，给特朗普捐款仅5万美元。

另据《华尔街日报》9月6日报道，在截至今年7月底的捐款周期中，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给克林顿的直接捐款达到52万5000美元，而给特朗普的直接捐款只有14万9000美元。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传统上是支持共和党的一个主要资本集团。

<http://www.wsj.com/articles/so-far-hillary-clinton-raises-more-than-donald-trump-from-oil-industry-1473190849>

可以说，克林顿得到了美国所有主要资本家集团的支持。特朗普本人是一个大资本家，其阶级基础也是资产阶级无疑。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有任何一个行业的重要资本家集团在本次大选中采取了支持特朗普的立场。

可以肯定地说，此次特朗普当选，是违背美国资产阶级主要集团意志的，是出乎美国资产阶级意料的，这是美国资产阶级对政治过程的控制开始瓦解并陷入失控的具体表现，是世界上阶级斗争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新动向，应当引起我们重视。

当然，这并不是说，因为特朗普当选违背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意志，他上台后就会采取进步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毫无疑问，特朗普政权是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其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必然是反动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美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日益活跃并觉醒的形势下，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开始出现种种分裂的形势下，在美帝国主义自身日益衰落的条件下，特朗普政权可能会被迫采取一些客观上会加剧世界资本主义矛盾、有利于世界其他各国革命斗争的政策。

比如，如果特朗普政权为了欺骗本国工人阶级同时满足美国一部分资本家的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就会在客观上打击华尔街金融资本以及微软、苹果等大公司利益，并间接打击中国等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进而促进中国等亚洲各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

总之，特朗普当选是件大好事！这个“好”，不是说美国工人阶级很快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这还要经过漫长的斗争；而是说，特朗普当选既是美国资本主义各种客观矛盾的反映，是美国资产阶级开始对美国、对世界阶级斗争发展形势失去控制能力的标志，也很可能在客观上造成对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更加有利的条件。

各位网友，世界历史的大时代即将来临了，让我们时刻准备着！

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及其当选的影响 —— 回应远航一号

2016-11-15

作者: 水边

远航同志对美国大选有一些新的观察，也回应了我之前的短评。我也经过了一些更细致的考虑，简要的说说新的看法。这里，我统一用特朗普这个名字了。

这次投票统计里面，没有大学文化的白人选民大部分都投给了特朗普，一般的，媒体上也把这些人叫做白人工人阶级。这些人往往是 4, 50 岁或者以上的中年人。这些人的人生经历是往下走的，曾经遇上过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尾巴，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却又遭遇了很多困境，对美国当代状况极为不满。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人可能并不是最底层的工人，比如说家庭年收入在 5 万美元以上，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五万多块，所以这些人能比中位数好一点。从各个媒体对于特朗普支持者的采访来看，这些人往往在经济上还过得去。美国新自由主义和去产业化已经进行多年，这些人早就已经改换职业，甚至做起了小业主，但是他们依然对新自由主义时代遭遇的麻烦非常不满，对于美国当局非常不满。

当然美国收入中位数以下的那些人，更多的支持了希拉里，这些人往往是拉美裔的，或者非洲裔，他们虽然穷困，但是因为起点低，之前也没有享受什么福利社会的好处，所以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反而没有这种日子越来越差的感觉。

如果说要划分阶级，我们没法做到很准确，用收入不合适，但是用教育水平也同样不合适。如果“机械”的划分一下，我想远航说的，5 万到 10 万作为工人上层和小资下层应该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那么是不是这部分白人工人（在整个美国来看是属于工人上层，甚至小资产阶级），最终让特朗普获得胜利呢？

我们可以跟 2012 年的选举比较一下。在 2012 年，奥巴马和罗姆尼两人竞争，在 5 万到 10 万这个收入档次，奥巴马得了 46%，而罗姆尼得到了 52%。看看今年，希拉里在这个档次得了 46%，而特朗普得了 50%。所以从这一点看，很难说这个档次的选票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里的差别在哪里呢？看起来可能是在 5 万以下的这个档次，希拉里拿到了 52%左右的票，而特朗普拿到了 42%左右。这 10 个百分点的差别，就是我之前为什么认为底层工人没有支持特朗普的原因。

但是在 2012 年，奥巴马在这个低收入档次拿到了 60%的票，而罗姆尼只拿到了 38%。换句话说，希拉里丢失了一大块底层工人的票，而特朗普稍微增加了一点。注意，这个底层工人，虽然我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应该有大量的拉美裔和非洲裔的工人阶级，当然可能也包括了一小部分底层白人工人。

所以，这么看起来，特朗普之所以能赢，有很大原因是民主党丢掉了一部分底层劳动者的支持，其中有些甚至去支持特朗普了。但是这些底层，究竟多大程度是那些中年白人工人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不会是的。

这是我对于大选统计的一点总结。我的目的很简单，主流媒体，包括国内的媒体，非常喜欢把特朗普的胜利看作是所谓平民战胜了体制/资本，而我相信，这并不是特朗普获胜的基础，特朗普的胜利有其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很大程度来自于其对手希拉里自身的问题。

远航还提到，特朗普的当选是违背资产阶级主要集团意志的。对我来说，这个不那么明确。当然了，特朗普得到的捐款远远少于希拉里。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还是更多的投了特朗普这个更重要的事实。实际上，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候选人之后，那些传统支持共和党的资本家集团自然就跟特朗普站到一起了。但是我同意特朗普的当选对资产阶级也是一个意外，因为主要的变化因素不是他们。

最后，我还要说一说特朗普当选对于革命意味着什么。首先，不管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都提出了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所以在这一点上，特朗普并没有太大不同的地方，并不会特别的促进世界革命的形势。其次，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共和党长期鼓吹的大规模财政紧缩计划将实施起来，正如世界各地的经验所告诉我们的，大规模财政紧缩会极大的打击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这个再配合上极有可能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群众斗群众可能会愈发频繁，而这个环境并不会对工人斗争和组织有任何直接好处。

所以我的态度就是，特朗普当选不是什么好事情，不仅对于美国人民不是好事情，对于世界人民的斗争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一个更反动的政权，一个更糟糕的经济状况，都不是促进革命的必然因素，里根撒切尔上台，邓小平上台，这都是明确的反动政权，然而他们却给工人和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事实上，如果我们已经在理论上非常清楚，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其潜力，那么我们完全应该支持一个更倾向于改良的政权，因为这样反而能更清楚的暴露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也能给我们的斗争创造相对有利的环境。

天塌不下来 —— 与水边同志再商榷

2016-11-15

作者: 远航一号

读到水边同志关于特朗普当选问题的最新评论，简单说几点想法，以便与水边同志进一步商榷。

首先，无论就红色中国网来说，还是就我们个人来说，都不存在支持或反对美国大选中某一方的问题。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与水边同志，均非美国公民，也不准备做美国人，平常也不积极参与美国当地的阶级斗争。就红色中国网来说，我们的性质很明确，红色中国网是中国的马列毛主义积极分子所领导的进步网站，致力于中国的进步事业，并且主要是通过中国的进步事业的发展对世界的进步事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特朗普上台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于里根撒切尔等上台的历史条件。里根、撒切尔不仅反动，而且生逢其时。他们上台时，不仅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存在着克服资本主义积累危机的历史条件。里根撒切尔等人的作用，在于将世界资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将客观上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转化为现实。

特朗普虽然反动，但是生不逢时。当前，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危机都在加深。这次危机，尚未达到高潮（世界危机的高潮有待于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与以往不同，这次危机将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加以解决。（关于这个论点，有机会再详加阐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绝不会仅仅因为特朗普“反动”，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就突然可以回光返照、起死回生；也绝不会仅仅因为希拉里会讲一些在美国特定政治语境中比较“进步”的花言巧语，斗争就不那么残酷。

关于特朗普、希拉里的具体政策，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分析美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前提下，具体分析美国资产阶级当前整体的和局部的基本利益，分析其他各个阶级的基本利益以及他们对于资产阶级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再根据各阶级之间以及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具体的力量对比来判断美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可能采取的具体行为，而不是根据道听途说、根据资产阶级媒体的炒作或根据资产阶级总统候选人的只言片语来轻率地认定某人可能如何“反动”以及某人可能如何“进步”。

就美国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来说，不仅目前没有革命形势，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也不会有革命形势。这并不是说，美国劳动群众的斗争没有意义。这种斗争的主要意义，不是在美国本国造成革命，而是大大增加美国资产阶级的困难，间接地支援世界其他地方劳动群众的斗争。

这次特朗普当选，是美国资产阶级对于选举政治失去控制的结果，是美国资产阶级政治陷入严重混乱的表现。我要提醒水边同志，我的这个结论并不仅仅是根据两个主要候选人之间的竞选金额做出的。请水边同志想一想，在此次大选之前，有多少家主要的资产阶级报纸是明确拥护希拉里的，而谁又能找到哪怕一家主要的资产阶级报纸明确拥护特朗普？除非我们认为美国的媒体不是资产阶级操纵的，否则我们绝不会认为美国资产阶级媒体的这一政治态度是偶然的。同样的，除非我们不讲历史唯物主义，也绝不能简单地认为，特朗普当选是偶然的事件。确实，如果民主党方面能够推出一个类似于奥巴马那样较有个人“魅力”的候选人，大选结果完全有可能不同。但是，之所以，奥巴马在2008年还很有欺骗性，而在2016年，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无法推出一个像样的候选人，这本身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就已经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特朗普既已当选，他对美国和世界阶级斗争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加强还是削弱美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加深还是缓解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有两个涉及事实的问题，还是要同向水边同志澄清一下。

首先，水边同志说，共和党长期鼓吹的大规模财政紧缩计划将给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新的打击。就特朗普现有的政策主张来说，没有迹象表明，他要实行大规模财政紧缩；目前的报道是，特朗普政权将通过财政扩张政策（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税）来刺激经济，并且目前看来，美国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共识。

水边同志认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提出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因此不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二者的政策会有什么不同。如上所述，我们要根据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而不是仅仅根据某人在某种场合说过某种话来做出严肃的政治判断。众所周知，贸易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美国金融资本家、硅谷高技术资本家等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无论从克林顿家族的阶级基础（与华尔街的密切关系）来说，还是克林顿家族的历史来说（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鼎盛时期），都没有理由认为，希拉里会真正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维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基本格局的大前提下，做一点“微调”，应付一下公众情绪（只要后者是能够应付得了的），这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基本功。

另一方面，特朗普当选，则是向美国资产阶级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讯号，即美国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对于贸易自由化的反对已经强烈到相当的程度，再加上美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这就很有可能迫使美国资产阶级采取一些仅对一部分资本家有利而对美国资产阶级和世界

资产阶级整体不利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首当其冲的，就是“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胎死腹中）。

特朗普当选，对于美国和世界工人阶级，到底是不是那么可怕？是不是如某些“进步左派”（如那个哈佛博士张跃然）希望我们相信的，人民的“斗争环境”马上就会严重“恶化”，法西斯主义的黑暗时代就要来临（相应的结论就是，如果有哪一次选举，人民不选举如克林顿那样受到“进步”力量影响的、不那么“反动”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那么就不得了，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不用多久，就可以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求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如果要我个人给美国的进步政治力量一些友好的建议。我只能这样讲，美国的进步事业要有任何希望，都要从彻底摆脱对民主党的依赖和幻想做起。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就把自己从灵魂到肉体都出卖给了民主党，甘心做后者的“忠实的反对派”。只要这种局面不改变，美国的进步事业就毫无希望。

任何政治变革，当然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要敢于冒让民主党以外、看起来更“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候选人当选的风险。如果这点风险都不敢冒（想想历史上历次伟大革命的巨大牺牲），那么在政治上还能有什么出息？

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

2016-12-9

作者: z2z2

编者注: 错误观点

实践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是真理。关于这此,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使之绝对化, 就走向了反面, 就使之变成了谬误。

首先, 唯一具有排它性, 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使之绝对化了, 就违反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 真理具有相对性, 而无数的相对真理之总和才是绝对的真理。这实际上等于说, 绝对的真理只是一种极限。所以一般来说, 真理只是相对的。但是, 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使之绝对化了, 就使之变成了绝对的真理, 这就去掉了真理的相对性, 因而就直接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这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反映。

其次, 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和逻辑和常识相抵触。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东西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例如, 如果某人说某事前后矛盾, 自相矛盾, 我们就知道, 他说的是错的, 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而这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既然如此, 这就直接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的东西根本无法用实践来检验, 但它们同样被接受为真理。例如, 一些科学假设和几何公理都没有通过实践检验, 并且也不能通过实践来检验, 但它们同样被接受为真理。再说, 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 也同样无法用实践来检验, 但人们仍然将唯物论或唯心论接受为真理。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 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根本上来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但决不是唯一的标准。如果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我们必然滑向唯心主义。在这方面, 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例子, 那就是邓小平腐败集团的例子。邓小平腐败集团已经用他们的行动表明,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一切现有的理论和实践, 当然包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 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邓小平腐败集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果, 最后变成一切由邓小平腐败集团说了算。也就是说, 最终一切都走向了唯心主义。非常讽刺的是, 邓小平腐败集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果, 最终却是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实践。这就是违反唯物辩

证法的必然结果。

这此都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荒谬的, 其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危害是极大的。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大旗, 邓小平腐败集团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是吗? 邓小平腐败集团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 顺利地否定了文革, 顺利地否定了社会主义, 顺利地否定了马列毛主义, 顺利地复辟了资本主义, 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的灾难。难道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还不应该记取吗? 至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 难道我们还看不出来吗?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证明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性的

2016-12-10

作者：远航一号

Z2Z2 网友撰文，与各位红色网友一起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Z2Z2 网友认为，“实践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之绝对化，就走向了反面，就使之变成了谬误。”“邓小平腐败集团已经用他们的行动表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一切现有的理论和实践，当然包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大旗，邓小平腐败集团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是吗？邓小平腐败集团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顺利地否定了文革，顺利地否定了社会主义，顺利地否定了马列毛主义，顺利地复辟了资本主义，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的灾难。”

这里首先与 Z2Z2 网友探讨一个问题，马列毛主义是不是那样脆弱，只是因为邓小平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的旗帜挥舞一下，就被“轻而易举地”否定和打倒了？如果按照 Z2Z2 网友的逻辑，只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旗帜挥舞一下，资产阶级就可以顺利地否定马列毛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那么资产阶级既然得到了这样的反革命法宝，岂能轻易放弃，只要他们一直将这面旗帜不断地挥舞下去，岂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永无翻身之日？

事实上，被“轻易”否定和打倒的不是马列毛主义，而是华国锋叛徒集团。由于华国锋叛徒集团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使得自身的阶级基础十分狭窄，也得不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因而才在与邓小平、陈云集团的论战中被盗用马克思主义的对手轻易地击败。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即认为马列毛主义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来讲，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解放了生产力、为劳动人民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创造了最良好的条件，还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准备了相应的历史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是已经经过三大社会实践（当然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方面的实践）所证明的真理。中国过去几十年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实践则从反面证明了马列毛主义的正确即真理性的。所以，马列毛主义并不害怕实践的检验。真正害怕实践检验的，不是马列毛主义，恰恰是资产阶级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哲学。

Z2Z2 网友提出，“实践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之绝对化，就走向了反面，就使之变成了谬误。”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从马列毛主义的观点看，或者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所谓真理或谬误，只能有一个含义，即人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就是真理；反之，就是谬误。

人的思维、人的认识是外部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认识是否符合外部世界的客观实际呢？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已有的认识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还是比较不符合客观实际呢？如经典导师和毛主席所说的，除了实践，没有别的办法。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请问 Z2Z2 网友，除了实践，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标准，能够证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此岸性”呢？

既然 Z2Z2 网友提出，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一定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标准。这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当这些标准与实践标准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又应当接受、采纳哪个标准呢？

真理的标准问题，不是个小问题，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根本问题。如果在实践之外，还有其他的标准，经典导师、古往经来无数的哲学家不可能没有探讨过。他们关于实践以外其他真理标准的论述，又有哪些呢？

Z2Z2 网友认为：“唯一具有排它性，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使之绝对化了，就违反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真理具有相对性，而无数的相对真理之总和才是绝对的真理。这实际上等于说，绝对的真理只是一种极限。所以一般来说，真理只是相对的。但是，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使之绝对化了，就使之变成了绝对的真理，这就去掉了真理的相对性，因而就直接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这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反映。”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所谓绝对真理，即客观真理，也就是不依赖于人和人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所谓相对真理，指的是人或人类在某一时间、某一条件下对于一定客观实在的具体认识。这种具体认识，有符合客观实际的一面，但是也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一

面。辩证唯物主义又认为，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 ZZZZ 网友所说，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了绝对真理。

一般人们的认识只是相对真理，在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间既有距离又并非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我与 ZZZZ 网友的共同认识。那么，请问 ZZZZ 网友，当人们的认识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时候，从一定的相对真理出发，人们的认识又如何能够跨越那道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逐渐接近绝对真理呢？除了实践，还有什么办法？

让我们再次认真学习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其中的论述：

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这里，毛主席论述了人的认识的两次飞跃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两次飞跃”其实是代表着人们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无数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第一次飞跃中，人的认识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形成了思想。这时的思想已经是对客观实际的一定的反映，包含着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面，即包含着列宁所说的“相对真理”。但是，这时人的思想（或理性认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客观实际，还是没有证明的。只有经过了实践的过程，将第一次飞跃中产生的认识应用于社会实践，根据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人们的预期，才能初步地得出结论，即在第一次飞跃中产生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多少。这时，人又会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理性认识，实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毛主席指出，第二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经过了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第二次飞跃，才能证明在第一次飞跃基础上形成的认识是否正确（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从毛主席所说的“第一次飞跃”到“第二次飞跃”的过程，也就是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靠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把人们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考验，“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也就是说，再无别的接近绝对真理的办法。

Z2Z2 网友说：“有的东西根本无法用实践来检验，但它们同样被接受为真理。例如，一些科学假设和几何公理都没有通过实践检验，并且也不能通过实践来检验，但它们同样被接受为真理。”Z2Z2 网友的观点，在哲学上来说，实际上是相当于主张，有那么一种“自在之物”，我们相信它们存在，却无法检验或证明它们存在。这种观点，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论。对于这种不可知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具体的批判：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如恩格斯所说，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经过科学发现（实践）所证明之前，只能是一种假说，从而太阳系的存在只能是一种“自在之物”；只有在经过科学发现的证明之后，关于太阳系的科学假说才变成了科学真理，“自在之物”才变成了“为我之物”。

需要说明的是，Z2Z2 网友的“自在之物”发展下去，发展到认为某些“公理”不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也可以是真理，而它们是否真理的标准就是它们是否被人们普遍“接受”，那么就成了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时髦一点，就是后现代主义）。从不可知论出发，滑向主观唯心主义是很容易的。

至于 Z2Z2 网友所说：“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逻辑和常识相抵触。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东西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如果某人说某事前后矛盾，自相矛盾，我们就知道，他说的是错的，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这实在不像是一位富有生活经验的成年人所说的话。人们的日常逻辑和常识，毫无疑问，往往是具有很局限性的。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人们本来习以为常的、甚至认为天经地义的“逻辑和常识”，又为后来实践所推翻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谁要不懂得这点，而要固守原来的“逻辑和常识”，在日常生活中，不知变通，那么不知要吃多少亏，日子还过得下去过不下去都成问题。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话办事，也不能想当然，也不能简单地根据以往的一些经验就轻率地肯定或否定某种看法。

至于马列毛主义真理，就更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逻辑和常识”推断出来了。邓小平的“包产到户”就很符合几千年小农经济的“逻辑和常识”，不经过几十年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践，即使是贫下中农也往往认识不到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真理性。

马列毛主义是经得起三大社会实践反复检验的科学，不仅不害怕实践的检验，而且只有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更加发扬光大，才能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真正、普遍地认识和掌握。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几十年的反革命实践，也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证明了中国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带来西方资本主义想象中的“民主”和“高消费”，而是遍地的血汗工厂、无法呼吸的空气以及比空气更加黑暗的政治压迫；也正是经过这样的实践的教育，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才在政治上成熟起来，逐步成长为一支可以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力量。

只有中国无产阶级的实际革命行动，才能最终在现实世界中证明马列毛主义的“此岸性”。

再论“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

2016-12-11

作者: z2z2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毛主席逝世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邓小平腐败集团肆无忌惮地否定毛主席，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依据。这绝对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没预料到的。因此，仔细分析“唯一标准”不正确的地方，指出其荒谬性和危害性，是捍卫毛主席、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需要，是捍卫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反击邓小平腐败集团的需要。这实际上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一部分。很多人早就开始这样做了。

但是，为维护这“唯一标准”，有人拿出了由特色政府发布的毛主席的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14页。

首先，这句话是不是毛主席说的是一问题。特色政府歪曲篡改之事还少吗？毛主席在世时出版的文章中根本找不到这句话。马列原著中也找不出“唯一”之话。即使是毛主席说的，也只能代表毛主席某一时期的认识。我们知道，毛主席曾经纠正过自己的想法。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主席曾经说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后来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学说，并发动了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这表明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纠正自己的想法的伟大胸怀。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邓小平腐败集团会利用他的话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毁灭他创立的社会主义的大业，他老人家一定会重新思考“唯一标准”是否正确。正如毛主席所说：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客观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和变化也永远没有完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可以从几个方面容易地看出：与基本逻辑和事实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它的绝对性违反了唯物辩证法，今天的实践可以否定昨天的实践，等等。

“唯一标准”与基本逻辑和事实相矛盾。 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卖矛和卖盾的故事。为了指出其错误，有人问：以你的矛攻你的盾如何？其错误立即可见。在这里连小孩都知道，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就知道对错了。既然这件事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就知道对错了，那就说明，此事例上，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简单的常识和科学告诉我们，只要有一个例子作为反例，那么其“唯一

标准”之说法就不能成立。不是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是不会违反科学的。“唯一标准”与基本逻辑和事实相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强词夺理是无用的。

“唯一标准”不能自圆其说。“唯一”具有排它性，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使之绝对化了。唯物辩证法认为，真理具有相对性，而无数的相对真理之总和才是绝对的真理。无数之总和才是绝对的真理就表明，任何单一真理都只是相对真理。如果说，真理都具有相对性，那么，“唯一标准”又怎么可能是绝对的真理？这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要么唯物辩证法错了，要么“唯一标准”错了。事实上，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只要夸大使它绝对化，必然走向反面，变成谬误。“唯一标准”就是这样。

“唯一标准”可以被人用今天的实践来否定昨天的实践。邓小平腐败集团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就是以今天的实践来否定昨天的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作为理论，建立在昨天的实践之上。但是昨天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的实践却被邓小平腐败集团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这就变成了恶性循环。今天我掌了权，我就可以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否定昨天的实践。明天你掌了权，你就可以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否定我今天的实践。也就是说，谁掌了权，谁就掌握了真理。这就彻底走向了唯心主义。谁掌了权，谁说出来的就是真理，这不是彻底的唯心主义是什么？为什么这样？根本原因是，“唯一标准”绝对化了，走向了反面，变成了谬误。

邓小平腐败集团能欺骗人民群众，顺利复辟资本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依据功不可没。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依据，邓小平腐败集团就可以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等等，为所欲为了。邓小平腐败集团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顺利地否定了文革，顺利地否定了社会主义，顺利地否定了马列毛主义，顺利地复辟了资本主义，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的灾难。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毛派中有人还不愿意对这么荒谬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半个不字，还在千方百计设法维护这一为邓小平腐败集团立了大功的“唯一标准”。这令人想起了鲁迅先生所描写的某些人看着革命者被杀而说“杀头好看”之行为，更令人长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请问“Z2Z2”网友，你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2016-12-11

作者: 远航一号

Z2Z2 网友在哲学上很勇敢，在创作了“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以后，不屈不挠，又写了“再论‘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再论”重复了“简论”中大部分的错误观点，部分地方，略有“深化”。下面就 Z2Z2 网友略有深化的部分，共同探讨一下。

Z2Z2 网友说：“为维护这‘唯一标准’，有人拿出了由特色政府发布的毛主席的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第 414 页。首先，这句话是不是毛主席说的一个问题。特色政府歪曲篡改之事还少吗？毛主席在世时出版的文章中根本找不到这句话。”

这里要感谢 05txlr 同志收集的毛主席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重要语录。Z2Z2 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不知可否请 05txlr 同志来答疑。

Z2Z2 网友说，“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简单的常识和科学告诉我们，只要有一个例子作为反例，那么其‘唯一标准’之说法就不能成立。”于是，Z2Z2 网友给我们举了个例，举的是“自相矛盾”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卖矛和卖盾的故事。为了指出其错误，有人问：以你的矛攻你的盾如何？其错误立即可见。在这里连小孩都知道，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就知道对错了。”

Z2Z2 网友说，这个“自相矛盾”的错误，连小孩都知道，根本不需要实践来检验。Z2Z2 网友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定语，应当说，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自相矛盾”是错误的，不再需要用新的实践来检验。但是说，连小孩都知道，确实有些夸张，多大的小孩？如果连矛和盾都没有见过或听说过的小孩，如何理解自相矛盾？

那么就说成年人，对于成年人来说，为什么不需要新的实践检验就知道自相矛盾是错误的呢？请问 Z2Z2 网友，这个正确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的，如毛主席所说，这个正确认识，也和一切正确认识一样，是从三大社会实践中得来的。具体来说，在战争中，经过大量的实践，人们认识到，当矛与盾交锋的时候，或者矛戳穿盾，或者盾挡住矛，两者以外的情况是没有的；在总结大量矛、盾交锋的经验的基础上，人们才逐渐形成了“矛盾”的概念。中国人，又用“自相矛盾”这个典故来说明矛盾的概念。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经验不同，就不用自相矛盾这个典故。

为了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Z2Z2 网友编出了这样一套逻辑：“‘唯一’具有排它性，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使之绝对化了。。。。任何单一真理都只是相对真理。如果说，真理都具有相对性，那么，‘唯一标准’又怎么可能是绝对的真理？这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说，人们的每一个认识，最终都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了解这一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请问 Z2Z2 网友，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标准当然是唯一的，也可以说是排他的。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需要将世界上的每一种认识，都亲自实践一遍。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有些认识，经过以往的实际，已经被证明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并已经总结为一定的理论。这时，人们当然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已经形成的理论来指导现在的实践，并校正一些错误的认识。尽管如此，在一定的具体时间、条件下形成的经验以及理论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不断、反复检验；当情况、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原来已经被证明正确的经验、理论仍然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不就是由相对真理逐步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吗？

Z2Z2 网友有这样一套逻辑，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如果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理，它就必然也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不是“绝对真理”；既然“实践标准”不是“绝对真理”，它就不可能是唯一的。Z2Z2 网友，你看我所总结的你的逻辑，是不是比你自己的总结，更好，更清晰一些？

如果按照 Z2Z2 网友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因为唯物主义是真理，因而唯物主义必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辩证法是真理，因而辩证法必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人都是要死的”是真理，这个真理就一定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有人是可以不死的，如果坚持“人都是要死的”，就必然是绝对化，因而就必然是荒谬的，违反辩证法的。类似的，“自然界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人离开大脑就不能思维”、地球有一天要灭亡、太阳系有一天要毁灭，。。。等等，都是“相对的”，都不可以“绝对化”，都是“荒谬”。

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绝对真理”概念，指的就是客观真理，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列宁说：“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 2 章第 5 节）除此以外，不可以对“绝对真理”有任何其他的理解。这样的绝对真理，即客观真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确定无疑存在的。

Z2Z2 网友认为，一切真理都只是相对真理，这实际上就是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即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人类的实践和认识都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只有疯子才会否定“人都是要死的”这一为人类全部实践所证明（并为现代科学进一步说明）的这一真理是绝对真理；只有没有科学常识的人才

会怀疑几十亿年后地球和太阳系必然要毁灭这一尚未发生但是已经可以被人类的大量科学研究所准确预测的自然现象是绝对真理。同样地，凡是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无论他们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不得不寻找其他的真理标准。这样的实践以外的真理标准，既然不是来自于社会实践，那么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就一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来自外部的、神秘的、人们经验以外的来源）。请问，除了社会实践、头脑中固有、天上掉下来，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可能的认识来源吗？也就是说，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无论他们自觉还是不自觉，承认还是不承认，都是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者。华国锋叛徒集团的“两个凡是”就是这样一种（以教条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因而才在与邓小平、陈云集团的哲学论战中不堪一击。

在 Z2Z2 网友看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大危害，就是“‘唯一标准’可以被用今天的实践来否定昨天的实践。”Z2Z2 网友，用“今天的实践”来否定“昨天的实践”，这不是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吗，这不是人类自产生以来不断在发生的事情吗，没有用今天的实践来否定昨天的实践、用现在的实践来否定过去的实践，人类社会怎么能发展呢？Z2Z2 网友又如何能成长为一马列毛主义积极分子呢？

毛主席讲，人民革命的逻辑向来就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不就是不断地经过以革命的实践否定反革命的实践，以反革命的实践否定革命的实践，又以革命的实践再否定反革命的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吗？世界上哪里有一产生就一成不变的实践呢？社会主义革命也不例外，怎么可能不经过曲折和反复呢？

邓小平集团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并在此基础上否定毛主席、否定社会主义，这是有其客观历史逻辑的，也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资本主义复辟又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这也是有其客观历史逻辑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请问 Z2Z2 网友，你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只要你能够举出一个你的正确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例子，我们的辩论就可以告一段落。因为那样就足以说明，我们有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

如果不是，如果你也同意，你的正确认识（即你的认识中的真理性的部分）全部是从三大社会实践中得来的，那么可不可以说，你的正确认识，全部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或者是你本人的实践、或者是世界上其他人的实践），因而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发现除了社会实践以外、其他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曹家的奋斗史 —— 从“10 万日元巨款”到福耀玻璃

2016-12-25

作者: 远航一号

近日，主流媒体大肆炒作福耀玻璃公司董事长曹德旺“跑路”、投资搬厂美国一事。主流媒体说，中国税收高、成本高、投资环境差，再不给“民企”减税，不保护“民企”的产权（就是说不追究“民企”的“原罪”），尤其是要拆掉阻碍“民企”发展的各种“玻璃门”（所剩不多的国企都必须给“民企”让路），中国的“民企”据说就都要被“逼死”了。言外之意，中央要赶紧向资本家们大幅度地让步，税要尽可能少收，能不收就不收，补贴还要多给，国企私有化还要加快，投资环境还要“改善”（工人权利、环境保护都要让路）。雾霾再恶劣，那也是政府与民众的事，不关资本家的事，雾霾严重了，亲“民企”的主流媒体还可以借机挑拨一下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进一步鼓吹石油天然气私有化。

据网友“蜈蚣山人”揭发，中国大半“民企”都是开空头发票的虚假企业，八成“民企”都是账面亏损，根本不交税（见“从曹德旺谈税制”，<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60215373.html>）。别的“民企”税负高不高暂且不论，说福耀玻璃税负高，实在是天大的冤枉！不是说冤枉了曹先生，而是冤枉了政府。

据了解，2008 年以前，曹先生的福耀玻璃（这一中国汽车玻璃业界的第一大企业）竟然没有交过一分钱税。2007 年，福耀玻璃净盈利 9 亿元，结果不但不交税，政府还倒贴 2000 多万元。2015 年，福耀玻璃净盈利 26 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高达两成，应交各项税金之和不过 3 亿多元，相当于福耀玻璃净盈利的 13%，远低于正常的企业所得税率 25%，更是大大低于曹先生自己算出来的夸张税负 55%。（相关资料见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6-12-20/doc-ifxytqaw0108344.shtml>；进一步分析见远航一号，<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1668>）如果这还不算政府善待“民营企业”，什么算善待？如果这还不算优良的投资环境，什么算优良？

在主流媒体的叙述中，曹先生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大企业家，而且是大慈善家，累计捐款 60 多亿元，号称“中国首善”；曹先生吃斋念佛，为人正直，从不行贿，连“一盒月饼”都没有送过。

各位看官，大家都是地球人，不是火星人。曹先生是在地球上发财，不是在火星上发财。在如今这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大街上搀扶摔倒老人都可能不慎获罪的时代，一个连“一盒月饼”都不送的人是如何能够累计身家亿万、捐款几十亿，尚有余力高调进军海外市场呢？这不符合我们的生活常识吗。

那么，常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

曹德旺先生的第一桶金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人人都有个第一桶金的问题。虽然现在中央有新政策，对于“民企”历史上的“不规范”采取宽容的态度，当年大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被不明不白私有化的历史是抹煞不了的，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那笔帐是烧不掉的。“民营企业家”们如果努力发展生产、造福社会、确保职工权益、不危害环境，历史的记忆可以慢慢淡去；如果不是这样，反而变本加厉、得寸进尺，一旦政情民情发生变化，历史的旧账要翻一翻，也是很容易的。

那么，曹德旺先生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呢？按照曹先生自己的说法，是这样的：

1976年，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回到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也因为这个工作，才有了后来的福耀。高山镇异型玻璃厂从创办起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对玻璃厂的情形，我非常了解，这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的。因此，1983年4月，我向镇里承诺，到年底上交6万元利润，上交剩下的，我拿40%，高山镇政府拿20%，其他作为固定资产，最终我没掏一分钱就承包了玻璃厂。我一年内把水表玻璃销量从几十万片变成了200万片，工厂净利20多万元，我个人赚了6万元。

1987年，我牵头成立了福耀玻璃。。。带领福耀做汽车玻璃很艰难，最艰难的其实是在公司以外。在80年代末的整党整风运动中，镇上的人都传“曹德旺有经济问题，要被抓起来了”，我不相信我没做坏事还会被抓。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因贪污被告了！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带着公司的账目、复印资料、合同文件和全部单据到县政府找书记，针对贪污“指控”解释清楚了所有问题，我对书记说，我非法捞一分钱就判一年徒刑。书记说，“如果你能够为今天的话负责，回去把生产抓起来。”也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我专门学习了会计学，而且要求财务把公司所有单据必须保留。（曹德旺，“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后，决定站起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222/15094710_0.shtml）

对于曹先生上面的陈述，有网友给出了当时历史的另外一个版本：

曹德旺哥哥曹德淦是福建省副省长，人大主任！每次曹德淦官升一级，曹德旺的钱就多几倍！。。。1976年，曹德淦进福建省政府工作，曹德旺被安排到福清玻璃厂做销售。1983年，曹德淦安排曹德旺承包这个玻璃厂，短短三年，到1986年，曹德旺已经身家几十万，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富豪。1986年，曹德淦要镇里和曹德旺合资建汽车玻璃厂，并违规给曹德旺银行贷款，到年底工厂获利70万，曹德旺不愿分红给镇里，在省政府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曹德淦的干预下，玻璃厂股份全部归曹德旺，反对这个安排的镇领导全部被免职或调离！1993年曹德淦任漳州市委书记，通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关系，曹德旺接到国有汽车大公司订单，1999年曹德淦任福建省副省长，几乎所有的大国企汽车厂都用曹德旺汽车玻璃，并且利润超过200%。这让曹德旺短短十几年暴敛数百亿财富。2008年曹德淦被迫提前退休，别的汽车玻璃才有机会进入大国企汽车，曹德旺汽车玻璃市场比例开始下降！（“关于最近的网络红人曹德旺”，<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a-100024-59317487-1.html>）

这位网友的叙述与曹先生的自述很不一样。简单说，曹先生成为“企业家”的第一步，是靠了“关系”的；而后曹德淦违规给曹德旺安排银行贷款，又强迫高山镇与曹德旺“合资”（从行文看，曹实际上一分钱没出，是用国家贷款与高山镇“合资”），后来又强迫高山镇将玻璃厂全部股份归曹德旺，进而对高山镇干部打击报复。这有没有涉及以权谋私！曹德旺有没有非法侵吞高山镇集体资产！当年被打击报复的高山镇干部有没有被冤屈！

当然，按照曹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很清白的，一分钱也没有贪，非法捞一分钱，就可以判他一年徒刑。说法不同，但是常识在。按照现在人们通常所了解的，中国政治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常识、中国官场的常识、改革开放的常识，曹先生的叙述与“关于最近的网络红人曹德旺”的叙述，哪一组叙述更接近事实真相呢？

虽然现在中央对于“民企”的原罪采取宽容态度，但是民意的法庭还在。现在是网络时代，曹德旺先生、主流媒体敢不敢把当年被撤职的高山镇当事人请出来，在网络上公开辩论、对簿民意的公堂，让现在的青年人再学习一下曹先生当年“创业”的经验？

“中国首善”还是偷税大王？

据说，自 1983 年以来，曹德旺先生累计慈善捐款 60 多亿元，2011 年荣登中国慈善排行榜榜首。

不过，据“关于最近的网络红人曹德旺”揭发，此事原来另有隐情：

2008 年，曹德淦下台，曹德旺玻璃厂偷税漏税问题爆发。曹德旺被迫承诺要拿 80 亿 税款做慈善，因为做慈善可以抵税。但他只拿 30 亿成立慈善基金，却几乎未做慈善，反而转移资金到美国建厂。但在美国几年不仅不赚钱反而巨亏。

曹德旺先生的偷税漏税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为了“摆平”做了怎样的努力，旁人无从知晓。不过，从福耀玻璃的财务报表看，这一中国汽车玻璃业界的垄断企业，在 2008 年前竟然一分钱税都没有交过，有时甚至还要政府倒贴，曹先生想不发财都难啊！

福耀玻璃是“血汗工厂”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曹德旺先生多次表示，他投资美国，是因为美国法治健全、投资环境优良。

不过，曹先生最近刚刚被美国有关方面发现“违法”并惩以罚款：

就在上个月底，曹德旺在美国投资的工厂被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罚了 22.7 万美元，理由如下：多台机器违反了安全规定，有可能导致工人截肢或其它安全事故；缺少个人防护设备；有电力隐患；没有就危险化工品的使用对员工进行培训；没有标出安全出口。

除了安全问题受到质疑外，员工对于福耀的管理也有颇有不满的。。。福耀曾强制员工参加反工会的会议，并禁止员工穿着有工会标志的服装（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一点资讯，“剥削”美国人民没那么容易！——曹德旺们跑不了！

<http://www.yidianzixun.com/home?page=article&id=0FHO6WuM>)

如果说，在“法治健全”的美国，曹先生的工厂尚且安装了“有可能导致工人截肢或其它安全事故”的多台机器，那么，在法治不那么健全的中国，在曹先生的工厂中是否长期、大量使用着这种“有可能导致工人截肢或其它安全事故”的机器并且已经造成了大量工伤事故？

有网友揭露，福耀玻璃是“血汗工厂”、“对员工不可理喻”

荆门的福耀玻璃怎么样？血汗工厂，在厂区内受工伤事故厂里不管，还会被厂里干掉。也不会有任何赔偿，经常被割伤肉里面都是那玻璃渣（百度，<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31646104306920164.html>）

公司对员工也是同样的不可理喻。工人带伤工作，血流到玻璃上还要挨骂。工伤恢复后不给安排工作。工人吃饭就在漫天飞舞玻璃丝的车间。最有趣的是员工比例高达 6:1 的质检部门都是福耀“家属系”。连游标尺都不会用（“曝光福耀玻璃黑幕”，<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owner-c-87-3114921-1.html>）

由于福耀公司任人唯亲，产品质量不过关，所产玻璃经常发生自爆、自裂等问题，遭到消费者投诉，被称为“福耀玻璃黑店”（“福耀玻璃我如何信赖你”，<http://bbs.tianya.cn/post-free-5556705-1.shtml>）

曹家的第一桶金 —— 曹河仁先生的“10 万日元巨款”

据曹先生自己讲，他父亲曹河仁当年也是上海滩上的闻人：

1946 年，我在上海出生。父亲曹河仁是个生意人。他在 1935 年以前的几年曾在日本学做生意，赚得了 10 万日元。那时日元汇率比美元高，这 10 万元算得上一笔巨款。七七事变后，父亲就带着全家落户上海，他四处投资继续做生意。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非常忙，忙到忘记给我取名字。等到我 9 岁快入学时，我的名字还叫“小印度”，因为我没名字，而且母亲总爱给我穿巡警样式的制服，而街上的巡警大多是印度人。还是长福伯给我取的学名“德旺”，寓意“聪明又有德，必然兴旺”，这让我高兴了好几天。我对家里的好光景没有印象，因为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们就搬回福清老家，而我们的大部分家产都和一个沉船一起沉到海底里去了。（曹德旺，“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后，决定站起来”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222/15094710_0.shtml）

另据人民网《民生周刊》报道：

曹德旺很低调，走进公众视线是因为河仁基金会的创办，这个基金会的名字正取自其父亲。曹河仁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股东之一，因彼时时局动荡，夫妇二人决定迁回老家福建福清，一个靠海的城市。离开上海时，全家人乘坐邮轮，财产则放在另一条运输船上。回到福清后，放在运输船上的家当却迟迟没有运到，最后得到消息，船沉了。就这样，原本富裕的曹家顿时变得一贫如洗。（“曹德旺的专注”，http://paper.people.com.cn/mszk/html/2015-09/21/content_1618157.htm）

以上的叙述很蹊跷。按照曹先生的说法，他们家在 1947 年从上海返回福建老家福清，全家人坐一条船，财产放在另一条船上，结果放财产的船沉了，从此一贫如洗。这里有个问题，什么样的财产要专门放到另一条船上呢？大件家具、做生意的货物？但是，贵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股东（有材料说是“大股东”）的曹家，不会因为损失了一些家具、货物就一贫如洗啊。正常的有钱人迁徙，难道不会随身携带大量金条、银元、美钞、首饰？举家迁徙，却将全部财产放到另外一条船上，这不符合常理。

再来看曹德旺父亲曹河仁的身世，1935 年至 1945 年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稍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当时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这样的历史时代，曹河仁先生在做什么呢？他先是去了日本做生意，赚了一笔“巨款”，有 10 万日元（按照当时汇率约合 3 万美元、10 万法币或“大洋”）。接下来，上海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这个时期，曹河仁先生在做什么？曹德旺语焉不详。

让我们用正常的脑子想一想，什么样的“生意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可以照样“落户上海”、“四处投资”、“继续做生意”。曹河仁先生在日伪占领时期到底做的什么生意？曹河仁先生在做大生意期间，有没有与日伪当局合作？曹河仁先生在“落户上海”以后，有没有在日伪当局中充任伪职？

凡此种种，或许曹河仁先生生前未必方便告诉曹德旺先生。但是像曹河仁先生这样一位上海滩闻人，当年所作所为，想必尚有记录，在这个网络通讯发达的时代，其中的真相不难大白。但愿到了曹河仁先生上海滩生意史大白之日，曹德旺先生并不因此增加任何的尴尬、河仁基金会的招牌也不会成为曹先生额外的负担。